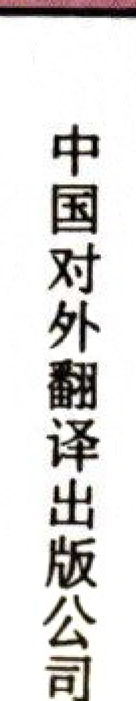


大地上的事情

苇岸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游心者笔丛　楼肇明主编

- 第十三位使徒　楼肇明 著
- 善良是一棵矮树　鲍尔吉·原野 著
- 樗下随笔　止庵 著
- 大地上的事情　苇岸 著
- 蜜蜂的午后　老愚 著


ISBN 7-5001-0330-1



封面设计：常燕生

ISBN 7-5001-0330-1/I·24

定价：7.90 元

游心者笔丛

楼肇明主编

大地上的事情

我欣赏这样的两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上帝期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正的作家或艺术家，应是通过其作品，有助于世人走向「尧舜」或回到「童年」的人。○我欣赏这样的两句

苇岸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游心者笔丛》

总　序

楼肇明

“乘美以游心”，语出庄子，意谓美者心之舟楫也，心者美之海也，乘美游心，扶摇搏击，骋目舒怀，海阔天高一帆悬；反之，以心为舟楫，以美为海洋，在这位伟大的相对主义者看来，也同样可以成立。因为宇宙之大没有人的心灵空间巨大。“美”和“心”这两大板块或畴区，可以互换，彼此依存。联结它们的系词是一个“游”字，此乃“游戏”之“游”，即苏轼所云：“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因而，此一“游”字，无妨同时作“游历”之“游”讲，及“游动”之“游”讲。如此，“游心”一辞的意义，就包括玩耍、娱乐、休憩、惬意、旅行、观察、思考、鉴赏、品味、享受等等内容了，而且，这些活动又是须整个儿投入，浸没其中的。“乘美以游心”，是一个经典的审美本质的揭示，它尤其适用于散文随笔的创作和鉴赏。文体的目的、意义、疆域、文体对创作主体性的要求、创作心

态等等，均可由此派生而来。美即至善。

不可小瞧了游戏、闲适、馀裕心在散文随笔写作中的支配性意义。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鲁迅译鹤见佑辅《思想·山水·人物》一书有云："没有闲谈的世间，是难住的世间；不知闲谈之可贵的社会，是局促的社会。而不知道尊重闲谈妙手的国民，是不在文化发达的路上的国民。"而鲁迅自己则说："人们到了失去馀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馀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论语一年》）由此可见，游戏、闲适、馀裕心是与人之所以是人的尊严、社会的文化品位和民族创造精神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游心既是审美活动，就不是游手好闲，油嘴滑舌；闲适，也不是闲得发慌，奢侈淫逸，颓废无聊；随笔之随，不是随遇而安之随，随波逐流之随，随随便便之随。游心，不是放纵，不是逃避，不是苟安。《易经》云："随之时义大矣哉"；《新唐书》云："关美刺谓之讽喻，咏性情谓之闲适"；周作人则说："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即大幽默也"。这就将用文字来表现"游心"的散文随笔，放在了一个坚实而广阔的艺术认识论基石之上了。"吟咏性情谓之闲适"，比较地不难理解，而"闲适即大幽默也"，包含着一个情感和认识悖论的发现。身处世界棋局之中，惟离心力将其送出棋局，跳将在半空中作壁上观，才能看透自己和世界，却又终究未能忘情肌肤相联的世界，又终究无奈于无补世事棋局，仅止于大悲大喜的游戏而已。这里的闲适，显而易见是指它的非功利性和无实用性，这是审美活动、心理距离感的另一说法。吟咏性情，需要放松，观

照认识，需要心理距离，而审美心理距离（即“大幽默”）的确立，不仅是针对社会时代和认识客体而言的，当主体同时作为认识客体出现时，反求诸己，也正是“游心”的题中之义。心理距离是审美观照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避免因“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促、短视从而造成认识被遮蔽的有效途径。康德说：“我一生的主要事件在我的大脑之中展开。”列维·斯特劳斯说：“人是把家园带在自己身边流浪的。”（《忧郁的热带》）这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对灵魂居无定所的“游心”的描述。“游心”既是精神漫游，在其姿态上就有别于登高一呼，呼天呛地，有别于横刀立马，阵前叫骂；“游心”还有别于宣教和训诫，既是滋养，就非救急；吟咏性情，并不一概地排斥咏叹调、宣叙调、自说自话的絮语、呓语。豆棚瓜架下望星空，酒后灯前摆龙门阵，虽是当行本色，但九九归一，“随之时义大矣哉”，絮语闲话就不是言不及义的“话语膨胀”，不是兜售社会道德思想的平均值，记录躯壳物化以后的一堆流水帐，当然更不是贩卖丑恶和污秽以广招徕。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毕竟是文化良知和文化智慧的表现。对人类历史、社会文化的幽默闲适态度，并非意味着在消极累积上止步，“游心”不是坐享其成地耗损、倒退、复旧，而是对进取、提升、创新的响应。闲适有大小之分，安乐闲适为小闲适，忧患闲适为大闲适；游戏规则有大小不同层面之别，属策略操作程序的是小规则，而有关厘定游戏参加者的身分角色，则是大规则。

综观古今中外的散文随笔大家，尽管不同时代、地域、民族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思想印记和艺术印记，但极

为相似的是，他们都是最广义上的思想者、学者、和诗人集于一身的人物，他们是自己时代的“游心”高手，也是使往后世代的人们感到亲切的同时代人。古希腊罗马的哲人有言：“人本是为了思考世界的目的而存在”（西赛罗），“上帝创造了人，目的是使人成为上帝及上帝杰作的旁观者，不仅是旁观者，而且是阐释者”（爱比克泰德）。把散文随笔作家看成是“游心者”，就是说，他们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员，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是存在的诠释者和质询者。人类精神财富的最大特征，在其本质上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是为人类所共同享有的，它的获得或丧失，是离不开选择的；一个人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品格意志，具有不可剥夺性。除非本人愿意，崇高不能变成卑鄙，勇敢不会变成软弱，诚实不会变成虚伪。游心者通过艺术观照，将知识化为智慧，视通万里，虑及千载，将思、史、诗纳入襟怀，以品格意志，毕其一生追求真、善、美。正是在这一个意义上讲，散文随笔是作家人格智慧的艺术体现；散文随笔被称为“最个性化的文体”，“文学艺术发达之极致”，无非是指属宏观时空的思、史、诗，在微观的自我终端上契合或遇合。从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散文史，事实上就是一部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结晶史。

“游心者”概念的提出，源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在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上的积淀，它一方面相对地比较符合散文随笔艺术规律的诸多要求，提示散文随笔作家明确自己作为存在诠释者和质询者的角色分工，这对于提升文体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品位，实在是很有必要的。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文化人格结构，和中国古典散文中表现出来

的“谏臣”和“逐臣”心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中的“叛徒”和“隐士”，“过客”和“看客”各有所侧重的种种艺术人格的滥觞，“游心者”既不是反传统的，也不是固守传统的，而是以传统为立足点，以世界文化和文学为参照背景，试图在承续、调整、接轨方面吐故纳新。无论从生生不息的意义上讲，还是从达成中西审美视界融合的意义上讲，“游心者”必然会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对世界和人的意义的质询和诠释，连同对质询者的质询，对诠释者的诠释，层层相续，未有穷时。

“游心者”虽有高远的文化目标，《游心者笔丛》却无雄大的文学图谋。在散文随笔日趋繁荣或闹忙的当代中国文坛，《游心者笔丛》的编选目的仅止于：一是尽可能地避免或近或远、食而不化、老调再续的后滞效应；二是警惕散文随笔与“一次性消费”、“休克型消费”的“视听文化”等量齐观；三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其可能推出年轻一代的散文随笔作家，在浮躁和忙迫的生存中，多一点刚劲、质朴和沉静。而同时，为了避免文化价值向度上的零乱不一，丛书所辑作家作品，颜容秉赋、肥瘦修短本天成，但求其文学志趣上的接近和相似。以流派风格编选丛书，须在流派形成之后，此时此刻，还只是一个不曾企及的奢侈的梦。我们期待后续队伍的络绎不绝。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三辑

自　序

古希腊诗人卡利马科斯说："一部大书是一大灾难！"当我整理数年的心血之作，最后结成一册小集时，我想到了这句话。我心里说，还好，我没有成为一个"大灾难"的制造者。

《胡萝卜须》的作者，也说："一个用得好的词儿，比一本写得坏的书强。"这样的说法，给我印象都很深刻。几年前，我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过：就我个人来讲，我更倾向散文文字的简约、准确、生动、智性；我崇尚以最少的文字，写最大的文章。

还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喻，将全部社会成员分为三类人：最低层是做买卖交易的，其次是参加竞赛的，最后是旁观者。"旁观者"即是哲学家和诗人的本义。后来，在另一本美国学者著的小书《世界名诗人传》中，我又看到了类似的意思。这里作者将"旁观者"更恰当地称为"观察者"。"观察者"就是阐明世界精神，宣扬

新的真理的人。与往世比较，看看当代，到处都是“做买卖交易的”和“参加竞赛的”，没有什么比“观察者”更少。

“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我们的一句古话。时代变了，现代人放弃了这种难为自己的努力。消遣与放纵，已成为一种时尚。连我们的曾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家，也已染上以调侃为荣，以俗人自诩的市井习气。仿佛世界走到今天，一切关于人的改善的努力，都已徒劳无益。

在西方思想家那里，有一种说法：只有那些生活在一七八九年以前的人，才能体会出生活的美满和人的完整性。我觉得新时期以来的一、二十年间，在精神的意义上，中国再现了西方几个世纪的进程。现在，我们已经在“一七八九年”之后了。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美好的时代。仿佛一夜之间，天下只剩下了金钱。对积累财富落伍的恐惧，对物质享受不尽的倾心，使生命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功能，一切追求都仅止于肉体。

梭罗说，文明改善了人类的房屋，但并没有同时改善居住在房屋里的人。我相信这一点。对于人类这一整体的改善，我也许不再抱有信心。但明天并不是世界末日，每一代都是重新开始的，就个体来说，都是可能趋于完善和完美的。我很喜欢泰戈尔这样两句话：“每一个孩子生出时所带的神示说：上帝对于人尚未灰心失望呢。”“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正的作家或艺术家，应是通过其作品，有助于世人走向“尧舜”或回到“童年”的人。

在我阅读、写作面对的墙上，挂着两幅肖像，他们是列夫·托尔斯泰和享利·戴维·梭罗。由于他们的著作，我建立了我的信仰。我对我的朋友说，我是生活在托尔斯泰和梭罗的“阴影”中的人。

一九九四年十月

第一辑

大地上的事情

一

我观察过蚂蚁营巢的三种方式。小型蚁筑巢，将湿润的土粒吐在巢口，垒成酒盅状、灶台状、坟冢状、城堡状或松疏的蜂房状，高耸在地面；中型蚁的巢口，土粒散得均匀美观，围成喇叭口或泉心的形状，仿佛大地开放的一只黑色花朵；大型蚁筑巢像北方人的举止，随便、粗略、不拘细节，它们将颗粒远远地衔到什么地方，任意一丢，就像大步奔走撒种的农夫。

二

下雪时，我总想到夏天，因成熟而褪色的榆荚被风从树梢吹散。雪纷纷扬扬，给人间带来某种和谐感，这和谐感正来自于纷纭之中。雪也许是更大的一棵树上的果实，被一场世界之外的大风刮落。它们漂泊到大地各处，它们携带的纯洁，不久即蕃衍成春天动人的花朵。

三

写《自然与人生》的日本作家德富芦花，观察过落日。他记录太阳由衔山到全然沉入地表，需要三分钟。我观察过一次日出，日出比日落缓慢。观看落日，大有守侍圣哲临终之感；观看日出，则像等待伟大英雄辉煌的诞生。仿佛有什么阻力，太阳艰难地向上跃动，伸缩着挺进。太阳从露出一丝红线，到伸缩着跳上地表，用了约五分钟。

世界上的事物在速度上，衰落胜于崛起。

四

这是一具熊蜂的尸体，它是自然死亡，还是因疾病或敌害而死，不得而知。它偃卧在那里，翅零乱地散开，肢蜷曲在一起。它的尸身僵硬，很轻，最小的风能将它推动。我见过胡蜂巢、土蜂巢、蜜蜂巢和别的蜂巢，但从没有见过熊蜂巢。熊蜂是穴居者，它们将巢蛀在房屋的立柱、檩木、横梁、椽子或枯死的树干上。熊蜂从不集群活动，它们个个都是英雄，单枪匹马到处闯荡。熊蜂是昆虫世界当然的王，它们身着的黑黄斑纹，是大地上最怵目的图案，高贵而恐怖。老人们告诉过孩子，它们能蜇死牛马。

五

麻雀在地面的时间比在树上的时间多。它们只是在吃足食物后，才飞到树上。它们将短硬的喙像北方农妇在缸沿砺刀那样，在枝上反复擦试。麻雀蹲在枝上啼鸣，如孩子骑在

父亲的肩上高声喊叫，这声音蕴含着依赖、信任、幸福和安全感。麻雀在树上就和孩子们在地上一样，它们的蹦跳就是孩子们的奔跑。而树木伸展的愿望，是给鸟儿送来一个个广场。

六

穿越田野的时候，我看到一只鹞子。它静静地盘旋，长久浮在空中。它好像看到了什么，径直俯冲下来，但还未触及地面又迅疾飞起。我想象它看到一只野兔，因人类的扩张在平原上已近绝迹的野兔，梭罗在《瓦尔登湖》中预言过的野兔："要是没有兔子和鹧鸪，一个田野还成什么田野呢？它们是最简单的土生土长的动物，与大自然同色彩、同性质，和树叶、和土地是最亲密的联盟。看到兔子和鹧鸪跑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们是禽兽，它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仿佛飒飒的木叶一样。不管发生怎么样的革命，兔子和鹧鸪一定可以永存，像土生土长的人一样。不能维持一只兔子的生活的田野一定是贫瘠无比的。"

看到一只在田野上空徒劳盘旋的鹞子，我想起田野往昔的繁荣。

七

在我的住所前面，有一块空地，它的形状像一只盘子，被四周的楼群围起。它盛过田园般安详的雪，盛过赤道般热烈的雨，但它盛不住孩子们的欢乐。孩子们把欢乐撒在里面，仿佛一颗颗珍珠滚到我的窗前。我注视着男孩和女孩在一起做

游戏，这游戏是每个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的大人都做过的。大人告别了童年，就将游戏像玩具一样丢在了一边。但游戏在孩子们手里，依然一代代传递。

八

在一所小学教室的墙壁上，贴着孩子们写自己家庭的作文。一个孩子写道：他的爸爸是工厂干部，妈妈是中学教师，他们很爱自己的孩子，星期天常常带他去山边玩，他有许多玩具，有自己的小人书库，他感到很幸福。但是妈妈对他管教很严，命令他放学必须直接回家，回家第一件事是用肥皂洗手。为此他感到非常不幸，恨自己的妈妈。

每一匹新驹都不会喜欢给它套上羁绊的人。

九

黎明，我常常被麻雀的叫声唤醒。日子久了，我发现它们总在日出前二十分钟开始啼叫。冬天日出较晚，它们叫的也晚；夏天日出早，它们叫的也早。麻雀在日出前和日出后的叫声不同，日出前它们发出“鸟、鸟、鸟”的声音，日出后便改成“喳、喳、喳”的声音。我不知它们的叫法和太阳有什么关系。

十

在山岗的小径上，我看到一只蚂蚁在拖蜣螂的尸体。蜣螂可能被人踩过，尸体已经变形，渗出的体液粘着两粒石子，使它更加沉重。蚂蚁紧紧咬住蜣螂，它用力扭动身躯，想把

蜣螂拖走。蜣螂微微摇晃，但丝毫没有向前移动。我看了很久，直到我离开时，这个可敬的勇士仍在不懈地努力。没有其他蚁来帮它，它似乎也没有回巢去请援军的想法。

十一

麦子是土地上最优美、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麦田整整齐齐摆在辽阔的大地上，仿佛一块块耀眼的黄金。麦田是五月最宝贵的财富，大地蓄积的精华。风吹麦田，麦田摇荡，麦浪把幸福送到外面的村庄。到了六月，农民抢在雷雨之前，把麦田搬走。

十二

在我窗外阳台的横栏上，落了两只麻雀。那里是一个阳光的海湾，温暖、平静、安全。这是两只老雀，世界知道它们为它哺育了多少雏鸟。两只麻雀蹲在辉煌的阳光里，一副丰衣足食的样子。它们眯着眼睛，脑袋转来转去，毫无顾忌。它们时而啼叫几声，声音朴实而亲切。它们的体态肥硕，羽毛蓬松，头缩进厚厚的脖颈里，就像冬天穿着羊皮袄的马车夫。

十三

下过雪许多天了，地表的阴面还残留着积雪。大地斑斑点点，仿佛一头在牧场垂首吃草的花斑母牛。

积雪收缩，并非因为气温升高了，而是大地的体温在吸收它们。

十四

冬天，一次在原野上，我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它纠正了我原有的关于火的观念。我没有见到这个人，他点起火走了。火像一头牲口，已将枯草吞噬很大一片。北风吹着，风头很硬，火紧贴在地面上，火首却逆风而行，这让我吃惊。为了再次证实，我把火种引到另一片草上，火依旧溯风烧向北方。

十五

我时常忆起一个情景，它发生在午后时分。如大兵压境，滚滚而来的黑云，很快占据了整面天空。随后，闪电迸绽，雷霆轰鸣，分币大的雨点砸在地上，烟雾四起。骤雨像是一个丧失理性的对人间复仇的巨人。就在这万物偃息的时刻，我看到一只衔虫的麻雀从远处飞回，雷雨没能拦住它，它的窝在雨幕后面的屋檐下。在它从空中降落飞进檐间的一瞬，它的姿势和蜂鸟在花丛前一样美丽。

十六

五月，在尚未插秧的稻田里，闪动着许多小鸟。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神态机灵，体型比麻雀娇小。它们走动的样子，非常庄重。麻雀行走用双足蹦跳，它们行走像公鸡那样迈步。它们飞得很低，从不落到树上。它们是田亩的精灵。它们停在田里，如果不走动，便认不出它们。

十七

秋收后，田野如新婚的房间，已被农民拾掇得干干净净。一切要发生的，一切已经到来的，它都将容纳。在人类的身旁，落叶正悲壮地诀别它们的母亲。我忽然想，树木养育了它们，仿佛只是为了此时大地上呈现的勇士形象。

十八

在冬天空旷的原野上，我听到过啄木鸟敲击树干的声音。它的速度很快，仿佛弓的颤响，我无法数清它的频率。冬天鸟少，鸟的叫声也被藏起。听到这声音，我感到很幸福。我忽然觉得，这声音不是来自啄木鸟，也不是来自光秃的树木，它来自一种尚未命名的鸟，这只鸟，是这声音创造的。

十九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我看到了日出。我所以记下这次日出，因为有生以来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太阳。好像发生了什么奇迹，它使我惊得目瞪口呆，久久激动不已。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这样描述马贡多连续下了四年之久的雨后日出：“一轮憨厚、鲜红、像破砖碎末般粗糙的红日照亮了世界，这阳光几乎像流水一样清新。”我所注视的这次日出，我不想用更多的话来形容它，红日的硕大，让我首先想到乡村院落的磨盘。如果你看到了这次日出，你会相信。

二十

已经一个月了，那窝蜂依然伏在那里，气温渐渐降低，它们似乎已预感到什么，紧紧地挤在一起，等待最后一刻的降临。只有太阳升高，阳光变暖的时候，它们才偶尔飞起。它们的巢早已失去，它们为什么不在失去巢的那一天飞走呢？每天我看见它们，心情都很沉重。在它们身上，我看到了某种大于生命的东西。那个一把火烧掉蜂巢的人，你为什么要捣毁一个无辜的家呢？显然你只是想借此显示些什么，因为你是男人。

二十一

太阳的道路是弯曲的。我注意几次了。在立夏前后，朝阳能够照到北房的后墙，夕阳也能够照到北房的后墙。其他时间，北房拖着变深的影子。

二十二

立春一到，便有冬天消逝、春天降临的迹象和感觉。整整过了一冬的北风，到达天涯后已经返回，它们告诉站在大路旁的我：春天已被它们领来。看着旷野，我有一种庄稼满地的幻觉。踩在松动的土地上，我感到肢体在伸张，血液在涌动。我想大声喊叫或疾速奔跑，想拿起锄头拚命劳动一场。我常常产生这个愿望：一周中，在土地上至少劳动一天。爱默生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与这世界上的劳作保持着基本关系。劳动是上帝的教育，它使我们自己与泥土和大自然发生

基本的联系。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一生从未踏上土地。

二十三

捕鸟人天不亮就动身，鸟群天亮开始飞翔。捕鸟人来到一片果园，他支起三张大网，呈三角状。一棵果树被围在里面。捕鸟人将带来的鸟笼，挂在这棵树上，然后隐在一旁。捕鸟人称笼鸟为“繇子”，它们的作用是呼喊。繇子在笼里不懈地转动，每当鸟群从空中飞过，它们便急切地扑翅呼应。它们凄怆的悲鸣，使飞翔的鸟群回转。一些鸟撞到网上，一些鸟落在网外的树上，稍后依然扑向鸟笼。鸟像木叶一般，坠满网片。

丰子恺先生把诱引羊群走向屠场的老羊，称作“羊奸”。我不称这些繇子为“鸟奸”，人类制造的任何词语，都仅在它自己身上适用。

二十四

平常，我们有“北上”和“南下”的说法。向北行走，背离光明，称作向上；向南行走，接近光明，称作向下。不知这种上下之分依据什么而定（纬度或地势？）。在大地上旅行时，我们的确有这种内心感觉。像世间称做官为上，还民为下一样。

二十五

麻雀和喜鹊，是北方常见的留鸟。它们的存在，使北方

的冬天格外生动。民间有“家雀跟着夜猫子飞”的说法，它的直接意思，指小鸟盲目追随大鸟的现象。我留意过麻雀尾随喜鹊的情形，并由此发现了鸟类的两种飞翔方式。它们具有代表性。喜鹊飞翔，姿态镇定、从容，两翼像树木摇动的叶子，体现着在某种基础上的自信。麻雀敏感、慌忙，它们的飞法类似蛙泳，身体总是朝前一耸一耸的，并随时可能转向。

这便是小鸟和大鸟的区别。

二十六

一次，我穿越田野。一群农妇，蹲在田里薅苗。在我凝神等待远处布谷鸟再次啼叫时，我听到了两个农妇的简短对话：

农妇甲：“几点了？”

农妇乙：“该走了，十二点多了。”

农妇甲：“十二点了，孩子都放学了，还没做饭呢。”

无意听到的两句很普通的对话，竟震憾了我。认识词易，比如“母爱”或“使命”，但要完全懂得它们的意义难。原因在于我们不常遇到隐在这些词后面的，能充分体现这些词涵义的事物本身；在于我们正日渐远离原初意义上的“生活”。我想起曾在美术馆看过的美国女画家爱迪娜·米博尔画展，前言有画家这样一段话，我极赞同：“美的最主要表现之一是，肩负着重任的人们的高尚与责任感。我发现这一特点特别地表现在世界各地生活在田园乡村的人们中间。”

二十七

栗树大都生在山里。秋天，山民爬上山坡，收获栗实。他们先将树下杂草，刈除干净。然后环树刨出一道道沟垄，为防敲下的栗实四处滚动。栗实包在毛森森的壳里，像蜷缩一团的幼小刺猬。栗实成熟时，它们黄绿色壳斗便绽开缝隙，露出乌亮的栗核。如果没有人采集，栗树会和所有植物一样，将自己漂亮的孩子自行还给大地。

二十八

进入冬天，便怀念雪。一个冬天，迎来几场大雪，本是平平常常的事情，如今已成为一种奢求（谁剥夺了我们这个天定的权利?）。冬天没有雪，就像土地上没有庄稼，森林里没有鸟儿。雪意外地下起来时，人间一片喜悦。雪赋予大地神性；雪驱散了那些平日隐匿于人们体内，禁锢与吞噬着人们灵性的东西。我看到大人带着孩子在旷地上堆雪人，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一定同样进行着许多欢乐的与雪有关的事情。

可以没有风，没有雨，但不可以没有雪。在人类美好愿望中发生的事情，都是围绕雪进行的。

二十九

一只山路上的蚂蚁，衔着一具比它大数倍的蚜虫尸体，正欢快地朝家走去。它似乎未费太多的力气，从不放下猎物休息。在我粗暴地半路打劫时，它并不惊慌逃走。它四下寻

着它的猎物，两只触角不懈地探测。它放过了土块，放过了石子和瓦砾，当它触及那只蚜虫时，便再次衔起。仿佛什么事情也未发生，它继续去完成自己庄重的使命。

三十

我把麻雀看作鸟类中的“平民”，它们是鸟在世上的第一体现者。它们的淳朴和生气，散布在整个大地。它们是人类卑微的邻居，在无视和伤害的历史里，繁衍不息。它们以无畏的献身精神，主动亲近莫测的我们。没有哪一种鸟，肯与我们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在我对鸟类作了多次比较后，我发现我还是最喜爱它们。我刻意为它们写过这样的文字：它们很守诺言　每次都醒在太阳前面　它们起得很早　在半道上等候太阳　然后一块儿上路　它们仿佛是太阳的孩子　每天在太阳身边玩耍　它们习惯于睡觉前聚在一起　把各自在外面见到的新鲜事情　讲给大家听听　由于不知什么叫秩序　它们给外人的印象　好像在争吵一样　它们的肤色使我想到土地的颜色　它们的家族　一定同这土地一样古老　它们是留鸟　从出生起　便不远离自己的村庄（《麻雀》）

三十一

下面的内容，是我在一所小学见到的，为众多的学生保证书之一。原文抄录如下：

1、老师留的作业要认真按时完成。

2、下课不追跑打闹。

3、不管是不是低声日都不大声说话。

4、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骂人。

5、学校举行什么活动都要听老师的。

6、老师提问要积极举手发言。

7、不逃学，积极参加课外活动为班争光。

8、不管上什么课都不搞小动作，在考试上得到九十分以上。

9、自己的事要自己作。

（三（四）班　孙蕊）

我把这二十世纪末中国少年的誓言记在这里，但不想多说什么。惟愿我们的少年长大后，不再写出类似鲁迅先生曾写过的话："长辈的训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鲁迅《忽然想到》）

三十二

一架直升飞机，从小镇的上空呼啸而过。我看到街上三个孩子蹦跳着高喊："飞机、飞机，你下来，带我们上动物园。"

孩子们不说去别的什么地方，这是缘于生命的，在因袭与指导之外的选择。

三十三

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有两种以上的称呼。

这里讲的，不指西方分类学上物种的"二名法"（用两个

拉丁字构成某一物种名称的命名法，第一字是属名，第二字是种加词），或“三名法”（用三个拉丁字表示生物亚种或变种的命名法，由属名、种加词和变种加词构成）。而指我们认识的事物，大多拥有数个名称，分别称作学名、别名和俗名。它们各自有着神秘的来历，在不同的场所，体现自己独特的作用。比如太阳、亦称日，我还知道北方的农民称之“老爷儿”；鸱鸮，亦称枭，民间则称之“猫头鹰”或“夜猫子”。

学名是文明的、科学的、抽象的，它们用于研究和交流，但难于进入生活。它们由于在特征和感性上与其所指示的事物分离，遭到泥土和民间的抵触；它们由于缺少血液和活力，而死在学者与书卷那里。

别名是学名的变称，与学名具有同一命运。

俗名是事物的乳名或小名，它们是祖先的、民间的、土著的、亲情的。它们出自民众无羁的心，在广大土地上自发地世代相沿。它们既体现事物自身的原始形象或某种特性，又流露出一地民众对故土百物的亲昵之意与随意心理。如车前草，因其叶子宽大，在我的故乡，称作“猪耳朵”；地黄，花冠钟状、甘甜，可摘下吮吸，故称“老头喝酒”。俗名和事物仿佛与生俱来，诗意，鲜明，富于血肉气息。它们在现代文明不可抵御的今天，依然活跃在我们的庭院和大地。它们的蕴意，丰富、动人，饱含情感因素。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我们听到这样的称呼，眼前便会浮现我们遥远的童年、故乡与土地。那里是我们的母体和出发点。

俗名对人类，永远具有“情结”意义。

三十四

在北方的林子里，我遇到过一种彩色蜘蛛。它的罗网，挂在树干之间，数片排列，杂乱联结。这种蜘蛛，体大、八足纤长，周身浅绿与桔黄相间，异常艳丽。在我第一次猛然撞见它的时候，我感觉它刹那带来的恐怖，超过了世上任何可怕的事物。

相同的色彩，在一些事物那里，令我们赞美、欢喜；在另一些事物那里，却令我们怵目、悚然，成了我们的恐怖之源。

三十五

每次新月出现，只要你注意，你会在它附近看到一颗亮星。有时它们挨得极近，它们各自的位置，身处的背景，密切的情形，都让我将它们看作大海上的船与撑船人。可是不久，撑船人便会弃船而去。后来，我查阅了天文方面的书，始知这个撑船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金星，我们熟悉的太阳系第二位行星，地球最近的邻居。由于金星是地内行星，因而它的行踪往往漂泊不定。黄昏在西方最早显现，凌晨在东方最迟隐去的星，就是这个活跃的“撑船人”。在古代，中国人给它起了很优雅的名字：黄昏称它“长庚”，凌晨称它“启明”。希腊人比较粗爽，他们本能地、形象地、诗化地、亲昵地、直截了当地叫它“流浪者”。

三十六

尽管我很喜欢鸟类，但我无法近距离观察它们。每当我从鸟群附近经过，无论它们在树上，还是在地面，我都不能停下来，不能盯着它们看，我只能侧耳听听它们兴高采烈的声音。否则，它们会马上警觉，马上做出反应，终止议论或觅食，一哄而起，迅即飞离。

我的发现，对我，只是生活的一个普通认识；鸟的反应，对鸟，则是生命的一个重要经验。

三十七

在樗树（臭椿）上，有一种甲虫，体很小，花背，象形，生物学称它为象鼻虫或象甲，乡下的孩子叫它“老锁”。它们通常附在樗树的干上，有时很低，伸手可及。只要有人轻轻一碰，它们便迅速蜷起六足，象鼻状的长喙紧贴胸前，全身抱在一起。此时，孩子们抓起一只，对着它不断呼唤：“老锁，老锁，开门！”情真意切，永不生厌。仿佛精诚所至，它最终总会松开肢身，然后谨慎地，像一头小象，开始在孩子们的手上四下走动。

三十八

秋天，大地上到处都是果实，它们露出善良的面孔，等待着来自任何一方的采取。每到这个季节，我便难于平静，我不能不为在这世上永不绝迹的崇高所感动，我应当走到土地里面去看看，我应该和所有的人一道去得到陶冶和启迪。

太阳的光芒普照原野，依然热烈。大地明亮，它敞着门，为一切健康的生命。此刻，万物的声音都在大地上汇聚，它们要讲述一生的事情，它们要抢在冬天到来之前，把心内深藏已久的歌全部唱完。

第一场秋风已经刮过去了，所有结满籽粒和果实的植物都把丰足的头垂向大地，这是任何成熟者必至的谦逊之态，也是对孕育了自己的母亲一种无语的敬祝和感激。手脚粗大的农民再次忙碌起来，他们清理了谷仓和庭院，他们拿着家什一次次走向田里，就像是去为一头远途而归的牲口卸下背上的重负。

看着生动的大地，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一个真理。它叫任何劳动都不落空，它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能看到成果，它用纯正的农民暗示我们：土地最宜养育勤劳、厚道、朴实、所求有度的人。

三十九

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很像人与他的生命的关系。在无知无觉的年纪，他眼里的生命是一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井，可以任意汲取和享用。当他有一天觉悟，突然感到生命的短暂和有限时，他发现，他生命中许多宝贵的东西已被挥霍一空。面对未来，他开始痛悔和恐惧，开始锻炼和保健。

不同的是，人类并不是一个人，它不是具有一个头脑的整体。今天，各国对地球的掠夺，很大程度上已不仅仅为了满足自己国民的生活。如同体育比赛已远远超出原初的锻炼肌体的意义一样，不惜牺牲的竞争和较量，只是为了获得一

项冠军的荣誉。

四十

我的祖父、祖母，两个年逾八十的老人。一次在我回乡下去看望他们时，他们向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深夜，他们突然被响动的院门惊醒。借着微弱的月光，他们看到进来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这个人来到屋前，拍着屋门，含混地叫着："大爷您开开门！大爷您开开门！"他的叫声不断，声音可怜。听着这陌生而又哀求的叫声，起来的祖父给他打开了门。这是一个壮年汉子，喝了酒，自称走错了门，说了几句什么，不久便退出去了。

有着一生乡村经验与阅历的祖父、祖母，依然保持着人的最初的心和他们对人的基本信任。

四十一

与其他开端相反，第一场雪大都是零乱的。为此我留意好几年了。每次遇到新雪，我都想说："看，这是一群初进校门的乡下儿童。"雪仿佛是不期而至的客人，大地对这些客人的进门，似乎感到一种意外的突然和无备的忙乱。没有收拾停当的大地，显然还不准备接纳它们。所以，尽管空中雪迹纷纷，地面依旧荡然无存。新雪在大地面前的样子，使我想象一群临巢而不能栖的野蜂，也想象历史上那些在祖国外面徘徊的流亡者。

四十二

在生命世界，一般来讲，智慧、计谋、骗术大多出自弱者。它们或出于防卫，或出于猎取。

假死是许多逃避无望的昆虫及其他一些弱小动物，灾难当头拯救自己的惟一办法。地巢鸟至少都要具备两种自卫本领：一是能使自身及卵的颜色随季节变化而改变；二是会巧设骗局引开走近己巢的强敌。蛛网本身就是陷井，更有一种绝顶聪明的蜘蛛，会分泌带雌蛾气味的小球，它先把小球吊在一根丝上，然后转动，引诱雄蛾上钩。在追捕上低能的蛇，长于无声地偷袭；澳大利亚还有一种眼镜蛇，能以尾尖伪装小虫，欺骗蛙鼠。强者是不屑于此的。非洲的猎豹出猎时，从不使用伏击。动物学家说，鲨鱼一亿年来始终保持着它们原初的体型。没有对手的强大，使它抵制了进化。

看历史与现实，人类的状况，大体也是这样。

四十三

命名，是一种前科学的事情。在科学到来之前，每个事物都有它们自己土生土长的名称。这些名称身世神秘，谁也无法说清它们的来历，它们体现着本土原始居民的奇异智力、生动想象、无羁天性和朴素心声，与事物亲密无间地结为一体。科学是一个强大的征服者，它的崛起，令所有原生事物惊恐。它一路无所顾忌的行径，改变了事物自体进程。科学的使命之一，就是统一天下事物的名称。它以一种近似符号的新名，取代了与事物有着血肉联系的原始名称。比如，美

洲印第安人所称的“饮太阳血的鸟”，被科学定名为蜂鸟；西方农夫所称的“魔鬼的信使”，被科学定名为狐蝠；非洲部落猎人们所称的“黄色的闪电”，被科学定名为猎豹。

科学的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而各地的“原生力量”，也从未放弃过抵抗。

四十四

《百年孤独》的第一页，有这样一个细节。在表演了磁铁的魔力后，神秘的吉卜赛人墨尔基阿德斯，对老布恩地亚讲："任何东西都有生命，一切在于如何唤起它们的灵性。"

季节也是有生命的。为了感受这一点，需要我们悉心体验，也许还需要到乡村生活一年。以冬天为例，在北方，在北京，每年一进入公历一月，我就会感受到它显著的变化。此时的冬天，就像一个远途跋涉后终于到达目的地的、开始安顿下来的旅人。它让我想象乡村的失去光泽和生气，不再驾车的马和三年以上的公鸡。一个活泼的、冲动的、明朗的、敏感的、易变的冬天，已一去不返。而另一个迂缓的、安稳的、沉郁的、灰暗的、阴冷的冬天，已经来到我们身边。这是生命悲哀的转折。由此开始的，是冬天的一段让我们最难耐的时期。它给我们造成的心境，与我们从手上不再有书籍，心中不再有诗歌，已获取了一定财富或权力的人到中年者那里，领略的大体相同。

四十五

自从出现了精神分析学家，人类似乎便彻底改变了对自

己的看法。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作家们笔下的人，更让读者害怕。德国女作家沃尔夫在她的小说《一只公猫的新生活观》中，借公猫麦克斯之口说："有些人希望使自己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忘记自己是动物的后裔，这是同他们缺乏生理知识有关。"

其实，这是对动物的污蔑和曲解。在影视上或书本里或生活中，人们知道了多少动物互助和利他的感人事迹！最近我从科教片《燕子》里知道，燕子在喂雏期，为了觅食，每天要飞出去二百多次，如果你想帮帮它，它回来也会将你放在巢边的昆虫叼走。雏燕出巢后，在野外，会受到任何一只成燕照顾。这仅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新闻中不是也有关于"狼孩"和"熊孩"的报道吗？最近它还告诉人们，一群骆驼抚养了死于沙暴中的阿拉伯牵驼人的两个婴儿。

在这则随笔中我是想说，如果人抱定人类的本性就是动物，从而做任何事情都心安理得，原谅自己，那么他其实是应验了中国民间的一个说法：禽兽不如！

四十六

一九九一年元旦，一个神异的开端。这天阳光奇迹般恢复了它的本色，天空仿佛也返回到了秋天。就在这一天，在旷野，我遇见了壮观的迁徙的鸟群。在高远的天空上，在蓝色的背景下，它们一群群从北方涌现。每只鸟都是一个点，它们像分巢的蜂群。在高空的气流中，它们旋转着，缓慢地向南推进。一路上，它们的叫声传至地面。

我没有找到关于鸟类迁徙的书籍，也不认识鸟类学家。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鸟类冬季迁徙，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这是些什么鸟。在新年的第一天，我遇见了它们，我感到我是得到了神助的人。

四十七

一次，我乘公共汽车，在我的邻座上，是一位三十几岁带小孩的母亲。小孩还很小，正处在我们所说的咿呀学语时期。一个漂亮的、机灵的小男孩。在车里，母亲不失时机地教他认识事物，发音说话。他已经会说些什么了，一路上我都听着他初始的声音。忽然他兴奋地高喊："卖鱼的！卖鱼的！"原来在自行车道上，有两个蹬平板三轮车的小贩。两个三轮车上驮的都是囤形的盛着水的大皮囊，与我们在自由市场常见的一样。

到站下车时，我问那位母亲："您的小孩有一岁吗？"答："一岁多了。"

四十八

三月是远行者上路的日子，他们从三月出发，就像语言从表达出发，歌从欢乐出发。三月连羔羊也会大胆，世界温和，大道光明，石头善良。三月的村庄像篮子，装满阳光，孩子们遍地奔跑，老人在墙根下走动。三月使人产生劳动的欲望，土地像待嫁的姑娘。三月，人们想得很远，前面有许许多多要做的事情。三月的人们满怀信心，仿佛远行者上路时那样。

四十九

梭罗说，文明改善了房屋，却没有同时改善居住在房屋中的人。关于这个问题，我这样想过：根本原因也许就在于孩子们与成人混在了一起（这里暂不涉及人性因素）。

可以打个比方：孩子们每天在课堂精心编织着他们的美丽的网，但当他们放学后，这张网即遭到社会蚊蚋的冲撞。孩子们置身在学校中，实际就是一个不断修复他们破损了的网的过程，直至某一天他们发现这种努力的徒劳性。

成人世界是一条浊浪滚滚的大河，每个孩子都是一支欢乐地向它奔去的清澈小溪。孩子们的悲哀是，仿佛他们在世上的惟一出路，便是未来的同流合污。

五十

我看过一部美国影片，片名已想不起来了。影片这样开的头，一个在学校总挨欺负的男孩，仿佛被神明选定，得到了一部巨大的书。这是一部童话，讲的是一个名叫“虚无”的庞然怪物，吞噬幻想国的故事。当最后的毁灭逼近，女王即将死亡时，书告诉这个男孩，拯救幻想国和女王的惟一办法，是由他大声为女王起一个新名。

这是一部寓意很深的影片，它让我想到泰戈尔讲的一句话：“每一个孩子生出时所带的神示说：上帝对于人类尚未灰心失望呢。”

第二辑

上帝之子

在所有生命里，我觉得羊的存在蕴义，最为丰富。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羊自初便位于对立的一极，它们草地上的性命，显现着人间温暖的和平精神；它们汇纳众厄的孺弱躯体，已成人类特定观念标准的象征和化身。

羊，仿佛天然的牺牲和祭品，宗教看中的牲灵。从古老的犹太人起，它们即被选出，开始承负自己壮烈的替罪使命。(古犹太人为了安抚旷野邪灵阿撒泻勒，每逢赎罪日要抽签选出一羊，将其牵到耶路撒冷城外绝崖上抛下，以带走全族所犯罪愆。)

那从上帝所在差来，为作见证的施洗约翰，指着行走的耶稣告诉两个门徒：“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罪和死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恩典和永生要藉着耶稣基督的牺牲丰盛地莅临人间。上帝拯救世人，通过他的儿子的生、死和复活而实施。“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里，基督和羊的前定舍身命运，奇异地相同。

它们自身，也被圣书直率无碍地并列在一起。

过去，我称羊为恶的承受者。在我亲眼看了它们近乎自觉的赴难情形后，我开始感到，它们的生命，有着某种人所不解的神性。我觉得我应把它们看作基督之后的，仍存尘世的“上帝之子”。

一九九〇年夏，我去新疆旅行，在南疆的于田和民丰，我看到了羊现代受难的全部过程。

在于田的巴扎（波斯语：市集）一角，清晨，走了一夜的牧羊人已从很远的牧场把羊领到这里。有山羊，有绵羊，白羊驯善，黑羊庄重。它们在冥冥预感中，同命相依地挤在一起。这个僻静的角落，专做羊的交易。太阳上升的时候，巴扎上的羊商开始汇聚。这是一些将羊买进，将肉卖出的悠久生意人。他们进入羊群，随心挑捡、估量。羊群晃动着，涌来涌去，但没有一只羊，肯逃离这不设围栏的凶险场所。经过几番价格往还，在中介人的撮合下，买卖双方最终伸手相握，表明交易做成。我手里有几张现场照片，可以清晰看到交易完毕的羊商，左手拖只山羊，右手拖只绵羊，未做任何绑缚，顺利离开那里的图景。羊放弃了它们头顶的武器，它们被倒曳着，前蹄划地，一路将干燥的尘土带起。

我没有在于田看见屠场。到了空旷的民丰，我才发现，原来屠场就隐在巴扎后面。在此我第一次真正懂得了，羊意味什么。我的所见，令我吃惊。

两个孩子，徒手赶来一只高大的公羊，走进屠场。血腥气息的突然刺激，使公羊警醒。它本能地转身欲退，一个孩子伸手一拦，又使它恢复了镇定。它走到悬挂同胞尸身的横

梁下，一个屠师猝然将它搬倒，头扭向血坑，然后操刀。它没有踢蹬，没有挣扎，甚至没有哀叫，它承受着，大睁柔弱的、涵义深远的眼，阵阵抽搐的壮硕身躯，渐渐平静。这位屠师用生涩的汉话，自豪地告诉我：他杀好一只羊，从屠宰、剥皮、到掏出内脏，不会超出十分钟。

新疆的这幕，刻进了我的脑子，我终生难忘。（我无意为写作本文在此尽兴渲染、夸张，或营造神秘气氛。）它时常让我想起人类尚未放弃的一种脆弱努力。植根于文明之上，为基督孜孜倡导与传扬，成为世代圣贤最殷切声音的宽宥与忍让精神，在崎岖的历史上，终于衍变为自觉的非暴力主义。这个被列夫·托尔斯泰喻为“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的全部学问的拱顶”的非暴力主义或不对抗说，除了受到少数前贤、信徒的尊崇与践行，始终难于在整个人寰普及。令我感慨的是，通过羊的生命，它得到了最为极端的体现。

非暴力主义也许是有史以来令世人最难以理喻和接纳的一种主张或思想。自新疆之行后，我一直试图追溯它的渊源，理解它的根基。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旧约》）的血腥公理，到“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新约》）的自我牺牲，我看到一个伟大的心灵张开了，它祈望以爱容纳和化解人间的一切事情。（托尔斯泰认为，基督教不是神学，而是对于生活的崭新理解。）当人类终于醒悟暴力不能彻底根除暴力的时候，它开始尝试另外的办法。我把这看作人类精神衍进中的一次伟大变革，它的意义不会亚于火的使用和文字的诞生。

在西方，非暴力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一并被

称作二十世纪三大重要革命。(托尔斯泰是现代完整阐述非暴力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影响并引发了本世纪的两大非暴力主义运动。在托尔斯泰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非暴力主义思想的理性根基：报复和以恶还恶是增加恶。减少暴力这种恶的唯一办法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暴力。)这里，特指“圣雄”(意为伟大的灵魂)甘地倡导的印度“非暴力抵抗运动”，及继起的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与历史的细节一致，两位崇高的非暴力主义促进者与践行者，最终还是死于他们毕生不以暴力对抗的罪恶暴力。这近似必然的悲壮结局，使广大的普通民众对非暴力主义试图通过自我受难与牺牲(一个信奉非暴力抵抗的人，是天生要受人欺负的。——甘地)从而溶化人性坚冰的光辉努力，始终存有异议。

当人围绕诸如“施恶”与“受恶”建立自己的尺度与法则，并于此争战不已时，在更大的背景下，我看到神沉默不语。它有自己的公正，它以一种人所不见的大的循环，保持着万物的终极平衡：草食泥土，草被草食者食；肉食者食草食者，肉食者被泥土食。在这样的前定秩序面前，任何狭隘的自诩强大与得胜，都将遭到它的蔑视或耻笑。

从海洋来的雨，还要被河流带回海洋。那吃草的，亦被草吃；那吃羊的，亦进羊的腹里。

一九九二年七月初写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改定

放 蜂 人

放蜂人是大地上寻找花朵的人，季节是他的向导。

一年一度，大地复兴的时候，放蜂人开始从他的营地起程，带着楸木蜂箱和帐篷。一路上，他对此行满怀信心。他已勘察了他的放蜂线路，了解了那里的蜜源、水源、地形和气候状况。他对那里蜜源植物的种类、数量、花期及泌蜜规律，已了如指掌。他将避开大路，在一座林边或丘旁摆下蜂箱，巢门向南。他的帐篷落在蜂场北面。

第一束阳光，满载谷粒的色泽和婴儿的清新，照到蜂场上。大地生气勃勃，到处闪亮。蜂群已经出巢，它们上下飞舞，等待着侦察者带回蜜源的消息。放蜂人站在帐前，注视着它们。他刚刚巡视了蜂场，他为蜂群早晨的活力，感到兴奋。他看蜜蜂，如同看自己的儿女，他对它们，比对自己的身世还要熟悉。假若你偶然路过这个世界一隅，只要你表情虔诚，上前开口询问，他会热心给你讲蜜蜂的各种事情。

放蜂人在自然的核心，他与自然一体的宁静神情，表明他便是自然的一部分。每天，他与光明一起开始工作，与大

地一同沐浴阳光或风雨。他懂得自然的神秘语言，他用心同他周围的芸芸生命交谈。他仿佛一位来自历史的使者，把人类应有的友善面目，带进自然。他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与自然最古老的一种关系。只是如他恐惧的那样，这种关系，在今天的人类手里，正渐渐逝去。

放蜂人或许不识文字，但他像学者熟悉思想和书册那样，熟悉自然，熟悉它的植物和大地。他能看出大地的脉络，能品土壤的性质；他识别各种鸟鸣和兽迹，了解每样植物的花事与吐蜜的秘密。他知道枣树生长在冲积土上，荞麦生长在沙壤上，比生长在其它土壤上流蜜量大；山区的椴树蜜多，平原的椴树蜜少；北方的柳树流蜜，南方的柳树不流蜜。他带着他的蜂群，奔走于莽莽大地。南方的紫云英花期一终，他又匆匆赶到北方，那里，荆棵的蓝色花序正在开放。他常常适时溯纬度而上，以利用纬度之差，不失时机地采集生长在不同地区的同一种植物的花蜜。

“蜜蜂能改变人性。”这是放蜂人讲的一句富于文化色彩的话。如果你在蜂场呆上一天，如果你像放蜂人那样了解蜜蜂，你会相信他的这个说法。

我把放蜂人讲的关于蜜蜂（主要指工蜂）的一生，记在这里：一日龄，护脾保温；三日龄后，始做清理巢房，泌蜡造脾，调制花粉，分泌王浆，饲喂幼虫、蜂王和雄蜂等内勤工作；十五日龄后，飞出巢外，担负采集花蜜、花粉、蜂胶及水等外勤重任；三十日龄后，渐为老蜂，改做侦察蜜源或防御敌害的事情。当生命耗尽，死亡来临，它们便悄然辞别蜂场，不明去向。

这便是蜜蜂短暂的一生，辛劳不息，生命与劳作具有同一涵义。放蜂人告诉我，在花丛流蜜季节，忘我的采集，常使蜜蜂三个月的寿命，降至一个月左右。它们每次出场，要采成百上千朵花的蜜，才能装满它们那小小的蜜囊。若是归途迷路，即使最终饿死，它们自己也不取用。它们是我们可钦可敬的邻居，与我们共同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它们体现的勤劳和忘我，是支撑我们的世界幸福与和睦的骨骼。它们就在我们身边，似一种光辉，时时照耀、感动和影响着我们，也使我们经常想到自己的普通劳动者和舍生忘死的英雄。

放蜂人是世界上幸福的人，他每天与造物中最可爱的生灵在一起，一生居住在花丛附近。放蜂人也是世界上孤单的人，他带着他的蜂群，远离人寰，把自然瑰美的精华，源源输送给人间。他滞于现代进程之外，以往昔的陌生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他孤单的存在，同时是一种警示，告诫人类：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鸟的建筑

鸟巢是鸟的建筑。和我们盖房子不同，鸟筑巢不是为定居。鸟只在繁殖期筑巢。

营巢是鸟的本能和天性，但不是所有的鸟都自行营巢。比如啼叫美妙，声音与农业关联的杜鹃，即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典型。它们的“鹊巢鸠占”的强盗行径，即使在客观化的鸟类学家笔下，也常常受到道义上的指斥。杜鹃有一种其他鸟类都不具备的特异本领，它能使自己的蛋在颜色、形状和大小上，与宿主的蛋完全相同，并可随各地宿主的变化而改变。其以假乱真的程度，让敏感的宿主毫不觉察。当它把蛋产进或衔入宿主（往往是苇莺）的巢后，随之发生的必然是，先行孵出的杜鹃雏鸟要将宿主的蛋或雏鸟全部挤出巢外，以独享义亲哺养。这便是我们情感上难于宽恕杜鹃的地方。

我所知道的不自营巢鸟，还有北方凶悍的红脚隼，在这方面，它以欺负乌鸦闻名。在民间被称作“老鸹翠”的三宝鸟，亦时常露出觊觎鹊巢的流氓习性。而且只要它去侵占，总能在厚道的喜鹊那里得逞。

不营巢鸟，这里还可举出一位。可取的是，它从不贪慕别鸟之巢。它把蛋无所顾忌地直接产在地面、岩上或丛薮间，不作任何铺垫。对它我们至多说，这是鸟类中彻头彻尾的懒汉。它昼伏夜出，羽似枯木。它有一个十分典雅的学名：夜鹰。不过，并非倍受西方诗人赞颂的那种。

鸟类学家依据鸟巢的位置和性质，把鸟巢分为地面巢、水面巢、洞穴巢、建筑物巢和编织巢等几种类型。

地面巢大多简单、随便，往往仅在地面凹处略敷草物即告完工。这种巢，主要由雉、雁、鸭、鹤等笨拙的大型鸟类所为。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像云雀、百灵、歌鸲、画眉这些名字美丽，叫声动听的玲珑小鸟，也在地面营巢。当然，它们的巢编织得都很精致。这是些疏于林木，常年出没在旷野，为土地处处留下歌声的可爱精灵。在水面营巢的鸟屈指可数，能够列举的只有游禽中永不上岸的䴙䴘和涉禽中善游的骨顶鸡与董鸡。它们借助水生植物搭造的可随水面升降的盘状浮巢，风险最小。洞穴巢包括崖壁洞穴和树干洞穴两种，前者的主人主要有翠鸟和沙燕；后者居多，如椋鸟、山雀、斑鸠、八哥、鹡鸰及肮脏的戴胜等，都是天然树洞或啄木鸟弃巢的受益者。如果顺着这个行列数下去，我们还会惊讶地发现鸳鸯。应该指明的是，营树洞巢的鸟，只有攀禽中的啄木鸟和䴓，真正具备开凿本领。啄木鸟还有一种英雄秉性，即它从不使用自己往年的旧洞。利用我们的屋宇营巢的鸟（不提麻雀），主要为燕科成员，原因在于它们的泥巢无法在露天筑造。最后说到的编织巢，就是指我们观念上认定的，代表“鸟巢”这一词语本义的，由鸟类中广大的鸣禽在树上（个别

在草丛或灌木基部）精心营建的巢。这是那群勤奋的鸟类艺术家呕心沥血的作品，也是我们这篇短文想要谈论的核心。

除涉禽中的鹭，游禽中的鹈鹕和猛禽中部分鹰隼（这是些在树上筑粗陋大巢的鸟）外，编织巢几乎全部为雀形目鸟类所造。它们长于鸣啭，巧于营巢，故根据分类上的说法，我们前面又称它们为鸣禽。雀形目是新鸟亚纲中种数最多的一目，其庞大数量占现代鸟类总体一半以上。

编织巢的形态，可说多姿多彩。我们易于见到的杯状巢、碗状巢、盘状巢及瓶状巢，是其中主要的几种。营哪种巢型，与鸟的科属有关。但我愿意相信，它更取决于鸟类个体的偏爱与审美因素。因此，这里无规律可循。

杯状巢是多数营巢鸟喜爱的一种巢型，像我们熟悉的伯劳、卷尾、柳莺、寿带等夏候鸟，都营此型巢。太平鸟、灰山椒鸟、乌鸫及北红尾鸲等，营碗状巢。树鹨和灰喜鹊的巢很浅，呈盘状。攀雀和棕扇尾莺的巢收口，巢体似瓶。文鸟、黄眉柳莺和“告春鸟”短翅树莺，能够营造顶部具盖，侧面开门的球状巢。更为精巧和高超的，是黄鹂和绣眼鸟的吊篮式悬巢。南方有一种富于传奇色彩的小鸟，会将芭蕉或其他大型树叶卷合，然后在叶缘穿孔，贯以丝线，缝成袋状巢。这种天才的小鸟，鸟类学家就叫它“缝叶莺”。

真正和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在我们的视域内最为显著的鸟巢，实际是喜鹊粗糙的球状巢。这种“仰鸣则晴，俯鸣则雨，人闻其声则喜”（《禽经》）的民间吉祥鸟，同淳朴的麻雀一道，终年祥和地围绕着我们。特别是在空旷的冬天，它们的巢很像一座座村庄，醒目地坐落在原野高大的树上（每

巢都有一定巢距的巢区。个别也有一树双巢现象。在北京的沙河附近，我曾见过一树四巢）。每次看到这些高耸的星罗棋布的“家”，我都很动情，我觉得这是一种世间温暖与平安的象征，是这个季节比雪与太阳升落更优美的景色。

在神造的东西日渐减少、人造的东西日渐增添的今天，在蔑视一切的经济的巨大步伐下，鸟巢与土地、植被、大气、水，有着同一莫测的命运。在过去短暂的一、二十年间，每个关注自然和熟知乡村的人，都已亲身感受或目睹了它们前所未有的沧海桑田性的变迁。对这种变化的细节描述或激扬臧否，不仅会拖长我们的文章，偏离我们的主题，也有悖时宜。故这里暂不涉及。

一九九三年五月

观《动物世界》

一

一生能捕捉九千只蚜虫的农业警察瓢虫，有个大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个大敌竟是貌似与瓢虫风马牛不相及的蚂蚁。在蚂蚁和蚜虫之间，原来存在着一种秘密的互惠关系：蚜虫供应蚂蚁充足的粮食（它们进食时排泄的一种含有糖分的分泌物），蚂蚁充当蚜虫忠实的卫士。一旦瓢虫接近蚜虫，就会遭到这个下作的既得利益者拼死攻击。

由于蚂蚁的庇护，许多庄稼的罪犯未能受到应有的惩处。

二

獴以头小闻名。它们没有前额，眼睛几乎高过头顶。它们是那种只有了解了其行为和习性，才能使我们喜爱的动物。獴有一个友爱互助的集体，每次外出觅食，总有三、两只獴自告奋勇争做哨兵。它们占据制高点，后肢挺立，头不

懈地左右转动。它们的头似乎能转360度。獴以蛇、蝎子、蛙及鼠等为食物，它们自己也被狐狸和鹰列进了食谱。单枪匹马的獴，最终难逃饿死的命运。面对陆地和天空的立体袭击，它觅食与警戒无法兼顾。

当两群獴不期而遇，看它们各自的神情，仿佛对方是自己更大的敌人。

三

如果蝎子与蜈蚣争斗，双方顶多打个平手，因为它们各自的毒对对方都不起作用。听着解说员出色的解说，我忽然想到前些年北岛那两句广为人知的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蝎子与蜈蚣的战事和诗的双重启发，使我随手写下这样两句话：卑鄙对付卑鄙常常失灵，卑鄙对付高尚往往得逞。

四

假设动物世界亦搞评选，企鹅的头上至少要戴两顶桂冠。其一，它们是世界上最不畏寒的动物；其二，此项与它们的善良过度有关。前者人所共知，后者几句话也可说明，即在企鹅生儿育女期间，大摇大摆出入它们家园的贼鸥，可以无所顾忌地抢走它们的蛋，它们既不奋起抗击，也不表示愤怒，完全视若无睹。

多少代过去了，企鹅的善和不幸丝毫没有感化贼鸥。

五

这则随笔的主人公背着一个使其蒙羞的学名：鸨。这个字既形体猥琐，发音沉闷，也易使我们联想到旧时开设妓院的女人。鸨，鸟纲、鹤形目、鸨科，体比雁略大，朴素无华。同其他弱小一样，鸨以植物和躲避为生。孵卵育雏是鸨一生最险恶的时期，它废寝忘食，片刻不敢放松警惕。当它看见狐狸远远朝这个方向走来，便立即起身暴露自己，装作伤残的样子，引开狐狸。

幸亏狐狸没有狡猾到识破鸨的计谋的地步。谢谢公正的主！

一九九三年九月

我的邻居胡蜂

（一）

胡蜂即我们通常所称的马蜂，也称黄蜂。

它们是在我搬入新居三个月后出现的。六月上旬的一天，我在书房意外地发现了它们。它们的巢筑在我的书房窗外右扇窗框上端的一角，隔着玻璃，我能清楚地看到它们的建设工作。它们的工程刚刚开始，巢还很小，尚未成形，安静的工地上仅有三、两个建设者。

它们没有去别的地方，没有选择四层或六层，而把巢筑在了我的窗下。我对它们的信赖，深为感动。我愿意相信这是一种纯粹的不具任何含义的偶然，但又隐隐觉得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可以引申的其他因素。在《大地上的事情》系列随笔中，我曾指责过那种无端焚烧胡蜂蜂房的强盗行径。

我的新来的邻居，受到了诚挚欢迎。它们是我远方的客人。为了避免以后打扰它们，我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牺牲。我把这扇窗户彻底封上，在已经来临的夏季里，我的书房将只开另一扇窗。尽管这会有诸多不便，但我依然感激它们。我

的给予，远远不及它们为我带来的东西。

胡蜂是昆虫世界不多的具备防卫武器的个体。它们的大名鼎鼎的武器，为卑微的昆虫赢得了外界应有的敬畏与肯定，但也因此给它们自身招致了许多莫名的厄运。很早的时候，我曾试图写一篇关于昆虫的童话，这样开始："在昆虫的美丽国度里，大家各尽职守，一切井然有序。熊蜂是街头巡视的警察，胡蜂是边境护卫的士兵，它们装备精良，但从不主动……"的确，在它们与我们的敌对历史上，可以断定，不会有任何一次冲突真正起因于它们。

我的邻居的工程，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坐在书房里，每天我都感受到它们带来的新鲜的原野气息。它们的巢在渐渐扩大，工地上的建设者不断增加。它们将生命中的两件大事非凡地结合起来，建设与繁殖和谐地同步推进。它们每建成一个巢间，即注进一卵。幼蜂破巢而出后，立刻便会投入工作，为新的生命继续诞生加紧建设。这一感人的过程，构成了它们完美的一生。

即使像胡蜂这样拥有锐利自卫武器的强悍生命，亦仍需倚靠它们庞大的数量，才能在布满死亡陷阱的世上不灭地延续下去。我的邻居的建设与繁殖，一直持续到九月，方悄然终止。此时，它们的巢，已碗口大小；它们的数量，浩浩荡荡。

进入十月，气温便完全主宰了它们。它们密集地覆盖在巢上，抵御着寒冷的步步进逼。它们已不再觅食，甚至很少蠕动。它们对未来似乎早有预感，安然等待那神秘时刻的降临。十月下旬的一个早晨，我终于发现，它们已全部无影无

踪。我不知它们何时离去的，不在它们去了哪里。它们仿佛是一群候鸟，无声地告别了自己的生息之地。

一年过去了，它们一去不返，没有再次出现。它们怎样过冬，怎样进行生命的新陈更替，是它们自己的秘密。它们遗下的巢，依然悬挂在那里，成为我的书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让我想象一段稍纵即逝的历史，一个家族盛衰或王朝兴亡的故事。它孕育的生命，我知道已散布四方，正继续做着它们未竟的大事。

一九九三年八月

我的邻居胡蜂

（二）

在一篇同题散文里，我已经写过它们。现在，我所以重复写下这个题目，是由于它们今年再一次，以一种奇迹，与我比邻而居。

还是在我的书房窗外，上次的空巢，依然悬挂在一角，这次它们将巢筑在了外面窗顶的中央。这一次，我更清晰地目睹了它们的整个建设过程，及它们灿烂的一生。

与上次一样，它们的创业，起始于六月。它们具有一种足以令它们在我面前，倍感骄傲和自豪的建设速度。到了六月的下旬，它们建设中的新巢，已同那只空巢一般大小。

它们真正的建设奇迹，出现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这段时间里。这期间，它们源源不断扩充的建设大军，使它们的巢以每天一厘米的速度向外围推进。七月十九日，隔着玻璃，我首次用尺量了巢，此时巢的直径为十三厘米。到了八月三日，巢的直径已达二十八厘米。八月三日后，它们的建设便骤然终止，这个尺寸，保持至今。尽管我拥有十八岁前宝贵的乡

村见闻和经验，但如此巨大的蜂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在它们半个月的建设高潮期，我多次计数了，巢上每分钟至少有八、九只蜂返回或飞离。它们采集巢材、猎食、取水，各司其职，往来不息。它们天一亮即开始工作，直到天黑才会停止。最后回来的蜂，往往已不能准确找到巢的位置。即使一般的阴雨天，也不能把它们的热烈工作中断。

出猎归来的蜂，行程非常沉重。它们抱着比它们的头部大得多的猎物（一般是由青虫构成的球），艰难地盘旋上升。到了五楼的巢上，它们将猎物分给在家的留守者，由这些蜂逐穴饲喂幼蜂。而它们稍事休整，两只前足捋捋触角，便再次离巢远行。

我长时间地盯过一只取水的蜂。它的上升，是直线的；口衔的水珠，晶莹耀眼。它上升，降下，一刻不停地往返于巢与楼下的水洼之间。过度的辛劳，使它负重上来时，有时不得不先落在巢下的窗上，然后再爬行完成它的工作。这个感人的情景，使我猛然想到一件我早应为它们做的事情。我拿来一个盘子，盛上水，放在外面的窗台上。但直到傍晚，没有一只取水的蜂，走这个捷径。

一天上午，我正在书房读一本小书，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忽然，窗外传来一阵翅膀的声响，一只灰鸽前所未有地落在了我的窗台上。它收翅站定，仰头看了看窗顶，当它发觉我正在注视它时，便马上飞走了。此时，我才注意蜂巢，我看到全巢的蜂，双翅展开，触角直挺，一动不动：群起而战的自卫，瞬息就要发生。尽管鸽子已经离开了，但它们这种令人震慑的临战姿态，依然保持了数分钟。

自八月二十三日起，接连几天，巢上都有尚未羽化的乳白色幼蜂掉下。这些脱离襁褓的生命，不久即通体变为一种黑色焦状的东西。起初，我有些不解。当我发现它们出巢的频率显著减少，我才恍然明白：它们对节气的神秘感应，已指引它们全面停止饲喂幼蜂。而这一天，八月二十三日，恰是“处暑”。

它们不再饲喂幼蜂，也早已终止筑巢，它们自己食用很少。因此，每天除偶有个别蜂出行，它们只在巢上嬉戏打闹。它们不时纠结一团，随后像一滴水那样，重重地砸在窗台上。坐在书房里，我时常会听到它们摔下的声响。它们松开起飞的样子，很像一群满身泥土的乡下儿童。是的，它们的童年，在它们完成一生的使命后刚刚出现。

到了十月九日，这天，风和日暖。午后，我发现许多蜂意外地起飞了，我明白，这意味着它们告别的日子已到。在依依不舍地环巢飞舞后，第一批蜂开始离去。接着，十月十三日，十九日和二十二日，都有蜂离巢。它们挑选的，都是好天。而最后的几只蜂，在渐渐进逼的寒冷中固守着家园，一直坚持到了十月三十一日。

它们全部离去了，我不知它们去了哪里，不知它们与上次那群蜂是否有亲缘联系。我不想向昆虫学家请教，也不想查阅有关书籍，我愿意尊重它们对我保守的这些秘密。它们为我留下的巢，像一只籽粒脱尽的向日葵盘或一顶农民的褪色草帽，端庄地高悬在那里。在此，我想借用来访的诗人黑大春的话说：这是我的家徽，是神对我的奖励。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去看白桦林

我常常这样告诫自己，并且把它作为我生活的一个准则：只要你天性能够感受，只要你尚有一颗未因年龄增长而泯灭的承受启示的心，你就应当经常到大自然中去走走。

我去看白桦林时，是在秋天。秋天旅行是一种幸福，木草丰盈，色彩斑斓，大地的颜色仿佛在为行者呈现。世界上有许多事物，往往是一种事物向另一种事物转化时的过渡。它们由于既不属于前者，又不属于后者，便获得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们由于既包含了前者，又包含了后者，从而更加饱满和丰富。黎明和黄昏比白昼与黑夜妩媚，春天和秋天比夏天与冬天灿烂。当我试图描述所见的一角山隅或一片滩地，我感到了人类语言的虚弱和简单。俄国诗人蒲宁说："诗人不善于描写秋天，因为他们不常描绘色彩和天空。"可供诗人选择的文字仍然有限，许多词汇还有待我们创造出来。

我平生没有实地见过白桦林。但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在白桦与我之间存在着某种先天的亲缘关系，无论在影视或图片上看到它们，我都会激动不已。我相信，白桦树淳朴正直

的形象，是我灵魂与生命的象征。秋天到白桦林中漫步，是我向往已久的心愿。我可以想象，纷纷的落叶像一只只鸟，飞翔在我的身旁，不时落在我的头顶和肩上。我体验这时的白桦林，本身便是一群栖落在大地上的鸟，在一年一度的换羽季节，抖下自己金色的羽毛。

我是走了几个地方后，在围场北部的“坝上”找到它们的。这里的节气远远早于北京地区，使我感到遗憾的是，白桦林的叶子已经脱尽。尽管我面对的是萧瑟凄凉的景象，我也没有必要为白桦林悲伤。在白桦林的生命历程中，为了利于成长，它们总会果断舍弃那些侧枝和旧叶。我想我的一生也需要这样，如果我把渐渐获得的一切都紧紧抓住不放，我怎么能够再走向更远的地方？

在落满叶子的林间走动，脚下响着一种动听的声音，像马车轧碎空旷街道上的积水。当我伸手触摸白桦树光洁的躯干，如同初次触摸黄河那样，我明显地感觉到了温暖。我深信它们与我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的体内同样有血液在流动。我一直崇尚白桦树挺拔的形象，看着眼前的白桦林，我领悟了一个道理：正与直是它们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哪棵树在生长中偏离了这个方向，即意味着失去阳光和死亡。正是由于每棵树都正直向上生长，它们各自占据的空间才不多，它们才能聚成森林，和睦安平地在一起生活。我想，林木世界这一永恒公正的生存法则，在人类社会同样适用。

一九八八年四月

美丽的嘉荫

踏上嘉荫的土地，我便被它的天空和云震动了。这里仿佛是一个尚未启用的世界，我所置身的空间纯粹、明澈、悠远，事物以初始的原色朗朗呈现。深邃的天穹笼罩在我的头顶，低垂的蓝色边缘一直弯向大地外面，我可以看到团团白云，像悠悠的牧群漫上坡地，在天地的尽头涌现。尽管北面的地平线与南面的地平线在视觉上是等距的，一种固有的意识仍然使我觉得，南方非常遥远，而北方就在我脚下这片地域。我的“北方”的观念无法越过江去，再向远处延伸，我感到我已经来到了陆地的某个端点。看着周围那些千姿百态的云团，每观察一个，都会使我想起某种动物，我甚至能够分辨出它们各自的四肢和面目。它们的神态虽然狰狞，但都温驯地匍伏在地平线上方，我注视了很久，从未见它们跑到天空的中央。它们就像一群从林中跑出饮水的野兽，静静地围着一口清澈的池塘。

蓝色的黑龙江，在北方的八月缓缓流淌。看到一条河流，仿佛看到一群迁徙的候鸟，总使我想到许多东西。想到它的

起源，想到它路过的地方、遇见的事情；想到它将要路过的地方、将要遇见的事情；想到它或悲或喜的结局。想到法国诗人勒内·夏尔“具有一颗决不被这疯狂的监狱世界摧毁的心的河流/使我们对天边的群蜂保持狂热和友善的河流”（《索尔格》）的颂歌诗句。河流给我们带来了遥远之地森林和土地温馨的气息，带来了异域的城镇与村庄美丽的映象。我常常想，无论什么时候来到河流旁，即使此刻深怀苦楚，我也应当微笑，让它把一个陌生人的善意与祝福带到远方，使下游的人们同我一样，对上游充满美好的憧憬和遐想。

嘉荫仿佛是一个蹲在黑龙江边上的猎人，它的背后，是莽莽苍苍的小兴安岭。我不了解嘉荫的历史，不知道它诞生的时日和背景，我所看到的是一座美丽清静的边地小镇。走近它，我感到很温暖。这温暖的感觉，不仅来自它橘黄的色调，双层门窗的屋舍及每个院落的桦木段垛，更来自它温和的居民。走在嘉荫的街上，即使你的感官天性迟钝，你也会被这里淳朴的民风所打动。从人们的神态和表情我能够看出，只要你开口，他们会乐于回答你任何问题；只要你请求，他们会给予你任何的帮助。以后我还会走很多地方，但这样令人感动的地方，我将终生难忘。

在嘉荫江岸的堤下，汛期过后，便裸露出一片狭长平坦的沙滩，积满沙砾和细屑的卵石。边民在这里网鱼、洗澡、冲涮家什，妇女们将洗净的衣物晾在光洁的石子上，拖运原木的江轮停泊在一旁。在江水遥遥的对岸，散落着一簇醒目的白房子，阔大方正，它们沿江而列，仿佛在同此岸的嘉荫小镇相互呼应。那里偶尔会传过几声狗吠或若断若续的歌声。

一种浓郁的家园氛围，一种和平的生活气息，弥漫在河水两岸的寥廓空间。

嘉荫，这是一个民族称作北方而另一个民族称作南方的地方。站在黑龙江岸，我总觉得就好像站在了天边。对我来讲，东方、西方和南方意味着道路，可以行走；而北方则意味着墙，意味着不存在。在我的空间意识里，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形成完整的四方概念。望着越江而过的一只鸟或一块云，我很自卑。我想得很远，我相信像人类的许多梦想在漫长的历史上逐渐实现那样，总有一天人类会共同拥有一个北方和南方，共同拥有一个东方和西方。那时人们走在大陆上，如同走在自己的院子里一样。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三日初记

一九九〇年十月四日改定

海 日 苏

海日苏，蒙地东部的一个普通地名。我没有了解它的蒙语原义，三个汉字排列在一起，组成一个语义不明的名称。但在这个词上，我感到一种超越意义的东西，它让我想到世界上呈现的那些美丽的事物。以致我在草原旅行时，很想看看它所标志的那个地方。

我从乌丹上路，汽车迎着曙光，向东行驶。在农牧过渡地带，我看到一种村庄，与平原上的村庄有很大不同。它的背景高远辽阔，屋舍不多，但铺展阔大，体现着广地上的自由魂魄。房屋和院墙都是泥土夯成的，院落深长，屋舍低微地座落在中央。人们要走很久，才会迈出自己的院门。我相信，再也看不到与大地结合得这么亲密的村庄了。它的土地颜色，它被广漠的沙化荒原衬托的形状，使我联想起种籽萌芽拱起的地表。看着这样的景象，我彻底理解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理解了他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外貌、秉性和习惯。理解了这些，我也就接受了他们表现出的一些我原不能容忍的东西，也就真切地爱上了他们。

通向海日苏的路，在省区地图上是一道最细小的线，它要穿越一座万倾戈壁。道路只是两条微凹的辙印，两旁没有任何人迹。天下有许多极端的事物，使任何一种文字也无法完美地表达它们。同时，当我看到能最丰富地体现命名它们的词语涵义的事物时，我会久久激动不已。平日，我熟知蛮荒、昊野、莽地、大漠这些非同寻常的词，现在我认识了它们背后的、它们所表示的实体本身。这是我第一次亲历和平生最大的惊异。我知道，从此我的精神和生命中已注入一种新的东西，它与支撑人类生存的几个主要因素相关。

戈壁不是死寂的，它的深处有树木和鸟。我见到过集群的乌鸦、喜鹊及盘旋的鹞鹰。有了这些大鸟，就会有更多它们赖以维生的另一环上的生命。树木是大地的愿望和最初的居民，哪里有树木，说明大地在那里尚未丧失信心。为了这伟大的信心，沙柳、胡杨、榆，奋勇响应。英雄们在劣境和绝地孤立地弯着躯干，以最宜的形态在此不败地生存。所有看到的人，都将大受感动。它们很少两个站在一起，似乎向人们启示：只有永不企求帮助者，才能在这里立身。

这里，一切都与无限有着联系。大地恢宏地转动，我对自己默声说：我是旅人，“我戴着漂泊的屋顶”（海子）。如果我把认识仅仅停留在感知上，那么我已穿过了无数直观的世界。很久之后，牧群神秘地出现了，连同人间的亲切气息。正午的阳光，倾照在牧场上。没有牧人，草原就是牧栏。在牧区行驶，常常有一匹马驹或牛犊，突然撒蹄与汽车并行狂奔，而后猛地拐进草场，惊恐不定地返回母亲身边。我注意到了，神已把这一瞬放进了永恒。

转过一个弯，便可能遇上一所房子，用栅栏围住，门外站着等候已久的亲人。此时车停下，下去或上来一两个提着物品的牧人。这是生活在大自然心脏的兄弟，有着阳光与风的肤色，脸上浮现对市镇与人际陌生的表情。他们离人类的根最近，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伟迹。人类的活力，人类生存极限的拓展，真正体现在他们身上。我对他们满怀敬意，他们应该得到全世界诗人的赞颂。

海日苏，已变成牧人定居的村庄，有着其他村庄共有的特点。它是草原海洋中的一座岛屿，远处涌起牧群和云的波涛，花朵在四周舞蹈。三个季节牧人在外放牧，冬天他们回到岛上歇息。世世代代他们历尽沧桑，留下牧谣、牛羊和子孙。他们的血液、经验和传说，已由父辈传入孩子们的灵魂。它使这座秋日平静、渐渐汉化的蒙民村庄，依然焕发着雄风凛凛的马背精神。

一九八六年九月笔记

一九九一年三月改写

天边小镇

即使在新疆，且末也是最遥远的地方。

从首府乌鲁木齐到且末，就是走尉犁、若羌这条近路，也要三天时间，并有车陷沙淖的危险。环绕塔里木盆地外围的大公路，从尉犁到民丰的东半部路段，依然很原始、简陋，沿途时时遭到沙漠侵袭。所以去南疆一带的车辆，大多宁绕行阿克苏、喀什、和田一线。如此，到达且末至少需要六天。

且末，南邻昆仑雪山，北临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天堂地狱相列般的地理位置，使它万劫不复地处于一种永久的恩泽与威慑之间。

新疆南端是我所知道的天下最奇异，最动人的地域。昆仑山，四方众生的伟大父亲。它的北麓，雪水顺势奔涌，汇成道道河流，直至神秘地在大漠内失去踪迹。在雪水流经的地方，由西向东，始于喀什终于若羌，形成一线雪山与沙漠间的大大小小绿洲。它们是西域严酷大地不灭的魂灵，是站在死亡之海岸上微笑的生命。远古时期，漂泊的人类在此安

顿下来，以天赋的无穷毅力承受辛劳与艰难，终年不竭的雪水把他们养育至今。

且末为众多绿洲中的一个，在漫漫岁月里，孤立无助地演进自身的历史行程。这里是世界安静的一角，容纳着深爱劳动与和平的人们。它显现的祥和的面貌，我可以肯定，会使所有到来的人惭愧地放弃仇恨。

西域位在欧亚大陆心脏，远离海洋。西域的一切，都令人联想到火和太阳。夏天的且末，辉煌光明。它的绿色，照耀着四周燃烧的沙漠。高大的白杨，遍布镇上。它们挺拔的躯体，使小镇对命运满怀信心，它们是小镇在沙漠与太阳中生存的守护神。

且末也许是神作为标准安放在人间的一座小镇，它的存在，让我们这个喧嚣的商业世界感到卑微。走在树荫满地的街上，我觉得小镇有种使一切复原的力量。我没有遇到汽车，没有见到高耸的烟囱，甚至没有听到一声蝉叫（这里夜晚也没有蚊虫）。小镇的生活，在依照它自己的意愿和信念，平静地运行。

小镇很小，只有两条主要街道，在镇中相交，它们是小镇的骨骼。站在十字街心，向四个方向望去，便可看到镇外在阳光的火焰中幻动的沙漠风景。我注意到，小镇人在街上相遇，大都要伸出双手握在一起，亲近地交谈几句，而后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情。这一小镇每时每地都会发生的现象，让我大为感动。我把这寻常的一瞬，看作是小镇的灵魂。

在小镇看久了，就感觉小镇本身的确也有生命，它有一

个天造地设的适应沙漠环境的肌体。小镇上的阳光，像金属一样。但走进阔大的树影，看外面锐利的阳光也是可爱的。在小镇，大街小巷两旁都有雪水流动。长途跋涉的灰色雪水，给被火焰围困的小镇，带来了雪山的声音。街巷里的泥土，似乎永不凝固，一阵风刮来或光脚的娃子跑过，都会腾起一股烟尘。为此，小镇人不时走下门前的木桥，提起雪水洒在街上。他们的勤恳，保持着整座小镇的湿润。

小镇人感激雪山，雪山离他们还很远。小镇人懂得沙漠，但他们从不深入沙漠。小镇同雪山沙漠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微妙最难言的一种关系。

我想，只要有水、一块土地及勤劳，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地球的哪个角落，人类也会把它改造成庄稼连片的家园。年年岁岁，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技艺和辛劳化作了收获，看到自己的后代生龙活虎地长大成人，看着日子向合乎自己心愿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便是人类所处的最幸福的时光。

离开小镇时，车上一个到库尔勒上学的学生告诉我，且末原址并不在此地，而在北面的沙漠中。本世纪上半叶，有着悠久往昔的且末被沙漠逼迫南移。新址距旧址 50 余公里。

现在，面对塔克拉玛干魔鬼的进逼，为了护卫新的家园，小镇人终于表现出了潜在的胆量和勇气。他们在沙漠前面设下屏障，第一道布草网，第二道植柽柳、沙枣及胡杨。他们用人类的气魄和智慧，止住了尾随而来的饕餮般沙漠，为自己在自然那里争得了安宁与生存的权利。当我在车上看到那

赫赫的防沙网时，我很想复述这两行英雄性的诗句：

土地说：我要接近天空
于是，山脉耸起

人说：我要生活
于是，洪水退去　　（江河）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二日笔记
一九九一年五月改写

武汉的东湖

东湖是大江在路上的一个停顿。像长途跋涉的旅人走到一棵树下，它走到武汉的身边，四下看看，便坐下来歇息。旅人喜欢树下的荫凉，它喜欢武汉的热烈。

它从很远的地方走来，日夜行进，风尘仆仆。它的神色疲倦，身上依然散发着异地新鲜的生命气息。那里的雪比早晨纯洁，那里的森林比心灵神秘，那里的夏草高过天，那里的阳光像洪水在地上流淌。这一切，你即使仅站在远处对它望望，也会在你的想象中显现出来。你会不由自主走近它，围着它细细打量。你总觉得，无论怎么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它都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它的眼睛是历史，脸是故事。它可以沉默，但只要有人渴望倾听，只要它肯，它便可以把它的见闻和经历永不枯竭地讲述下去。

它仍在路上，它要到哪里去呢？它要去寻找海。它目前还没有明白，当它停下脚步，它自身就会形成一个海，也有海的精神，也有海的宽大与深邃，也有波浪浩荡，鸥鸟翩飞。这情形大体和人世的无数奔忙一样，苦心劳顿所追寻的，恰

恰是在这追寻中被牺牲掉的。

它喜欢武汉，也被武汉的主人加倍喜欢。它是他们窗外心向神往的宝贵风景，是他们躁动的市井生活里的慰藉和安静，是他们对外话题中谈起的第一个内容。假如你初次来到武汉，他们通常也会这样告诉你：到武汉，不去东湖，等于没有到过武汉。从他们的语气和表情，你能够看出，东湖是他们的半个生命。因为东湖，他们得以在武汉闻名的火焰与庞大内，骄傲和镇定。在武汉，无论从哪个区域都能顺利地走向东湖，武汉的大大小小道路，都乐于把你领到那个美丽无比的地方去。

它不会在此久留，它还将上路，但它不会再把东湖带走。它将把东湖给武汉留下，作为它们相识而送给武汉的一个礼物。

它前面的路还很长，它还要经过许多地方，还要遇到许多事情，但它不会把武汉遗忘。在它沿途路过的无数地方中，武汉给它留下了非常鲜明的印象。它清晰地记得那里的热烈，记得那里的关于九头鸟的古老传说，记得那里的亲密的三兄弟。他们情同手足，永远站在一起；他们直爽、诚恳、慷慨、憨厚，喜欢和敬重远方来的朋友。它相信，它未来一定还会再去那里。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从汤旺河到黑龙江

——边防检查站一日

这是我一九八七年八月的一次旅行。

我的目的地原是小兴安岭。我是到了小兴安岭深处的“森林之城”伊春后，才萌生去看黑龙江的念头的。从地图上看，这条钻入小兴安岭的铁路，终点在乌伊岭。乌伊岭距黑龙江边的嘉荫，已经很近。在乌伊岭的前一站汤旺河，有一条公路线与嘉荫相连。

我决定动身。

蒸汽机头牵引的老式硬座客车(还是我从哈尔滨来时的那次)，晨五时从伊春开出，继续喘息北上。上午近十时到达汤旺河。在铁路沿线，散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林业工人定居区，汤旺河即是其中之一。汤旺河坐落在一片起伏平缓的谷地，它的密密匝匝的房子正向山坡涌去。汤旺河之名，得自一条自北向南纵贯小兴安岭的河。火车北上时，即溯河而行，未离它的左右。像我要去的嘉荫曾叫“朝阳”一样，汤旺河也曾有过一个趋时的名字：“东风”。至今，当地人仍习惯这

样称它。

汽车站与火车站毗邻，每天只有一班车开往嘉荫，发车时间特定在这趟火车到站之后。在伊春和来时的火车上我都打听过，现在去黑龙江边已不像前些年那么困难了，因此当我看到在售票口贴着的“去往边境地区，购票须持边境证”的通告时，我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我问周围的人，到哪儿去开边境证。他们说应该出来时在当地公安局办理，也可去汤旺河的公安机关申请。又有人说，只要有居民身份证就行。我找出身份证和工作证——我全部的证件，与钱一并递给了售票员，她看也未看便将票撕给了我。

漂亮的大“黄海”开过来了（我在各地旅行时发现，无论多么偏僻的地区，长途车都不错）。我的旅程，继续进行。车向东北方向行驶，沿途没有居民，只有树木。半个小时后，它忽然停下了。刚刚还野性十足的“黄海”，现在规矩地停在了一根醒目的红白相间横杆前：这里就是边防检查站。

事情的出现，比我预想的早得多，因为这里距黑龙江还很远。

一个戴着“检查”袖标的执勤士兵上来了，他按例从前至后逐一检查乘客证件。有人因为证件不全或有疑点，而被命令下车。终于轮到我了，士兵接过我的两证看了看，沉默了一瞬，然后说：“你下去，到岗楼去一趟。”我问还能不能再上来，他说可以。当我起身向外走时，他又叫我带上所有的东西。我很平静，仿佛这是我期待已久的结局。

岗楼立于路旁，呈四方形，两层。里面设置简单，一副陈旧的桌椅，一张可睡两人的粗拙木床，破损的四壁空空荡

荡。桌前坐着一位配带“值班员”臂章的带班军官，从车上下来的人乱糟糟地围在他面前。这些乘客基本都是当地居民，他们因各种原因未带边境居住证。军官挨个问清每个人的详细地址、工作单位，也让他们说说当地行政长官或公安局长的姓名，以及其他能证明他们是本地人的事情。依次在出入边境地区登记薄上登记后，这些人获准上了车。

完成检查任务的执勤士兵都从外面进来了。此时，查验完所有人的值班军官在看我的证件。他说:“居民身份证只适用于内地，在边境地区不起作用。”他问我到嘉荫去干什么，为什么没办边境通行证。我说我是假期到小兴安岭旅游来了，到小兴安岭后看到这里离黑龙江已经很近，便想趁这个机会到黑龙江看看，由于出来前并没有想到要去黑龙江，所以也没想到去公安局办理边境通行证。他们开始检查我所带的物品。旅行包内的东西全部掏出来了，没有漏过任何一处:书皮中的一页纸，分散放的钱，打开袖珍收音机后盖，拧开水壶。值班军官认为我的回答很不充分，且带着地图、照相机、收音机、水壶等前往边境，行为可疑。

这时，“黄海”的售票员进来问：他还能不能走？值班军官答：不行。售票员走了出去。

我被带进了检查站里。这是值班室，还是那位带班军官。他说同我随便谈谈。我明白，这是讯问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他问：你旅游为什么要到既无名胜又无古迹的小兴安岭来？我说我非常喜欢森林，很早就想来小兴安岭林区看看。他说长白山也有森林，而且还有天池，为什么近的地方不去，要跑这么远来呢？我说虽然都有森林，但它们的地理气氛并不一

样，况且我返回时是打算到长白山看看的。他问：旅游的人都结伴，你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为什么独自一人呢？我说我喜欢单独旅行，因为我出来主要是为写作而进行体验。他说既然为了写作，你出来几天了，为什么不见你写的东西呢？我说写作不是实录性的，并不是见到什么，就写什么，旅行主要是进行一种阅历的和审美的积累。他说那至少得记点素材吧，你怎么什么都没写呢？我说我是准备用日记的形式补记我每天的见闻的，但这需要安静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最后他说，通过他的观察，他觉得我的神态不大正常，且像有什么心事。

值班军官起身走了出去，一会儿，又随几个人一起进来了。其中有一位年龄稍长的军官，我想一定是检查站的首长了。果然是站长。站长宣布说："为了对你对国家都负责，在我们没有对你做彻底了解之前，你暂时留在这里。我们先给你的单位发封电报，等到电报回来后，知道有你这个人，并且不是因为什么事而出走，我们再放你。"他又对身旁的一个士兵说："小张，你陪着他。可以看书，看看电视，也可以到院子里走走。"我问是不是把我拘留了，他说不是。我说那是收容，他说也可以先这么叫。

检查站四面，环绕着小山。如同河道上的一个湖，公路从外面拐进来，又逶迤远去。全部房子呈"冂"形，都是平房，正门朝北，两侧各挂一块牌子，分别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伊春支队嘉东公安边防检查站"和"伊春市公安局边防保卫分局嘉东中心审查站"。没有围墙，也未见有军犬的迹象。

检查站约有三十人，站长是正营级军官，配有勤务员；审查我的值班军官是连级，这样的值班军官大概有几个，轮流带班。士兵都很年青，他们多为黑龙江籍人。站里有一个娱乐室——一点球类、棋牌，几份报纸，一架音质不清的收录机，一台屏幕很大的只能收到一个频道的彩色电视机。不必担心什么，无论官兵，白天黑夜出门便在用于美化的灌木花丛间撒尿，致使院子里到处都有一股刺鼻的腥臊气息。这里很静，一个近似与世隔绝之地，仿佛要是没有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人们会忘掉声音。

检查站的主要职责是防备内潜与外逃。从地图上看，这条路是内陆与界河黑龙江相连的几条主要通道之一。从这里到江边的嘉荫尚有一段遥远路途，汽车行驶至少也还要几个小时。因此，这条穿越莽莽林地的路，平日只过车辆，从来不走行人。这些车辆主要来自林区采伐点、当地驻军及江边的嘉荫镇。检查站除了对每天对开的两趟长途客车（上午汤旺河开往嘉荫，下午嘉荫开往汤旺河）认真检查外，当地经常过往的车辆，往往并不停车，鸣笛示意而过。如果货车司机室内载人，或本地的小型客车通过，只要停车说明一下即可。据那位值班军官讲，这个检查站近年有消息说要撤掉，或迁到另一地点。因失去了未来，也就不再关心现在，这大概是检查站简陋和给我一种暂时维持感的原因。

与其说我被检查站收容了，不如说我是检查站的客人。没有人像对待收容者那样对待我。中午，我与官兵们一起到饭厅吃饭。大家围在一起，饭菜很简单：馒头、一盘芹菜、一盆汤，便是官兵的全部午餐。好像我确是检查站的客人，站

长似乎像为没有好好招待我而表示歉意一 样，抱怨地方供应部门因在某些事上被得罪了，便在供应上故意刁难他们（检查站的伙食水准或许很低，晚餐是烙饼、咸菜和菜汤）。

饭后，我与站长同室午休。站长时年四十岁左右，他的身体各个方面，都很适中，他有异于一般军人的特定素养和气度。他是温和的，他的相貌天然为他提供了一扇门，使人即使还在远处便能感到他可以接近。他是那种人们希望在任何地方都能遇见的人。站长喜欢下围棋，苦于站里没有对手，当他知道我会下时，异常兴奋。其实在围棋上，我们都是刚刚上路的人。后来，他让我谈谈对当前国家的改革形势与政策的看法。我们谈了各自的观点。话题很广泛，也涉及到了文学。而此时我最关心的还是电报问题。当我提到电报时，他仿佛此时才想起这事。他命勤务员去找文书。我要求他写电文时措辞婉转一些，写完最好让我看看。文书来了。站长忽然又想起我的日记，叫人去取。日记值班军官已经粗略翻过了，站长看得很仔细。看完后，他对我说："没什么问题。有你的日记，我看不用发电报了，我们信任你。明天你可以去江边，愿意的话就住几天，然后再回来。"我说："谢谢站长的信任。"

世上有许多事物或事情，存在或发生于我们的意料之外。它们的出现，使我们的生命进程不时涌起波澜。由于它们，我们会对一生缅想不尽。

夜里我睡在了值班军官的床上，他在岗楼执勤。与我同室的是傍晚由伊春市边防局的一位参谋陪同，刚来这里报道的一名军校生。他毕业于石家庄武警学校，他的年龄与我相

仿，一副适宜穿新式军服的健壮身躯，他将在这里开始他的军旅生涯。

检查站的生活舒缓、松驰、散漫，它不吹熄灯号和起床号，也不出早操。我醒来时，阳光已经照进屋里。由于有山，这里的日出是刺眼的。上午惟一的事情，似乎就是等待那趟由汤旺河开往嘉荫的长途客车。我在等，执勤的士兵也在翘首以待。这是他们每天的两件大事，也是他们的节日。长途客车开来了。检查的程序和昨天一样，今天也扣下了一个证件不全的可疑人，还是由那位值班军官带进站里审问。

告别的时候到了。我问站长，到江边还会不会有麻烦。他说不会了，万一有，只要提他的名字就行。站长的名字叫贾标强。

可以把长途客车想象成绿色海洋中的一头鲸，它在检查站浮出呼吸了一下，便又一头钻入了林木的波涛中。而这条穿越林区的简易公路，我把它看作一道来自另一世界的，残忍地留在大森林身上的刀口。我这里说大森林，其实更多地包含着我个人的一种意愿：我希望与原初一样，小兴安岭就是大森林本身。但我的小兴安岭之行，除了在五营的红松自然保护区，沿途我并没有见到一棵原始树木，大森林实际正在或已经衍变为次生林。看着这些年轻的林木，它们很像横遭洗劫后的村庄遗下的一群孤儿，紧紧拥挤在一起。它们的表情，似乎还惊恐未定。

有道路总会有些什么与人有关：林场采伐点，驻军营房，公路道班，站在院门口抱着婴儿的妇女，跑动的孩子和鸡，以及屋顶晃动的蓝色炊烟。仿佛随车走动的送行的人群，两旁

的树木终于渐渐稀少下来，远景呈现了。

这是林木消失后的土地，辽阔无边。大片的春小麦在等待收割，它们因成熟过度而失去了光泽，它们的颜色与褐色的泥土已溶为一体，一直向遥远的地平线外面伸去。这里的农业是粗略的：收获延迟，土地不整，麦田杂草丛生。与地理环境一致，一派北方的豪放景象。

当一条大堤出现在车窗左侧时，我看到了大堤之内的，湛蓝的、壮阔的、舒缓涌动的大河。我知道，这就是我向往已久的黑龙江，祖国惟一的一条依然保持本色的大江。而前方的橘黄色小镇，就是嘉荫。

这篇过长的、实录性的散文，该结束了。关于黑龙江和嘉荫的美丽与诗意，它们对我的意义，我已经写进了另一篇手法不同的散文里。那篇散文，就叫《美丽的嘉荫》。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四日笔记

一九九四年九月改写

现代的孩子

现代的孩子吃精制食物，娇弱的胃口让他们厌恶颐养劳动体魄的粗蔬和五谷。

现代的孩子穿漂亮衣服，卫生的观念将他们隔绝于孕育万物的风雨和泥土。

现代的孩子在高楼里居住，远离童年游戏，远离儿童天然的集体主义。

现代的孩子出门须要乘车，闲置起造物主为行走而赋予人类的双足。

现代的孩子懂得哪种级别的官高，哪种牌子产品好；不懂什么是蒲公英，什么是布谷鸟。

现代的孩子每天能看到汽车，看到钱；看不到日出与日落，看不到地平线。

现代的孩子天天听机械的声音，听人类放声叫卖的声音；听不到鸟儿的啼叫，林子的籁响。

现代的孩子可以在商店买到各种糖果，但无处可以摘下悬挂在树上的果实。

现代的孩子可以得到各种电动玩具，但无处可以捉到一只星斑天牛或金龟子。

现代的孩子按图示会精巧地垒起积木，再也不会造出一把木枪或苇笛。

现代的孩子注意看大人的脸色，注意不到变幻不定的季节的颜色。

现代的孩子一切事全由家里给做，他们为家里做的惟一的事是给大人增添一些乐趣。

现代的孩子时常生病，每个家庭都有许多药片，每个城市都有许多医院。

现代的孩子不再听老祖母讲狼和羊的故事，因为家家都有好看的彩色电视机。

现代的孩子需要补充钙片和维生素，他们每天在楼群间玩耍，呼吸机器排出的气体。

现代的孩子跟着大人从一个家庭走到另一个家庭，看不见蚂蚁的家庭、蜜蜂的家庭。

现代的孩子的勇敢体现在摔家里的东西，他们没有地方去爬树，没有机会走夜路。

现代的孩子从成人世界学到各种道理，无法在自然世界中获得各种启示。

现代的孩子仿佛天天都过年，因而他们已无法尝到真正过年时的甜蜜。

现代的孩子得到什么都很容易，因而他们无法理解“简朴”和“珍惜”的涵义。

现代的孩子过多地享用和获取，他们的性格中将缺少坚

毅与创造力。

现代的孩子缺少意外，缺少恐惧和冒险，他们将来回忆的将是失去色彩的童年。

一九八九年三月

本土歌手

作为一个诗人或导师就是作一位认识者，首先是要成为一个本地的代言人。

——惠特曼

这是一些富于地域色彩的诗人；这是一些脚踏实地，手掌粗糙的诗人；这是一些把诗歌与民众普普通通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诗人。他们处变不动，各居一方，坚忍地守定自己的理想。他们不是革新文体的先锋诗人，不是专注内心的精神诗人，如果诗歌分类可以成立，我称他们为本土诗人。他们生活和行吟在养育自己的本土上，关注四方。他们知道大地的脉络，河流的走向；他们熟悉劳动的姿态，农事的细节；他们了解普通人的尊严，简朴的内涵；他们懂得家园的意义，人类全部生活的根基。他们的声音，充满生长在那里的事物朴素的愿望。有了这样的诗人，世界最初的朴实和原质，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可望得以保存。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幸　福

哲学家培根一生写了五十九篇小品文，他仿佛谈论了人世所有大的事情，但惟独没有论幸福。或许他缺少了时间，因为他最后的《论谣言》便是未完笔的残篇。培根没有论幸福，但他论证了那些往往被世人误解拥有便幸福，因而盲目和疯狂追求的事物。譬如财富。关于财富，培根把它称做德能的障碍物。因为财富之于德能正如辎重之于军队，辎重是不可无，但过量的辎重会阻碍行军，有时因为顾虑辎重而失却或扰乱胜利。

唐朝诗人韩愈，写了一句意味深远的诗："草色遥看近却无"。把幸福完全寄托在财富上者，常常是那些尚未获得财富的人。这是人类无数错觉中最大的错觉。

幸福不是时代、国度、地区或阶层的专有物，幸福也不为财富的多寡所左右。宫殿里有叹息，茅屋中有歌声。人类在寻求幸福的终极目的驱动下，创造出愈来愈广的器具帮助自己，机器解放了人类的体力，电脑解放了人类的脑力。但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现代这样，人类的生活如此紧张和匆

忙。中非洲的洛美人反对把电引进他们生活的丛林，南美洲的爱尔人阻止公路穿越他们定居的区域。他们并不认为是在拒绝现代文明带给他们的幸福，他们保持着自己纯洁原始的传统。在高度体现人类物质文明的欧洲边缘，有一座马德拉群岛，那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汽车和工厂，没有竞争和效率，劳动的人们面带微笑，在太阳下唱着舒缓悠长的歌谣。当工业社会的游客慕名而至，他们紧张的心弦倍感松驰，躁动的情绪复归宁静。人类的心灵向往什么呢？这向往如同梭罗所比喻：好像水边的杨柳，一定朝着有水的方向伸展它的根。

幸福无疑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但人们不应以此误入歧途，转而毕生追求财富。当人们把幸福全部寄托于此后，拜金主义兴起，消费主义盛行。“欲急速致富者将不免于不义”。我们费尽心机，仅仅为增加几枚银币；然而书内有黄金般的文字——历代最聪明的智者的话，我们无视。我们终日忙碌，头脑里装满市场和物价；然而壮丽的日出和春天等待观赏，我们无暇。有限的地球除了要养活人类，还要养活人类的奢侈和虚荣。工业革命发生仅仅二百年间，人类便为此走到了自身所造成的各种毁灭性灾难的边缘。

伟大的诗人泰戈尔认为，人类与世界存在着三种关系，即理性关系，实用关系和美的关系。理性关系让我们了解世界的秘密，实用关系使我们满足肉体各种所需，美的关系则赋予我们的心以爱，消除我们行为中的功利主义。与世界的理性关系好比是我们的学校，与世界的实用关系好比是我们的办公室，而与世界的美的关系则是我们的家庭。我们不会

完全呆在学校里，也不会完全待在办公室里，家是我们最后的栖身之地。由于有美的关系，我们与万物的距离消失了，我们同它们是近邻和兄弟。在万物中完整地获得自己的价值和人性，是人类心灵的天然属性，也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人在其中将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一九八九年三月

四　　姑

祖母一生，养育了十个儿女。父亲是她的长子。（之后有三子一女，幼时便夭折了。）余下是五个姑姑。在我记事时，大姑、二姑已经出嫁。由于父母很早就在外工作，我们兄妹几人，都是在祖父、祖母和姑姑们身边长大的。

其实，最小的五姑只比我大两岁，四姑比我大约七、八岁。祖母说，我小时，就由四姑哄着。

四姑在她们五姊妹中，长相最不好看。她的体态矮小、敦实，脸型方阔，厚唇，发辫很粗。仿佛天然适应农村的泥土而来，为露天的风雨和劳作所生。

四姑粗朴的外貌，没有反映她文质与秀美的内里。在祖父的五个女儿中，只有四姑充分承继了他的书册性情。四姑爱书，胜过一切。她大概读遍了那时乡下所能找到的全部书籍。每次下田，她都带一本书，这与乡亲们树下禁忌极少的说笑，很不谐调。她从不在饭桌吃饭，她喜欢端上饭碗，趴在里屋炕上边看边吃。等她从里屋出来，桌上饭菜，大多已全无，但她并不在意。每晚，她在全家睡得最迟，经常在看

书中睡去，而使灯亮到天明。为了守住这一令她幸福的天性，她需长期忍受祖母的不满与唠叨。

贴近大地的底层生活，与文字总是保持着其自尊的距离。

四姑上过中学，她曾卷入当时红卫兵南北串联的红色波涛。如果不是那个时期，我相信，她肯定也会走进某个高等学府的大门。到我懂事，四姑已回乡劳动。

四姑秉性温和，心地极为善良。她的脸上，似乎总是歉意的表情。她是那种遇利退让，惟恐自己的行为不慎而有碍外界；乐于奉献，得到些许帮助便坐卧不安的人。四姑的字，非常漂亮。她常代邻里写信，过年时，写对子。她言语不多，话音平和。祖母说，她从不与人争吵，如果姐妹之间或与邻人偶尔产生摩擦，她都先去给人道歉，而起因多不在她。即使哪天走在街上没有主动与乡亲说话，她也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错事。

在四姑身上，的确有着令我不解 的表里矛盾现象。她勤劳，像任何一个本色的农民一样。但她并不喜欢女红，同编织、缝洗、做饭等家务相比，她更爱做担水、起圈、割草、整地这些通常由男人来做的户外事情。父亲工作在外，四姑恰好起了一个农家本属男儿的栋梁作用。

童年给我印象最深，并对我的人生具有奠基意义的事，是在冬天的早晨，跟随四姑到野外去搂柴草。天不亮就动身，太阳出来返回，几乎天天如此。那时我十岁左右，四姑正值生命美好的青春时间。由于担心，祖母不愿让她一早出去，但她坚持。于是我这个家中仍在甜睡的男子，便被从热炕上叫

起，给她作伴。或许做为报偿或安慰，她给我讲起故事。由此，在天亮前后往返的路上，在茅草瑟瑟的旷野，四姑开始将她读过的书籍，源源不断地讲给我听。她的记忆力出众，讲述动人，至今我也不具备这种能力。

四姑仿佛为我打开了一座宝库，使我的心灵骤然一亮。我不再盼早上刮起大风或降下大雪，而是在每天的睡梦中期待被再次叫醒。四姑给我讲的故事，我后来知道，主要来自《西游记》、《水浒传》、《说岳全传》、《杨家府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这是童蒙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它们的奇幻色彩、英雄主义和人间正气，适时地滋养了一个乡村少年的骨骼与心智。这是一段寒冷而美丽的时期，常常令我怀恋回忆。我既因自己已对家庭有用而倍感自豪，更为骤然进入一个神异王国而激动不已。

当灿烂的太阳从东方遥远的树丛升起，身背装满柴草的荆篓的人们，踩着自己高大的影子，陆续朝炊烟晃动的村庄走去。在这些起早的男人中，走着一位朴素的姑娘，一个拿着筢子的男孩，紧跟在她身边。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情景，这是我的宝藏，是我今天踏上从文之路的根基。它不仅使我得到了最初的文学启蒙，也使我养成了热爱早晨这一有益心灵的习性。在后来的一首诗中，我这样写过：我喜欢早晨/到田野的广场上去/等候太阳到达/当黑夜的列车停下/太阳踏上天空的站台/仿佛一个远方的朋友/微笑着向我走来。

我觉得四姑是乡村用它的历史和全部美的因素，塑造的最为合乎它心愿的人。但乡村仿佛也捡选她作了自己的祭品，命运牺牲了她。她对生活的爱与给予，远远没有得到相

应回报。四姑身体不好，她的气管炎一到冬天便给她带来很大痛苦。疾病是依赖体力维生的乡村的魔鬼，最使农民忌畏。四姑甚至对她的婚姻也失去了信心。我记得隐约听她对祖母说过，她不想结婚了，只求为她在家宅旁盖间小屋。四姑终于没有获得爱情。后来，一位远亲领来了邻村一个青年，是个单薄、木讷、笨拙、固执、老实巴交、对文化毫无兴趣的男人。大概为了除去祖母的心病及其他复杂因素，四姑嫁给了他。

很多年过去了，四姑已是两个女孩的母亲，正用她不息的操劳支撑着她的家。我时常想起她，想什么时候去她那里看看。我不知在冷漠的商品烟云已由城市向乡村弥散的今天，她将如何接受这一无情的现实，她的传统的温暖人性将为此付出什么代价。

一九九二年八月

素食主义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给素食主义这样下定义："由于道德、禁欲或营养的原因而推崇以蔬菜、水果、谷物和坚果为主食的理论或习惯。"

基于宗教信仰的素食，在亚洲广大的印度教与佛教地区，自古有之。这里所说的素食主义，主要指出现于十九世纪英国，并随后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项素食运动。他们成立素食者协会，出版《素食者》专刊，开设素食馆，宣传和推广自己的观点。

素食主义者从各个方面探讨过人类的饮食问题。在道德方面，他们认为，人之所以超越于下等动物，并不在于前者必须以后者为食，而是高级动物必须保护低级动物，两者之间须有互助，一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科学方面，他们得出结论，人体结构无可辩驳地证明，人不是宜于撕碎和吞咽别的动物的野兽；他没有食肉野兽那样尖利的分得很开的牙齿，他的肠子也比野兽的长得多。在生活方面，他们向世人表示，素食最节俭，最省钱。最后他们指明一个道理：人们

之所以饮食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生存。

素食主义有一个核心问题，即对素食的界定。对此，各地的素食主义者多少有些分歧。大体有三种：第一种认为素食指不吃禽兽的肉，但可以吃鱼和蛋；第二种认为素食即指不吃一切动物的肉，但仍可以吃鸡蛋、喝牛奶；第三种是最彻底的素食主义，它禁食一切动物的肉及包括蛋奶在内的其所有的附产品。

对人类而言，饮食不单涉及生存和健康，它天然与个人的信念和自我完善有关。十九世纪的美国作家梭罗讲："我在我内心发现，我有一种追求更高的生活，或者说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为了这种生活，他不沾烟酒，不喝咖啡，不喝牛奶，不吃牛油，也不吃兽肉。他说，这样我就不必为了要得到它们而拼命工作，而因为我不拼命工作，我也就不必拼命吃。梭罗认为，每一个想把他更高级的、诗意的官能保存在最好状态中的人，必然是特别地避免吃兽肉，还要避免多吃任何食物的。他以昆虫学家的研究说明，昆虫世界的一个一般性规则是，成虫时期的昆虫吃得比它们在蛹期少得多。因此，大食者是还处于蛹状态中的人。"有些国家的全部国民都处于这种状态，这些国民没有幻想，没有想象力，只有一个出卖了他们的大肚皮。"梭罗相信人类的发展必然会逐渐地进步到把吃肉的习惯淘汰为止，就像野蛮人和较文明的人接触多了之后，把人吃人的习惯淘汰掉一样。

梭罗是在素食主义运动之外的，当素食主义在美国兴起时，他早已出版了他那部名为《瓦尔登湖》的沉思著作。但素食主义确是影响了愈来愈多的人，其中包括一些伟大的

人，如列夫·托尔斯泰和萧伯纳（圣雄甘地在自传中也谈到了素食主义对他的意义）。

一八八五年，终止了打猎，戒掉烟酒，放弃财富，试图用道德准则与个人榜样影响和改变社会的托尔斯泰，又接触了素食主义。托尔斯泰的传记说，一天，一个名叫弗雷的人，从美国来看望他，这个人大约五十岁，但外貌是容光焕发的、年轻的，这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十年来甚至连盐也没有尝过。正是从来者这里，托尔斯泰第一次听到鼓吹素食主义，并且从他身上第一次看到一个有意识地弃绝杀生的人。从此托尔斯泰成了一个终生坚定的素食主义者，这一年，托尔斯泰已年近六旬。享年九十四岁的萧伯纳，将他的高龄归功于素食主义。一九三三年萧伯纳曾访问中国，在上海，有人问过他素食的原因，他回答："是我的健康所需要的，而且素食本是英雄和圣人的食物。"

除了对一切生命悲悯的爱以外，自觉的素食主义本质就是节制与自律。

关于节制，这是现代文明进程中迟早会被提起的问题。《历史研究》的著者汤因比即认为，工业革命以来被刺激的人类贪欲和消费主义，短短二、三百年间，便导致了地球资源趋于枯竭和全面污染。面对未来，人类不能再心存科学无敌的幻觉，科学虽有消除灾害的一面，但（现实已经表明）一种新的科学本身又构成了一种新灾害的起因。人类长久生存下去的曙光在于：实现每一个人内心的革命性变革，即厉行节俭，抑制贪欲。

而在自律方面，曾严厉抨击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的索尔

仁尼琴，反对“贪婪的文明”和“无限的进步”，提出应把“悔过和自我克制”作为国家生活的准则。因为纯洁的社会气氛要靠道德的自我完善来造成，稳定的社会只能在人人自觉地进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建立。托尔斯泰也曾讲过，人类不容置疑的进步只有一个，这就是精神上的进步，就是每个人的自我完善，人类如果没有内心精神上的提高，那么徒有外部体制上的改革，也是枉然的。

一九九四年九月

一件小事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是个令孩子们拍手跳脚的日子。这天，北京下了“立冬”后的第一场雪。这场雪彻底切断了两个季节之间的最后联系：北京的真正的冬天过早地降临了。

奇迹人们早上一睁眼就看到了。这是一场近年已罕见的雪，窗外纷纷扬扬的样子，使人回忆起八十年代以前北京每年冬天下雪的情景。那时人们不像现在这样年年盼雪。

雪一直在下。下午我在书房读伯特兰·罗素的《西方的智慧》。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部“从泰勒斯到维特根斯坦的西方哲学史概述”。当然，它已迥异于作者早年那部《西方哲学史》。我非常喜爱它的因素之一，是书中附有大量哲学家肖像及其它一些事物形体的插图。作者的目的，试图以此“把通常用文字表达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图解，用几何的隐喻来传递同样的信息”。这给这部关于哲学和哲学家的著作，带来了无上的活泼和诗意。

让我再次想起雪的，是楼下隐约传来的铲雪声。我走到

阳台。雪已基本停了，下面一位老妇在铲雪。我忽然感到很不安，仿佛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此时被我颠倒了。我走下楼，想接过老人手里的铁锨。她执意不肯。她说："你们年轻人都有事，去忙你们的吧，我们这老的能干什么就干点什么了。"她的话简单、平常，随口而出，却直抵我的心里，令我感动。我对这位老人满怀敬意。我知道，这样的话，于今已很难听到。我甚至觉得，我此时听到的这句话，比任何书上的格言都要伟大。

她想把雪从楼区一直铲到五十米以外的路上。我接过她的铁锨。雪经出入的居民践踏，已很坚实。在铲雪中，我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她是一个搬迁的农户，今年已七十岁，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开发区，迫使她离开土地，来到这个一切对她都很陌生的环境里。她的子女各在它处，她孤身一人，在此独居。她告诉我，她的三间瓦房，数间土房，几十棵树，换来这里的一套两居室楼房，另外还要再交四百元钱。她有些想不明白。她把我视作"政府"的人，让我给她评评这个理。

这是一位因世事而正怀有某种怨言的老人。但怨言并没有改变她，没能阻拦她雪后依旧拿起铁锨走出她的家门。我明白，在她看来，铲雪本是一件很小的普普通通的事情。但这件小事却使我难以平静。我注意了，雪后在整座小区，这位来自乡下的七十岁老人，是惟一出来铲雪的人。在第二天的北京电台早间播音中，我听到了关于对"扫雪"的呼吁，听到了节目主持人对诸如"过去人们对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做法尚有非议，今天日益舒适的人们连门前雪也不扫了"等种种现象的议论。

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曾想过几个篇名。但都觉不够恰当和理想。我的确想到了鲁迅先生那篇尽人皆知的同题作品，并找出看了数遍。我写时，《呐喊》就摆在我的面前。我当然自知，我的短文无法与先生的不朽之作相提并论。但我在此敢说，写这篇短文时，我的心情与先生当年完全相同。

一九九四年二月

进　　程

两年前，我从城西北角的西环里迁到此地。这个新建的名为“水关新村”的小区，位于我所定居的这座方正的小城东南，已在城区的环路以外，深入田野。这即是一百年前比利时大诗人维尔哈伦诗中所说的，“章鱼般伸触手的城市”的景观。

我居住的这栋楼，在小区的南端。它的东、南两面，毗邻旷远的农田。整栋楼的形状，可以看作一把镰刀，刀把面南，刀背冲西。我住的这个单元，恰在刀身。我的五层的居室，一室的窗户朝西，另一室的窗户朝东。按照民间的看法，这样的房屋，均非正房。但我和我的妻子，欣然接纳了我们的新家的地位和朝向。

这是我们的能够看到日出与日落的家，这是上午和下午阳光都可以进来的家。它的东方，是工整的农田，是温暖的村庄，是树木掩映的地平线；它的西方，是大背景下的小城全景，是满目绿色的莽莽平原，是蓝色的起伏优美的环形远山（即燕山山脉的外缘）。那里就是我所称的华北大平原开始

的地方。

我该如何讲述我的喜悦和心情呢？“人是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的。”由于我新的居所，我觉得我已经离荷尔德林的真理很近。我很喜欢我生活的这块地域，我总把它与北欧联在一起，称它“天明地静”。我的一位在《文汇报》做记者的朋友，来过一次后，便深爱上了这里。他在信中告诉我：仅仅“昌平”这个名字就常常使我烦躁的心平静下来，昌平和天台山（他曾在山上的寺里住了一月）一样，对我有一种归宿感。我的居所为我提供了必要的角度和视野，使我得以每天面对它的景色。这景色常常让我忆起一些诗句，而此时我才充分领悟了它们的美妙与神奇。比如，我的视诗歌为命的朋友，“新浪漫主义歌手”黑大春的黄昏：“山峰像一群迷途难返的骆驼/胸前佩着那只落日的铜铃”；以及被马雅可夫斯基称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时代”的，俄罗斯的伟大诗人勃洛克的黎明：“我信任太阳的约言，/我看见远方的晨曦。/我期待全世界的光明，/从春色的大地上升起”。

如果我远行两年，当我归来的时候，我将感到非常吃惊和悲伤。因为就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内，我居住的小区周围已经发生了巨变。它的东面，建起了另一片待售的商品住宅楼；而它的南面，已辟为方圆广大的“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宽阔的道路已经铺好，一幢幢造型别致的厂房与办公大楼正拔地而起。田野向很远的地方退去。在我写作本文的前一天，我的居所西侧，一块不大的空地上，又开来了隆隆的铲车和勘测车。这块我认定会被留作花园或草坪的空地，不久也将有三栋楼房耸立。

我的视野，将尽被剥夺；我的景色，将彻底熄灭。

我知道，这种私心，有悖我的信仰；这种浪漫，更不合现代时尚。有人在指望房地产业赚钱，更多的人期待着住房的改善，而全城的人都会欢迎小城走向都市的繁荣。

这就是我所说的“进程”。我有资格说什么呢？我的居所即是这个进程的结果。我明白，我身边呈现的这个进程，仅仅是另一不可逆转的大进程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全世界都在欢呼 和促进这一进程，惟有可爱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和诗人，发出了与它对立的声音：“根据条件（资源）许可来生活”（罗马俱乐部）；“如果最终导致人的损毁/那么，所有的进步都是反动和倒退”（沃兹涅先斯基）。这声音在强大的进程面前多么微弱，即使一声孩子的喊叫，也能将它淹没。

而另一个诗人，是爱琴海岸的埃利蒂斯，诗歌亲切地叫他“饮日诗人”。他代我说：“请注意诗人的嘴唇：世界就靠它们。”

一九九四年七月

人必须忠于自己

一九八六年冬，海子告诉我，他今年读到的最好的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我向他借来，读了两遍。我感到很幸福，由于这本书，我觉得我获得了一次新生。它给我带来的精神喜悦和灵魂颤动，是我读过的其它书所不能比拟的。它教人简化生活，抵制金钱至上主义的诱惑。它使我建立了一种信仰，确立了我今后朴素的生活方式。

亨利·戴维·梭罗，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他为自己"生于全世界最可敬的地点"之一而自豪，该城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地点。

梭罗一生从未远离自己的故土，他说："你脚踏着的土地，你如果不觉得它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土地更甜润，那你这人就毫无希望了。"他以全部的爱情将自己的天才献给他故乡的田野与山水，从而使整个世界都熟知它。当酝酿着一种新思潮的爱默生从欧洲归来到康科德定居后，哲学家阿尔科特、作家霍桑等一批十九世纪美国的杰出人物也被吸引到这里。康科德成了超验主义的圣地。

梭罗已经被历史列入超验主义者行列了，但是他比任何一个超验主义者更彻底，他是一个把思想与行为完美地结为一体的人。梭罗认为，人必须忠于自己，遵从自己的心灵和良知；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生命十分宝贵，不应为了谋生而无意义地浪费掉，人在获得生命所必须的物质之后，不应过多地追求奢侈品而应有另一些东西：向生命迈进。“泥土使种子胚根向下延伸，然后富有自信地使茎向上成长。为什么人在泥土里扎根之后，不能也向天空伸展呢？”他相信：大部分的奢移品，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他看到，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代智者都是一种类型的人：外表生活再简朴没有，内心生活再丰富不过。梭罗对此身体力行，他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最大本领是需要极少。

为了验证人除了必需的物品，其它一无所有也能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愉快地生活下去，梭罗毅然到康科德郊外林中的瓦尔登湖畔去居住。他的衣、食、房屋都是自已动手获得的，一年只劳动六个星期，而把其余时间用来阅读和思考。两年简朴的自给自足的湖畔生活，他写出了被称作超验主义圣经的重要著作《瓦尔登湖》。

梭罗的一生是绝对的和纯粹的，它令我们肃然起敬。站在梭罗的墓前，爱默生感到大地失去了一颗独特的心灵。他说：“梭罗的独立生活，使所有其他人看来好像奴隶一样……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学问，有道德，爱美的人，一定都是他的忠实读者。”

梭罗使我们懂得人只有从物欲的泥淖中挣脱出来才能

保持尊严，获得自由。多余的钱财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虽然梭罗陶治内心世界的主张已被现代社会所忽视，但他的理想却永远启迪着后人。

一九八八年七月

马贡多与癞花村

我并非要写小说评论，只想谈谈读了小说《癞花村的变迁》(载《一九八七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作者：星竹)的感受。我无意将这篇小说同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百年孤独》相提并论。读了这篇小说，我便不由得想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本曾在一九八五年被我们到处谈论的书。

《百年孤独》为我们呈示的马贡多，仿佛是一个尚未启用的世界，“那块天地如此之新，许多东西尚未命名，提起它们时还须用手指指点点”。马贡多勤劳、富足、欢快、幸福。村民只遵循自然法则生活，他们想象不出与外界沟通有什么必要之处。是马贡多终年不息的鸟鸣，引来了感官灵敏的吉卜赛人，他们叩开了马贡多紧闭的门，他们带来的奇迹，唤醒了沉睡在马贡多人心底的欲求与向往的本能。

从此，马贡多开始领略繁荣、嘈杂、动荡和战争。这一切是马贡多人始科不及的，以至他们终于觉醒：他们所想望与幻求的还是那已远远逝去，并永不复得的安详宁静的往昔生活。正如经历了显赫与荣光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晚

年所彻悟的那样：刚刚死去的朋友是最好的朋友；简朴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

癞花村不同于马贡多，这座具有梦魇般超世色泽的村落，为它的居民提供的是贫穷、忧郁和艰辛，仿佛以此在验证他们的生存力与耐性。癞花村人渴望与企求的意识始终清醒，他们幻想冥冥之中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奇迹发生，但这奇迹来自哪里，超出了他们的想象。那富于象征意义给癞花村人带来耻辱与灾难，仿佛具有魔力而生生不息的鲜花，象地球的两面一样体现着双重性。它既意味着贫穷又意味着财富，这取决于癞花村处于封闭或开放的何种状态中。

开放与交往似乎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财富由此而来，繁荣由此而生。但接踵而至的复杂、纷乱、龌龊，又是简单、纯朴、善良的癞花村人难以理解和无法承受的。他们还未完全摆脱物质上的贫困，又陷入精神痛苦的泥淖之中。他们开始对自己的欲求感到困惑和茫然，他们搞不清楚应该缅怀过去还是向往未来。

马贡多与癞花村的变迁，为我们揭示了人类历史演进中物质与精神的相悖现象，呈现了人类两难困境的缩影。对人类在天性上原本应该居于过去或未来哪一端的断言，是我力不能及的。或许对此根本就无法断言。我们知道每个时代的伟大智者，都曾做过这种尝试和思索，譬如，喻世的《旧约全书》和现在正悄悄风靡西方的《道德经》。

一九八八年一月

土地道德

（已故诗人海子，曾到我这儿找关于大地的书。他说至今尚未看到一本这样的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沾点边。后来他去四川，在当地小镇沐川买到一本美国学者写的，有着“文明人从未能在一个地区内持续文明进步长达三十——六十代人以上”论断的书：《表土与人类文明》。这本书很薄，他把书推荐给我，他自己并未满意。）

好兄弟，现在我告诉你，有一本一定更合乎你心愿的书，已被介绍过来，书名译作《沙乡的沉思》。美国伟大的生态学家、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土地道德”首倡者、可敬的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所著。

在美国，这是一本与梭罗《瓦尔登湖》并列的光辉著作。利奥波德生平，也有与梭罗相近的超凡之举。他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威斯康星河畔，买下一座被榨取殆尽后遗弃的沙化农场，每逢周末或假期，他便带全家来这里，试图用双手，“重建我们在其他地方正在失去的那些东西”。他在此努力十三年，直至猝死在去扑救邻居草场大火的路上。在美国眼里，利

奥波德是它的二十世纪的梭罗。

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利奥波德在他的农场所看到和所做的事情：他的农场四周的四季景色，他为恢复生态的不懈工作。自始至终由这样温暖快乐的文字组成："松树，和人一样，对伙伴是很挑剔的，而且还不善于抑制其好恶。""如果黑头山雀有一个办公室，它的办公桌后面的座右铭将会是：'保持平静'。"这些文字，按十二个月份顺序，依次排列，构成"一个沙乡的年鉴"。第二部分，"随笔——这儿和那儿"，记述了利奥波德的科学生涯，他与大地的亲密关系，他的生态观念的转变背景，大地的无可奈何的恶化进程。第三部分，"结论"，是一组理论篇章，高瞻远瞩，超然于人类狭隘利益之上，这里，利奥波德提出了他的"土地道德"的宝贵观点。

利奥波德认为，道德的演变次序，实际上是一个符合生态演变次序的过程。因为一种道德，从哲学观点来看，是对社会的与反社会的行为的鉴别；从生态角度来看，则是对生存竞争中行动自由的限制。最初的道德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后来增进了处理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内容，但是迄今它还未触及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这个不可无视的领域。迄今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土地如奥德赛的女奴一样，只是一笔被任意役使和处置的财富。今天，道德向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延伸，已成为一种进化中的可能性和生态上的必要性。

什么是土地道德？迄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道德都不会超越这样一种前提：个人是一个由各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

的共同体的成员。土地道德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简言之，“土地道德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梭罗是十九世纪空气的诗人，他关怀人类的灵魂，他指明人类应如何生活。利奥波德是危机四伏的二十世纪孕育的科学家，他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他指明人类如何才能长久生存下去。

马不停蹄的人们，尽可对他莫名其妙的论点置若罔闻。它其实是土地借助利奥波德之口，向忘形于主人幻象中的人类，发出的最后呼声。这呼声包含一个内容：“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对此，阅尽人间的土地，充满信心。

一九九三年六月

没有门户的宝库

童话的化身

安徒生（1805—1875），丹麦作家。举世无双的童话大师。一八〇五年四月二日生于丹麦菲英岛欧登塞镇。父为鞋匠，母为洗衣工。从小做学徒。十四岁到哥本哈根，寻求演艺生涯。后经资助，进斯莱厄尔瑟文法学校和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早期写过剧本、小说、诗歌等作品。第一本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集》，于一八三五年出版。之后，陆续又有新的童话集问世。生平共写下一百六十八篇童话和故事。曾遍游西欧、南欧、小亚细亚与非洲。写了大量游记。一八七五年八月四日，病逝于哥本哈根友人的居所。他有三部自传。他的童话故事，也多具自传色彩。

与神话、史诗、戏剧、寓言相比，童话并不十分年轻。童话是人类的一种借助，是实现它胸中正压邪、善胜恶这个永恒意愿的完美手段。读历代的童话作品，熟知历史的我们，深

为民众长久不息的朴素心声所感动。童话不是始自安徒生，但在20世纪，安徒生已成为童话的化身。安徒生是孩子们没有门户的宝库。没有安徒生童话，许许多多的金色童年将会暗淡。谁能估量，被安徒生童话浸润过的人生，曾给我们的世界增添了多少义举与善行？从安徒生那里永远获益的世界，在他生前并没有给他相应的报答。他相貌丑陋，一生孤单，经历了很多不幸的事情。安徒生是贫苦的儿子，他对幸福的理解最为纯正。早年的底层生活和成名后的广泛旅行，他阅尽人间。安徒生的童话，在天明地静的北欧出现，是一种必然。这些童话有着北方头脑的朴实和机智。也像丹麦农民一年的愿望，适度与美丽。

智慧的起点

伊索(生卒不详)，古代希腊寓言作家。关于伊索的一切，全部来自希罗多德《历史》的几行文字及历代传说。可能“伊索”一名同两大史诗的作者一样，纯为后人假托。由《历史》而知，伊索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曾是萨摩斯岛雅德蒙家的奴隶，因其才智超众倍受主人赏识，从而获得自由。后作为自由民游历了希腊各地。在德尔斐，他被控亵渎神灵，为当地人杀害。公元前五世纪，“伊索”这个名字已为希腊人熟知，希腊寓言开始归在他的名下。前四世纪，得墨特里奥斯编辑了第一部伊索寓言集(已佚)。又一部伊索寓言集于一世纪由费德鲁斯编写，经过他的修饰，人们才把伊索寓言当作文艺作品阅读。现在常见的《伊索寓言》，是后人根据十四世纪拜占廷僧侣普拉努得斯搜集的寓言及以后陆续发现的古

希腊寓言传抄本编订的。可以肯定，一部《伊索寓言》，三百余篇，实际是古代希腊寓言的汇编。

寓言是与伊索连在一起的，“伊索”一词和寓言具有同一涵义。伊索是否确有其人，《伊索寓言》是否全部为伊索所作，并不重要。《咏吉尔伽美什》（巴比伦）、《亡灵书》（埃及）、《奥义书》与《往世书》（印度）、《旧约全书》、《古兰经》、甚至四大史诗（印度、希腊），历史学家至今无法准确说明它们的作者。我们愿意相信，这是古朴时期心智健全的人类整体精神的最高显现。它们塑造了古代世界智慧与武勇的面貌，也使现代看似强大的钢铁世界，依然受到它们神秘指引。这些古老的典籍，是人类确立它的形象的根本。在哲学失败的地方，寓言能够胜利。成熟的人类举手投足，无不露出童年注入的寓言因素。无论现代社会的变化与纷繁令我们多么困惑，《伊索寓言》蕴含的人类意愿和情感，仍旧是它的核心和主题。在古代希腊，无知等于不懂伊索。被判死刑的苏格拉底，在狱中等待服刑时，为易于人们传诵，曾把他记忆的伊索寓言，由散文体改写成诗。作为智慧和指南，这些寓言从未被人类忽视（黑暗的中世纪除外）。《伊索寓言》，源远流长。它哺育了一代代民众，也启发和造就了后来的拉封丹、莱辛、克雷洛夫等寓言作家。

原始诗人

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生于纽约长岛一木匠家庭。只断续受过五年初级教育。几乎从事过社会底层的

所有职业。主要作品为诗集《草叶集》。《草叶集》初版于一八五五年问世，收诗十二首，到一八九二年第九版问世，已增至三百八十三首。惠特曼称自己为真正的“美国吟游诗人”，他目睹新生的美国正逐渐沦为一个毫无生气、庸俗、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起而放声歌颂人类昂扬的精神。他指明，“美国最重要的发展”在于精神方面的勇敢和顽强。惠特曼，在最高尚的意义上崇尚精神的伟大诗人。

惠特曼告诫人们：“我告诫你们，永远不要相信那些解释我的人。”惠特曼不可解释，“我博大，我包罗万象”。解释惠特曼，你找不到相应的语言和标准。挪威作家汉姆生，称惠特曼为原始诗人。每次读《草叶集》，我都有一个想法：惠特曼是第一位到世界上来的诗人。他带着他强大个人的法理和规范，成为不受这个世界既定秩序约束的人。惠特曼是诗人，但他也用另一种文体写下了许多人们称之为“散文”的作品。这些优美散文，是他创作总体的一部分，同样有着他诗人的灵魂。惠特曼，大自然终生的热爱者和赞美者。我想，人间所有壮阔的胸怀，无不来自那里。

英雄的粮食

普卢塔克（约 46—119），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作家。关于这位远古作家的详尽生平，今多据推断。生于希腊中部小镇凯罗涅亚，家境富庶，父为历史学者。曾在雅典学习哲学、修辞学和自然科学，后去亚历山大城再学。做过小镇执政官，行省总督及神庙终身祭司。一生广泛游历天下，热心公益事

业。普卢塔克为古代闻名的多产作家，生平著述达二百七十七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称作《道德论丛》，包罗有关伦理、宗教、哲学、政治、科学、文艺各方面的论述。另一类称作《希腊罗马名人平行列传》，全书涉及从上古黄金时代到作者当代的几乎所有希腊罗马的历史名人，计五十篇。此书择希腊人与罗马人品行或业迹相似者配对记述，是为证明希腊同罗马一样也拥有自己光荣的英雄。关于普卢塔克的著作，后人讲：《道德论丛》向我们表明，古代世界在思想领域里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和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名人传》则以同样的方式表明，古代世界在行动领域里取得了什么成就。

在我们读过的西方传记著作内，几乎无一例外会提到《希腊罗马名人传》，它是每个时代杰出之士成长期的必读书目。在激发和鼓舞人类的无畏精神上，没有哪部书比《希腊罗马名人传》所起的作用更大。它把人类青春时代的无限勇气，永恒地带向未来。没有普卢塔克，历史中会少出现许多英雄。有人问十七世纪学者西奥多·加札，假如书籍将面临一场沉船灾难，而他只能保留一位作家的著作，他会选择谁的？他回答：普卢塔克。普卢塔克对人类的重要，写在许多伟大作家的书中。从《希腊罗马名人传》，我们得以一睹古代大散文叙事（历史著作以外）文体的风彩：准确、清晰、简约、自然，流水行云般不现笔底的媚痕。这是一种以生气和力量作后盾的自信，坦荡直率地面对事物本身。写作面貌的确立，不单是作者意愿的问题，它与血质和灵魂相关。

四季之地

德富芦花（1868—1927），日本作家。生于熊本，贵族家庭。十八岁皈依基督教。一个富于民主思想的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主要作品：长篇小说《黑潮》，随笔集《自然与人生》、《蚯蚓的梦呓》。一九〇七年去耶路撒冷朝圣，途经俄国，拜会了托尔斯泰。归国后作《顺礼纪行》，表达了他对托尔斯泰的崇敬之情。后半生携妻退隐乡间，过着托尔斯泰式躬耕田园的“农民生活”。《蚯蚓的梦呓》记述了他的这段历程。晚年在写四卷忏悔录时去世，这部回忆录性质的著作，最后由其妻完成。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文明民族比日本更爱四季。日本民族的感官，天然为时令而生。他们在纬度适中的岛上，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四季中的自然，精神的最后居所，古今作家的一个永恒主题。在日本文学里，自然比人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尊重。《自然与人生》这部日本文学的经典作品，曾被定为近代日本国民实行“情感教育”的通读书目。写作《自然与人生》时的德富芦花，尚未见到托尔斯泰。从这部随笔我们可以看出典型的东方审美情趣，和对待自然的静观态度。与托尔斯泰的会面，使这位日本作家受到了震撼。相信在以后译出的《蚯蚓的梦呓》里，我们能看到一个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热烈灵魂。德富芦花，用文字为自然画像的作家。他对自然的出色专注，将让每个阅读《自然与人生》的读者顿悟：我们功利之外的世界多么亲切美好。

无边的母性

米斯特拉尔（1889—1957），智利女诗人。生于智利北部比库尼亚村，具有西班牙、巴斯克和印第安血统。因父亲弃家出走，她早年独立谋生，十五岁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做过女子中学校长、大学西班牙语教授及联合国官员。十四岁开始发表诗作。十七岁时恋爱，因对方自杀，终生未嫁。主要作品有诗集：《孤寂》、《柔情》、《有刺的树》、《葡萄压榨机》等。一九四五年，因为“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而获诺贝尔文学奖金。她是拉丁美洲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第一人。一九五七年病逝于纽约。

米斯特拉尔是诗人，也写了大量散文作品。在世界文学里，我们可以列举的纯粹散文作家，非常有限。散文世界的广大，主要赖小说家、诗人及其他领域作家的共同构筑。小说家的散文，往往在谈什么事情，与他们的创作缺乏使命感一致，他们的散文写作也像说话一般随便。诗人的散文，本质是另一种形式的诗。诗歌的元素，在诗人的散文作品内遍布。我们能够从中强烈地感受出激情、愿望、热血、灵魂这些文学中永远激动人心的成份。“现在我确信，树木和万物都有自己的孩子正在睡觉，它们则正躬身守护在孩子的上方。”（《母亲之歌》）很难想象这样的文字会出自脚踏实地的小说家们笔下，而其正是诗人米斯特拉尔的散文。“美是上帝在人间的影子”，“美即是怜悯和安慰”。米斯特拉尔的艺术信念，

使对孩子的爱、对人类弱者的广阔关注，成为她创作的主题。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女作家，但在米斯特拉尔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母亲的形象。

复活的先知

纪伯伦（1883—1931），黎巴嫩诗人、散文作家。生于黎巴嫩北部山乡卜舍里。早年进贝鲁特“希克玛（睿智）”学校学习。一九〇三年第一批文学小品在阿拉伯《移民》报发表。一九〇八年，小说《叛逆的灵魂》触怒当局，遭到驱逐。后去法国学习绘画和雕塑。一九一一年定居美国，从事绘画和阿、英文写作。早期作品以小说为主，在美国定居后主要写作散文诗，他是阿拉伯近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用此文体写作的作家。主要著作：阿拉伯语作品《泪与笑》（散文诗集）、《行列圣歌》（诗集）、《折断的翅膀》（长篇小说）；英语作品《疯人》（散文集）、《先知》（散文诗集）、《沙与沫》（散文诗集）等。纪伯伦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罗丹称他为二十世纪的布莱克。死于纽约，遵照他的遗愿，骨灰运回黎巴嫩，那里为他修建了一所纪念馆。

纪伯伦诞生的那片地域，是孕育宗教与走出先知之地，是给予启示与传播箴言之地，人们无条件地把它看作人类精神的源和心脏。“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旧约全书》）“你们中当有一部分人，导人于至善，并劝善戒恶；这等人，确是成功的。”（《古兰经》）我们知道这两部试图化人间为天国的书，来自世界哪个部位。“一个伟

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这句话同样有着圣籍的语气，它出自纪伯伦之口，一个使先知在他的身上复活的人。尽管罗丹曾断言他为“伟大的艺术家”，纪伯伦并未受到他的世纪应有的重视，他没有得到那项文学上的最高荣誉。二十世纪蔑视严肃和教悔，而纪伯伦与它背道而驰。“我们在绘画和写作时应远离一切常见的平凡之物，以获得非凡的含义和色彩。”纪伯伦是一个写作散文的诗人，他的前述观念使他的作品抹去了时代之痕，具有超世的魅力。他向我们讲述的是本质和根，是人类世代亘古不变的永恒话题。这样的作家，仿佛由神遣来，于人类最宝贵。

清澈的心灵

清少纳言（约966—1013），日本女作家。平安朝中期人，歌人之女。成年后到宫廷皇后身边供职。主要作品，一部《枕草子》，写于宫中十年。《枕草子》主要记述宫廷见闻，四季物象和作者对世物的见解。《枕草子》之前，日本已出现物语文学和日记文学，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其为日本随笔文学奠定了根基。晚年的清少纳言，景况凄凉，落发为尼。

在妇女对文学的贡献方面，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妇女能够与日本妇女相比。《源氏物语》，最早的长篇小说，全世界妇女的骄傲。《枕草子》是日本妇女奉献给人类的另一颗星辰，它的光芒在世界文学中同《源氏物语》一样明亮。关于清少纳言，史籍记载甚少。从《枕草子》我们可以断定，她学识

渊深，见闻广博，是个无限热爱生活的人。她的诗书性情与宫廷寂寞环境，促成她在漫长的宫闱时光中记下自己的所见所感，不厌其繁。《枕草子》显示了清少纳言非凡的观察力和惊人的概括力。她深入事物的最细微之处，使我们在任何琐屑的世物中都能体会到意义和美感。《枕草子》告诉我们，世界上有多少不该在我们一生中忽略的事物。

唯美主义

王尔德（1854—1900），爱尔兰作家。"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十九世纪末英岛唯美主义运动代表人物。生于都柏林，父为名医，母为诗人。曾进牛津大学学习，被罗斯金和佩特的美学思想吸引。一八八二年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讲学，宣扬他的美学主张。回国后任杂志评论员、编辑。主要作品：《快乐王子集》（童话集）、《道林·格雷的肖像》（长篇小说）、《里丁监狱之歌》（诗集）及几部戏剧。王尔德也许是作家中仅有的因极不光彩之事而入狱的人。出狱后迁居巴黎，写忏悔录《从深处》。精神崩溃，生活潦倒，导致了他三年后的早逝。

十九世纪对人类来讲，无论怎么说它重要也不过分。当我们尽情呼吸二十世纪精神和物质的清新空气时，不该忘记促成这一切到来的上一世纪的前驱。现代文学的活泼、斑斓、诱人，常常令我们滞身其中，流连忘返。以致连距这里很近的唯美主义与王尔德，我们都已感到陌生。唯美主义是艺术纯粹的真正追求者和捍卫者，只是他们没有进一步想清，让

艺术脱离尘埃弥漫的大地，即是在夺取艺术的生命力。从王尔德作品的脆弱性，我们可以认定，唯美主义者最终是自己“艺术只为本身之美而存在”的观念的牺牲品。艺术革新者们的另一表现，往往是同既定社会生活规范的对立。王尔德的语惊四座和奇装异服，在当时与他的文学同样闻名。他后来私生活上的放浪，几乎使我们丧失了对他应有的敬意。王尔德的作品，最为出色的在他的《快乐王子集》。这九篇童话与世界任何的优秀童话比较，都不会缺少信心。尽管王尔德宣称“一切艺术都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在这些瑰丽的童话内，还是感受了强大的引人高尚的力量。

伟大的故事

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生于图拉省雅斯纳亚·波利亚纳，贵族家庭。曾进喀山大学学习。在高加索服过役。年轻时，两次去西欧游历。主要作品为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日，个人信仰与家庭环境对立的日益紧张，迫使他秘密出走。途中病死于一个三等小站。遵其遗言，遗体葬于波利亚纳森林。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对于托尔斯泰作为一个文学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评论家们从未提出过疑义。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说，倘若我要指出一部小说，对它可以贴上“古今最伟大的著作”这样标签的话，那我就要推《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我所认为的最伟大的全民艺术家，所

有世纪最高尚的人物，人类的良心。从来作家都沉湎于文学本身，而托尔斯泰仅仅把文学看作自己伟大活动的一部分。托尔斯泰是历史罕有的，用他的人生和全部文字，为人类指明正确道路的人。当晚年已身罹不治之症的屠格涅夫，注意到托尔斯泰正离开文学去接近“神秘的伦理学”，并有沉溺于其中的危险时，他不能忍受这样的损失。他勉力致信托尔斯泰，恳求他“回到文学活动上来吧。”屠格涅夫的忧虑，典型地反映了那些职业化作家的局限和弱点。在人们那里，托尔斯泰的名字是和他的三部巨著连在一起的，但当人们问起托尔斯泰，他认为哪些作品自己写得最好时，他回答说：民间故事《人靠什么活着》和《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托尔斯泰把他的民间故事看得重于他的长篇小说，显然异于人们囿于文学之中来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托尔斯泰将那些只有少数精选之人才能懂得的艺术，称做坏的艺术。他把朴素奉为写作的第一要素。我在读这些民间故事时，常常想到《新约全书》中的使徒行传，它们给我一种辽阔土地的感觉。

一九九一年五月至六月

海子死了

“海子死了！”这声音震听欲聋。时间：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凌晨。地点：山海关。当我证实了这个消息后，我感到万分痛苦和悲哀。

三月二十一日的中午，我外出回来，你正站在楼下等我。你脸色憔悴，神情凄然。你说，你几乎死了，你夜里三点来过，见室内没有亮灯便走了。你去了昌平南部的京密运河，你在岸上徘徊了很久，阴历十四的满月映在水里，两岸新绿的垂柳微微摆动，美站在诗人与死神之间，你无力跃过这道最后防线。你再次看到了幽幽落月和辉煌的日出。

你告诉我，你已四天没吃食物，现在感到很饿。你从死亡的边缘回来，我深信你熄灭的生命之火已经复燃。你发誓从今以后不再喝酒，酒铸成了你的大错。我们饭间又开始谈笑，我为你庆幸和祝贺。我说死无论如何应是五十岁以后的事情，否则天堂不纳，地狱不容。牧师从不为自杀者超度。我们随之谈起自杀的方式：梵高、海明威的庄严，川端康成、普拉斯的平静。你提到美国诗人哈里·克罗斯比，他曾计划驾

驶飞机到一座森林上空，然后跳出机舱，以达到死于太阳并进入太阳。你说从高空坠落可能不等触地就已窒息，我用飞行员跳伞到一定高度才张开伞翼的现象反驳了你。我们把话题转到了歌德，转到歌德在《浮士德》里提及的那个神秘预言家诺斯特拉达穆斯。你说，他的预言大多应验，东方人长征，两次世界大战，肯尼迪之死都被他预言过，他预言一九九九年世界将有大的事变。你说他的预言集《世纪连绵》国内已译出，译者似乎以此居奇，正与出版社讨价。我们还谈到西藏，谈到历世班禅无一寿终，谈到这次关于人权的签名活动。

你向我讲起你新近的诗剧，你为无处上演它们而悲叹惋惜。你随意翻看我的笔记，看到那则火是逆风而行的发现，你想起这次在安徽家乡对夜的观察，你说夜色不是从空中降下，而是从大地涌起。你长久地盯着一颗颗像是相继出来敲钟的星星。你从书架上抽出斯特林堡戏剧选，《红房间》和张承志的《金牧场》。你向我找考利的《流放者的归来》，你在看哈里·克罗斯比的自杀，看他怎么用自杀对他所蔑视的世界做最高姿态的挑战。“对于火的追求者来说，对于太阳的预言家、先知和崇拜者来说，生命不是以呜咽啜泣，而是以一声巨响而告结束的——一次机械学上完美的猛烈爆炸。”你专注他《死亡万岁》中这段话：“以克莉奥佩特拉为例吧！以圣徒和殉道者为例吧！以尼采为例：死适其时。”这样做是为了重生，为了变成你希望变成的东西：树或花，星辰或太阳。

我们同在小城昌平，我可能是得知你欲入绝境的惟一的朋友，可能是你生前所见的最后一个朋友。然而我低估了你

内心的痛苦和负疚的情感，忽略了你诗人高贵和脆弱的精神与灵魂。我没有给你更多的宽解与劝慰，我们的分别象往日一样简单，我万万没有想到从此竟永不能再见。我不知这五天你怎么度过，我没有想起适时去看看你，那时我正意外地热衷于劝世，热衷于与培根为伍，去论他未论的幸福。我没有尽到一个朋友的责任，失去了或许能挽留住你的时机。这是我最大的疏忽和过失，我终生的悲哀和憾事。

你常常谈到那些早夭的诗人：雪莱、叶赛宁、韩波、马洛、荷尔德林、坡、克兰、狄兰、席勒及普希金。你称他们是没有成王的王子，诗歌王子，太阳王子。你说，正如悲剧言中，最优秀最高贵最有才华的王子往往最先身亡，他们悲剧性的抗争和抒情，本身就是人类存在最为壮丽的诗篇。他们美好的毁灭就是人类的象征。有时，你甚至在一刹那间觉得雪莱或叶赛宁的某些诗是你写的，你与这些抒情主体的王子已经融为一体。这仿佛是你对自己命运的某种阐释和预言，今天你以比他们更为年轻的二十五岁的光辉年华，早早地让它应验。你忘了你立下的伟大抱负和誓言："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这是我，一个中国当代诗人的梦想和愿望。"

春天，万物生长，诗人死亡。

一九八九年四月

诗人是世界之光

——关于海子的日记

约一九八五年末或一九八六年初。

写小说的朋友星竹，带来一个人。他给我介绍说：这是海子，写诗的。一个衣着随便，戴旧色眼镜，瘦小的，外省少年形象的诗人。我尚未读过他的诗，也未听说过海子这个名字。海子刚刚二十一岁，已经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两年，由于法大筹迁昌平，他们的宿舍搬到了这里。海子本名查海生，一九六四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乡村，一九七九年十五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他的身上显示着早慧和天才的迹象。

结识一个温和的朋友，仿佛走进一座阳光普照的果园。海子涉世简单，阅读渊博，像海水一样，单纯而深厚。他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喜欢，他也会很快和任何一个人交上朋友。海子给我的印象，让我想起惠特曼的一句话："我想凡是我在路上遇见的我都喜欢，无论谁看到了我，也将爱我。"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海子送来一本油印诗集《麦地之瓮》，里面收集了他和西川的抒情短诗。目前打印诗集仍是青年诗人清理创作、保存诗歌、传播作品的惟一方法。

海子已经是个成熟的诗人，在语言上，我看不出他的破绽。语言在他手里，像斧头在樵夫手里。海子的诗不指向任何具体事物，而指向实体。幻想和实体是它的两翼，尽管它像精灵一样漫天飞翔，但依然活生生，可感，有质量。海子把他唤来的一切幻象，都化作他所熟悉的家乡事物的意象，使他的诗在根源上与民间和大地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读海子的诗，你也许感觉不到它实在的意义和目的，但它至少打开了你关闭已久的精神之窗，使你的心头忽然一亮。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九日

今天海子来找关于大地的书。他说至今还没有看到一部这样的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沾点边。我提到汉姆生的《大地的成长》和俄罗斯的作品。俄罗斯作家，除极少数外，都可看作是“大地”的作家（俄罗斯的心灵，是永远怀恋着广阔土地的心灵。），大地和季节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如安详和麻雀与村庄的关系。

海子找的是关于大地本身的书，不是小说，也不是土壤或地貌的教科书。

我的书橱内摆了一只画盘，图案是一头毛驴，像西班牙乡村道上跟在希梅内斯身后的普拉特罗（小银）。海子看了取

笑我。驴子是诗人天然的朋友，从驴子那里，诗人得到温和、朴素、谦卑、机警。我所热爱的两位诗人，弗朗西斯·雅姆和胡安·拉蒙·希梅内斯，都是热爱驴子的诗人。

想起一些遥远的、渐渐陌生的事物：农夫、渔夫、船夫、樵夫、猎户、牧人、采药人、养蜂人。它们属于已经逝去的世纪，这是一些词和职业，也蕴含着另外的意义：它们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桥梁。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

海子来告诉我，书店在卖惠特曼的《草叶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册，他买了一套。他说，优秀的诗人看看选诗就行了，伟大的诗人要读全集。

关于维柯和汤因比，海子认为有了维柯的《新科学》，可以不必再读《历史研究》。

作为历史学家，维柯与汤因比的区别，实际上是诗人与哲学家之间的区别。维柯这样写《新科学》："当英雄们把谷穗称为金橘时，谷物一定还是世上唯一的黄金。"汤因比这样写《历史研究》："我们现在也许建立了一个真理，这就是安逸对于文明是有害的。"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八日

读海雅达尔《孤筏重洋》。书是海子送的，他对我说，一九八六年读的最好的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一九八七年读的最好的书是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这是两部闪耀着人类自古不熄的英雄主义之光的书。两书的作者通过自己的行

动，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可能，他们是做出了人间壮举的英雄。

亨利·戴维·梭罗，美国作家，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爱默生的朋友和门生，超验主义精神的践行者，一个把思想与人生完美地结为一体的人。为了试验人除必须的物品，其他一无所有也能在大自然环境中愉快生活，一八四八年七月四日，二十八岁的梭罗提着一把斧子，只身来到康科德郊外林中瓦尔登湖边。他用林木造了一间小屋，小屋宽十英尺，长十五英尺，四壁开窗，大门朝向湖面。他在这里种植、阅读、思考、写作，整整居住了两年。他的木屋从不上锁，两年间木屋接待过从逃亡的奴隶到哲学家各式各样的客人，从未丢失过什么。只有一次，来客带走了他的一本希腊文诗集。此事使他得出了这个结论：人类中惟一不能信任的人，就是那些喜欢书籍的人。两年自给自足的湖畔生活，他写出了被称作超验主义圣经的重要著作《瓦乐登湖》。

托尔·海雅达尔，挪威人，动物学家，年轻的勇士。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海雅达尔驾驶一只木筏离开秘鲁海岸，驶入茫茫太平洋。木筏飘流四千海浬，历时九十七天，终于到达马克萨斯群岛，从而证实了他的一个伟大设想：太平洋诸群岛上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是公元五世纪从南美大陆乘木筏漂洋而来。他把这次传奇经历，写成一本书，取名《康铁吉》（我国译者将其易名为《孤筏重洋》），铁吉是传说中波利尼西亚人的领袖，他率领波利尼西亚人来到这些岛上，波利尼西亚人称他为太阳之子。海雅达尔的木筏以之命名。

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

晚上去政法大学新校海子宿舍。

开门的海子长发抵肩，脸带伤痕。我已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他的样子使人吃惊。他指给我看屋角扔着的一堆空酒瓶，酒瓶无色，都是纯酒。他每日大量饮酒，须发绕脸一周。他告诉我，前几天在城里餐馆喝酒，与同桌发生争执，对方的拳头打碎了他的眼镜，他的脸上留下了血痕。伤反而使他感觉舒畅一些，他仿佛从某种极端状态中得到了解脱。他正在写一部诗剧，一位政治领袖在诗剧中的诗赛上获得了第九名。最近经过申请和介绍，他加入了“幸存者协会”，一个对中国诗歌有所贡献的诗人组织。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六日

临近深夜，海子敲门。他称刚从北戴河回来，他告诉我，明天要和一平去西藏，这次是到藏南。他吃了一个番茄，然后幽灵似地消失在黑夜中。海子似乎永不会疲倦，一个劳逸不显于色的人，我从未见过他的脸色憔悴或丰润。

海子正跋涉在挺进史诗(他称作“伟大的诗歌”)的路上，荷马、蚁垤、维吉尔、但丁、歌德、莎士比亚，远远地照耀着他，命他倾尽全力到达。“我写长诗总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也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些元素和伟大材料总会涨破我的诗歌外壳。”他本是一个出色的抒情诗人，他本应该留在抒情诗领土上做王，一种崇高的使命感，驱使他出来流浪。他似乎知道世界期待于他的是什么，他也决心不辜负这种期待。他对诗歌的过去了如指掌，

他看到歌德之后，在人类诗歌史上创造伟大诗歌的两次失败。他为自己立下了誓言：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他仿佛是由神指定到世上来做伟大事情的人。

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

去看海子。他正在写作，桌上摊着纸稿，桌下放一只塑料水桶，他坐在椅子上，双脚浸入水里。他诙谐地说，作家写作都有一些个人癖习。(海明威站着写作。卡波特构思要躺下来。穆尔写诗时常常脱光衣服。易卜生要把对手斯特林堡像在面前摆好方能动笔。)他病了，不断咳嗽。寒假过后他从家里回来，母亲给他带了家乡的草药，老人认为儿子的病是努的。去年秋天，他去西藏，回来背了两块佛石。这是两块厚实的并不规整的石板，光洁的一面镂着佛像，上注彩漆。两块佛石的重量近二十公斤，我惊异千里迢迢他是如何背负这两个重物的。他在西藏看到藏民都睡地铺，他的床也铺在了地上。

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

清明。风和祖先的节日。我们祭奠逝去的亲人、朋友和英雄。

十天前，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未来将会铭记这个日子，在万里长城的东端山海关，中国杰出的诗人海子，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坡路缓速行驶的火车，将他的躯体整齐地切为两部分，眼镜完好地垂落一旁。他的胃里干干净净，只

有几瓣桔核，像他纯洁与占有很少的一生。他在这个黑白相间的世界上，仅仅生活了不足二十五年。

在世界所有的诗人当中，海子与叶赛宁有着同一的命运。他们的早晨生涯最为相近。海子热爱叶赛宁，他给叶赛宁写过一首诗《旅程》：

我是浪子
我戴着水浪的帽子
我戴着漂泊的屋顶

灯火吹灭我
家乡赶走我
来到酒馆和城市

我本是聪明能干的农民子弟
我本应该成为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年轻的乡村教师
和纯朴的农家少女一起陷入情网
但为什么我来到了酒馆和城市

我要还家
我要转回故乡，头上插满鲜花
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
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

我头上插满故乡的鲜花
如贝亚德引导的
头上插满天堂火焰的但丁

我是善良的母亲的儿子
风吹雨打妈妈的门
儿子的帽子是浪子
在此刻和水浪不分轻重

叶赛宁死后，他的朋友在把他的遗体运到瓦甘科夫斯克墓地之前，抬着他的灵柩沿普希金纪念碑绕了一周。阿·托尔斯泰写道："我认为我们整个民族应该为叶赛宁服丧。"在蒲宁的《阿尔谢尼那夫的一生》里，我知道了另一个早逝的诗人，谢苗·雅可夫列维奇·纳德松，他的终年与海子相同。他的金属棺材沉没在鲜花丛中，俄罗斯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出版了他的诗歌全集。海子与我们永别了，他的骨灰由母亲含泪抱回家乡，他遗下的大量作品等待着我们整理。将海子送给我们的神，正注视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海子周年祭

海子离开我们一年了，我们身旁空旷，坐在暗淡和怀念里，抚摸海子留给我们的诗歌。许多瑰丽的、优美的、甚至伟大的诗歌，被海子带走了。环顾四处，没有一个人能够走来，代替海子，把他的黄金，火焰和纯粹还给我们。

海子含着泥土，来自大地的深处。他是民间的儿子，具

有和谐的自然启示的诗人。“农业只有胜利/战争只有失败”“双手劳动/慰藉心灵”“第一个牺牲的/应该是我自己”。这些箴言圣歌式高贵的诗句，是大自然在心脏中所讲，它通过这个诗人之口传授给我们，使我们听了战栗。

天才是自然所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礼物，为了得到这样一件礼物，也许我们要等待几个世纪。如果它在我们手中受到损失，责任全在我们自己。卡莱尔讲：“诗人是世界之光”。这光芒射自天堂，它映照一切事物的本质和核心。世界上缺少了诗人，我们的精神暗淡，大地垂首默默无言。

一九九〇年六月整理

怀念海子

今年是海子辞世五周年，刚刚复刊的《诗探索》杂志，决定编辑一组有关海子的文章，以纪念祖国这位早逝的杰出诗人。文章各有侧重，编辑部约我从与海子交往的角度，谈谈平日的海子。作为一个海子生前比较密切的朋友，一个海子最后岁月的“见证人”（西川语），海子死后，我曾写过《海子死了》与《诗人是世界之光》两篇悼念文章。现在，在海子辞世五周年之际，我再次写下此文，谈谈我与海子交往中上面两文未涉及的一些事情，以共同怀念我们的诗歌天才，亲爱的兄弟。

我和海子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冬天，时间约在一九八五年底或一九八六年初。那天晚上，他是随一个写小说的朋友，一起到我家来的。当时他所执教的中国政法大学，正准备由市区迁往昌平，部分教师的宿舍先行搬到这里，临时住在城西北角西环里小区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租用的楼里。我记得当朋友向我介绍说：这是海子，政法大学的教师，写诗的。我感到很惊异，因为看上去他还完全像个孩子。他身

体瘦小，着装随便，戴一副旧色眼镜，童子般的圆脸，满目稚气。虽然他此时已二十出头，但在他身上，依然是一种少年的和早慧的气息。海子一九六四年生，一九七九年十五岁时即从安徽怀宁家乡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他毕业时的年龄恰是我们一般入学时的年龄。毕业后，他被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初编校刊，后走上了讲坛。我尚未读过他的诗，也未听说过海子这个名字，但他的神童历程，已令我肃然起敬。一生远离巴黎，居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的故乡小镇，写出“把我们得不到的幸福给予所有的人吧！”（《祈祷》）的法国诗人雅姆（一个我非常喜爱和崇敬的诗人），被里尔克敬重地称为“外省的诗人”。此时我将我眼里的海子，看作“一个外省的少年形象的诗人”。他实际已在自己的诗中，写下了“第一个牺牲的/应该是我自己”（《一九八五年诗抄之二：种籽》）这同样震撼心灵的诗句。

这之后，我们好像见面并不多。真正密切交往，是后来的事了。不久我从家里搬出，恰好也住到了西环里。我住的六号楼距他们的十五号楼很近，一楼之隔，几分钟的路。由于我们都是单身居住，因此来往没有任何顾忌。谁想到谁那去，完全不必考虑此时是什么时间。直到一九八八年他们搬进位于城东的政法大学新校，我们在西环里做了近两年的邻居。

海子在我所结识的朋友中，是我感到交往上最无障碍、最自然、轻松、愉快的一个人。他胸无城府，世事观念很淡。他在意识上并不努力将自己纳入某个“类”（诗人或其他）中，进而染上这个类贯有的毛病。比如：一事当前，先盘算做了

是否掉价或有失身份；满脑名士观念，社交上人为地制造距离感等等。海子不是一个刻意做诗人的人，他是一个一心一意写诗而绝少其他念头的人。我在《诗人是世界之光》里写道："海子涉世简单，阅读渊博，像海水一样，单纯而深厚。他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喜欢，他也会很快和任何一个人交上朋友。海子给我的印象，让我想起惠特曼的一句话：'我想凡是我在路上遇见的我都喜欢，无论谁看到了我，也将爱我。'"《诗人是世界之光》是一篇日记体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则："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　晚上去政法大学新校海子宿舍。开门的海子长发抵肩，脸带伤痕。我已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他的样子使我吃惊。……"稿子发表后，我注意到"长发抵肩"的"抵"，被细心的编辑改成了"披"。两字的差异在于，"长发抵肩"是指头发一时无心剪理而长至肩头，"长发披肩"则指日常倾心于蓄长发。我想编辑可能认为，作为前卫诗人的海子，平日大概也是一副一般现代派艺术家的作派。但海子不是这样。平日的海子，既有着农家子弟温和与纯朴的本色，又表露着因心远而对世事的不谙与笨拙。

海子比我小几岁。但无论是在文化视野，还是在诗学修养上，他都是一个先行者和远行者。他对诗歌更为专注和深入，他是一个洋溢着献身精神的纯粹的诗人。我可以说，与海子的交往，使我获益很多。我曾写过一首关于麦田的诗，其中最后一节为："麦田被道路切割/麦田把村庄环绕/居住在麦田之内/便是居住在贫匮之外"。海子看后，认为不如将"贫匮"改为"贫穷"。他的指点，使我恍然明白应该怎样使字词或诗本身从矫情的"文化"，回到实地的"生活"。在海

子的诗中，麦田是被直呼为麦地的："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回顾往昔/背诵各自的诗歌/要在麦地里拥抱"（《五月的麦地》）；"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答复》）。他的称呼，是农民兄弟自己的称呼。我是个倾心信仰人类曾经有过"黄金时代"的人，信仰人类的初始生活像河流的源头一样清澈。为此，我写过诗《美好如初》。我相信"人（只要他肯）皆可以为尧舜"（孟子），为"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泰戈尔）动心。我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在艺术与文学中，我更崇尚艺术家的使命。对一项艺术形式的探索或革新，我也许会无动于衷，但当我读到"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纪伯伦），"当大地还有生灵遇难，我又怎么能幸福"（马勒）这样的文字，我会深受震动。我觉得艺术家就是那些努力使人类重新回到"童年"或走向"尧舜"的人。我曾就此同海子交谈过，他认为，人一开始就是复杂的，分裂为二的，否则就不会有后来耶稣基督的救赎。我知道，海子的观点是更为深刻的、本质的、真实的，我的信念，则更多地源自一个个体生命的意愿与心情。我是一个至今仍滞留在"人之初，性本善"的观念中，不忍面对（或承认）人性真面目的人。

海子广读博览，涉猎宽泛。他看书的速度很快，每次我到他那去，发现他正在读的必定是一本新的书。有时他从我这拿走一本书，第二天便会将读完的书送还。我有不少书是经他谈论、推荐，才买来或首读的。这里我首先要说的，是

美国十九世纪作家梭罗的那部光辉著作：《瓦尔登湖》。由于海子的传播，我读到了这本有生以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海子讲，他一九八六年读到的最好的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一九八七年读的最好的书是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孤筏重洋》是一本小书，译本为一九八一年版，定价很低，海子碰上时大概买了好几本，分送给朋友。托尔·海雅达尔是挪威学者，一个年轻的勇士，他为了证实他的"太平洋诸群岛上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是从南美大陆乘木筏漂洋而来"的惊世设想，只身驾驶木筏做了一次试验。此书记录了他的这一历时九十七天，飘流四千海浬的辉煌壮举。海子卧轨时，身边带了四本书，其中即有我们上述谈到的两书（另两本为《新旧约全书》和《康拉德小说选》）。一九八八年春，海子去了一趟四川，回来后，有这样三个细节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他说的一句近乎戏谑的话：四川常年阴天，所以当地人看起来就像每天都在搞阴谋似的；二是他送给我一张他在沐川与诗人宋渠、宋炜兄弟合影的照片；三是他向我推荐他在当地书店买的一本有着"文明人从未能在一个地区内持续文明进步长达三十——六十代人以上"论断的书：《表土与人类文明》。海子曾到我这里找过关于大地的书，他说至今尚未看到一本这样的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沾点边。那次他并未如愿，只拿走了汉姆生的小说《大地的成长》和一本《爱鸟知识手册》。去年我在王府井书店，意外地买到一本与大地相关的书。读后我难以抑制地写了一篇介绍文章。我说："好兄弟，现在我告诉你，有一本一定更合乎你心愿的书，已被介绍过来，书名译作《沙乡的沉思》。美国伟大的生态学家，环境保

护主义的先驱，'土地道德'首倡者，可敬的奥尔多·利奥波德所著。"海子的诗歌理想（"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的萌生、衍进和形成，是与他的阅读同步推进的。如果我们看看他的诗学著作（《诗学：一份提纲》），我们会对他的阅读感到吃惊：仿佛人类的全部文化都已装进这个二十几岁青年的头脑中。海子不仅沉浸在人类既往文化的无边海洋中，同时他也敏锐地感应与关注着当今世界文学艺术的动态和发展。比如，他所称的"处在某种边缘和动乱、混血的交结点上"的异军突起的拉美文坛；因社会渐渐松动而陆续解禁及新问世的一些具先锋色彩的前苏联作家作品（我觉得海子是偏爱北方的"斯拉夫的俄罗斯"的）。就后者来说，他读了，我们在一起谈过的就有：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及刊于《世界文学》一九八七年第二期的沃兹涅先斯基的作品《零》等。海子对国内文坛的一些新锐作品也是留意的，我印象中他读过的即有《棋王》、《红高粱》和《金牧场》等。

我们常一起进城。主要是去书店、看展览或见见朋友。我现在能够记起的有这么几次。一次在新街口书店，我们每人买了一本奥维德的《变形记》。这是一本深受历代作家喜爱的书，《神曲》中，它的作者被但丁列为荷马、贺拉斯之后的人类第三大诗人。我曾有在买来的书上即兴写下一两句话的习惯，类似"有助于文明社会丧失了的想象力复苏"（《希腊的

神话和传说》）等。在这本书上我写了“热爱人类的童年”，时间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另一次是海子随我去顾城处，那天我们被主人诚恳留住了。都谈了什么，我完全想不起来了。印象仅存的一个细节是，晚上我们一起看一个有关西藏的电视片，当时美术馆刚刚举办了一个“西藏民间艺术展”，我问顾城去看没有，顾城说了这么几句：听江河讲不太好，就没有去，后来我忽然醒悟了，江河是只看书、看画片、听音乐，而不看实物和自然的，我被他骗了。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到美术馆看一个国外画家的画展。是一人的，还是一个画派或国家的画展，我搞不清了。只记得这个展览出售许多印象派以来的绘画大师的画册，印制精美，都是原版进口的，很贵，但机会难得，我们每人买了一册。海子选的是塞尚，我选了马蒂斯。塞尚，一个崇尚体积和结构，注重造型的革命性画家，被世人公称为“现代绘画之父”。除此，我仍想更深地理解海子这一选择。写作本文的时候，恰好我的一位熟知海子作品的朋友，上海的青年画家丁乙，自沪来京观看意大利当代画家米莫·巴拉第诺画展。我请他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海子的作品虽然有着理性的框架，但本质上仍是抒情的，直觉上他需要补纳“理性”，故他选择了塞尚；我选择马蒂斯也是基于这个道理：即我的“理性”，需要补纳“抒情”。另一位深爱海子诗歌，且对绘画艺术很有造诣的朋友，在电话里向我谈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海子选择塞尚，原因很简单，就是塞尚的画打动他了。他认为塞尚的绘画总体上仍是抒情的。他让我看看《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塞尚的评价，那上面有这样一段话：“塞尚的艺术目的是，通过

纯粹的形和色彩，表现思想并激发起感情。他的艺术有着深邃的理性。其晚年作品达到了抒情的顶峰。”

丁乙从作品对海子与我的判断，我觉得是恰当的。海子的本质是“抒情”的、“诗歌”的，而我本质上是“理性”的、“散文”的。当我读到梭罗的《瓦尔登湖》，我的确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这就是我在诗歌路上浅尝辄止，最终转向散文写作的原因。我是一个本能地习惯于在事物中寻找意义的人。我有一盒《世界管弦乐名曲》磁带，其中有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上》。这也是一首海子极喜欢的乐曲，有时，在写作中他也会突然跑来听一听（如西川《怀念（之一）》所讲：“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我们曾各自谈了对这首乐曲的理解。我是从“意义”着眼的，我听到的是东方驼队在暮色草原上沉重的行程，及俄罗斯民族的忧郁与悲戚。海子则更多地是从“精神”来理解的（恕我已记不准他的话了）。另有一次，我们无意中谈起各自的笔名。海子原名查海生，我以为他的笔名是取“大海的儿子”之意，海子否认了。当时我孤陋到尚不知蒙藏高地的湖泊，是被诗意地称为“海子”的。他问我的笔名来历，我说起初来自北岛的一首我很喜欢的诗《岸》。此外，这个名字在视觉上是一片朴素风景；还有它原本的谐音可警我在灵魂上自励一生。这是一个宜看不宜称的笔名，至今无论是别人这么叫我，还是我自称，我都有点难于开口。

布莱认为，年轻一代的美国诗人在成长中，正在被学校生活的稳定、富裕所软化。他主张诗人应自觉接近自然和底

层普通大众，过艰苦的日子。和梭罗一样，他身体力行。布莱毕业于哈佛大学，在纽约生活几年后，便迁到了明尼苏达州马迪森市附近的一个农场。在美国，我还知道诗人弗洛斯特和散文大师怀特等，亦在农场（美国的乡村）定居。在僻远的地方生活久了的诗人，惟一感到不利的是什么呢？布莱说："最近我认识到住在一个不需要你，不敬重艺术的城镇，就一定会产生自我怀疑。是的，叶芝有时和自己争辩：不知多少次好奇地想到自己，原可以在一些人人能理解和分享的事物中证实自己的价值。"住到昌平这座距市区三十公里，毫无文化和精神可言的北方小城的海子，是否具有与布莱相同的感受呢？海子曾有一首关于"孤独"的诗，发表时，我注意到他换了这样一个标题：《在昌平的孤独》。海子死后，由诗转向散文的钟鸣君，在他的一篇名为《中间地带》的文章中，煞有介事地肯定："海子的自杀与他生活、往返的两个地区有关。"即一面是单调乏味的小镇；一面是他上过大学，有许多亲密朋友，精神可以得到拓展和丰富的文化中心。作者尽可从地缘分析角度谈论问题，但我不赞同这篇牵强、晦涩文章的武断结论。

在骆一禾致友人的书信和西川的纪念文章里，都对海子的居室有所提及。一禾写道："海子是个生命力很强，热爱生命的人。""他的屋子里非常干净，一向如此。"的确这样。在他的楼道门上，贴着一幅优美的摄影作品，内容为风景中的欧洲城堡。从楼下上来，你会觉得这幅画在向你说：这是一个诗人的居所。一张床，几个书架，一只书桌，大体构成了我们这位热爱生活的诗人居所全部内容。墙上饰有一块醒目

的富于民间色彩的大花布，一张梳着无数条小辫子的西藏女童照片，梵高的《向日葵》，还有一幅海子很喜爱的俄国画家弗鲁贝尔的作品：画面是一个坐着的男孩或小伙子，英俊、漂亮，神情略显忧郁，画题为《坐着的魔鬼》。一禾说，海子的屋子里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印度香的气味，并曾警告他“不要多点这种迷香”。这与他的写作有关。海子喜欢夜里写作，每晚他还要喝咖啡。

到了一九八八年上半年，他们搬进了新校。这使我们的来往骤然减少。新校在城东，由西环里骑车，至少需二十分钟。海子不会骑车。我到他那去，又时常扑空。此后直到出事，近一年时间，我们见面的次数很有限。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二，这是悲剧发生前五天。临近中午，我外出回来，意外地发现海子正站在楼下等我。他脸色憔悴，神情异样。还未上楼，他开口就说：“我差点死了。”他说，他夜里三点来过，见室内没有亮灯便走了。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他说事很复杂。到了楼上，他说他已四天没吃东西了，现在很想吃。我去厨房做饭，为他煮粥。正式的话，是在吃饭时开始的。我拿来啤酒。他说不喝了，并发誓从今以后永不再喝酒（我不知海子是何时开始嗜酒的）。我认为这是一次生死转折，应该庆贺一下，再喝最后一次。我们喝了一瓶。他向我讲了事情的经过。上星期，他们教研室搞了一次聚餐，他喝醉了，说了许多同女友关系的事，醒后大为懊悔。他觉得这是对女友的最大伤害，非常对不起她，特别是讲给了那些他平日极为鄙视的人听，罪不容恕，只想一死受过。我说，让我同她谈谈，她会谅解你的。他说，不行，

这是他无法忍受的，因为这样她就知道了。后来，我们转了话题。谈到诸如《流放者的归来》，预言家诺斯特拉达穆斯及他的预言集《世纪连绵》，早逝的班禅大师等。我桌上有一本《读书》，内有老木一文，海子看到笑说，老木现在出名了，出入有安全人员盯着（涉及当时的人权签名活动）。下午四点，我们出来。我还要到校准备当晚的课，他提了一瓶啤酒。我说，你已发过誓了，不要再动酒。他说他先不回去，想到北面山上再独自呆会儿。他似乎不好意思回校，他仿佛对我说过他已在宿舍留好了遗书。我不知为什么当时没有充分估计到事情的严重性。已经四天了，加上今天的情景，意识里，我总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一位编报的朋友恰好要来昌平，我嘱他这天一起来谈谈。他答应了。我们在街上就这么分了手。我下意识地想，什么时候他还会突然跑来。

他没有来。四月二日，我收到城里一位朋友的信，劈头就是：“海子死了”。时间是三月二十六日。这消息惊天动地，使我毛发高耸。此时，我觉得我才是一个真正有罪的人，不可宽恕。我为什么没有送他回去？为什么没有再去看看他？为什么没有想到陪他几天？这些天我在干什么呢？今天才得到消息，且来自城里。在《海子死了》（原为《我的悲哀》，编辑改为此题）一文中，我深为痛悔：“我们同在昌平。我可能是得知你欲入绝境的惟一的朋友，可能是你生前所见的最后一个朋友。然而我低估了你内心的痛苦和负疚的情感，忽略了你诗人高贵和脆弱的精神与灵魂。我没有给你更多的宽解与劝慰，我们的分别象往日一样简单，我万万没有想到从此竟永不能再见。我不知这五天你是怎么度过的，没有想起适

时去看看你，那时我正意外地热衷于劝世，与培根为伍，去论他未论的幸福。我没有尽到一个朋友的责任，失去了或许能挽留住你的时机。这是我最大的疏忽和过失，我终生的悲哀和憾事。”

导致我疏忽的还有一个因素，即我一直认定，海子遇到大事，一定会去找骆一禾和西川。我深知他们的友谊：友好的大学同窗，亲如手足的诗歌兄弟。正如一禾在致友人书中所讲：“我们三人的友谊在北京是很著名的。”当时我与骆一禾和西川都不熟，无法也未想到与他们联系。后来，经一个写诗的朋友中介，我们在一禾家里，就海子事，进行了一次长谈。三月二十一日，海子找过我后，并未再与他俩见面。一禾讲，海子二十四日可能去过火车站买票，二十五日晨离校去山海关，二十六日晨五时半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铁道上卧轨。他选了一个火车爬坡的路段。他死得从容，身体完整地分为两截，眼镜也完好无损。他又好几天没吃东西，胃里很干净，只有几瓣桔核。他带在身上的遗书简单写着：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遗作由骆一禾处理。

关于海子的死因，当时有各种说法。虚妄的，铁心的，听到别人的灾难便兴奋的。如：海子练气功走火入魔，想试试火车的力量；海子写完《太阳》之后，感到难以为继了；海子想以死来提高他的诗等。一禾的“有过‘天才生活’的人，大都死于脑子”的说法，是善意的，研究的，负责任的。他的角度，是依据海子留在校内的遗书中说他出现了思维混乱、头痛、幻听、耳鸣等症兆，伴有间或的吐血和肺烂了的幻觉等来确定的。他认为，“这是脑力使用过度以后脑损伤的

症候”。而我丝毫没有觉察三月二十一日的海子，头脑或神经有任何异常。他只向我讲了他的酒后失言，他的内疚和苦痛。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特意通过电话与西川交换了一下看法。西川认为，加缪讲，任何诗人的自杀都是有其直接原因的，一禾的说法，提供了一个“背景”，它还是另有导火索的。我觉得这样的判断是全面的、客观的、接近真实的。而这个导火索，应该是三月二十一日海子讲的那件事情。

一禾称海子为“赤子”。这是一个真诚的、献身的诗歌赤子。海子曾计划出资一千元，自费请一学院剧团上演他的一部诗剧。他的这一心愿，未能实现。当他听说“幸存者诗歌俱乐部”，是一个只有对当代中国诗歌具有较大贡献的人方可加入的诗人组织，他便庄重地提出了申请。经过诗人林莽和一平的介绍，他带着他的景仰和赤诚，成了这个组织最年轻的成员。“幸存者诗歌俱乐部”成立于一九八七年冬，最初由尚在国内的“朦胧诗”主要诗人发起、构成。这是一些开创了一代诗风，启发并影响了后起的诗人。他们都有着诗歌成就与资历的背景，曾经沧海，骄傲，自信。他们中，有的人和蔼、可敬、具兄长之风；也有人狂放，言行不羁，蔑视新人。一次对海子诗歌的讨论，个别诗人的出言不逊，深深地伤害了海子。一禾说，为此海子在他面前哭过。

上海诗人陈东东，在他的悼文《丧失了歌唱和倾听》中，生动地把海子看作嗓子，把一禾看成一个倾听者，一只为诗歌（或海子的嗓子）存在的耳朵。这是个极为恰当和出色的比方。当我们读了一禾关于海子的文章和书信，我们会说，没有什么人比一禾更知海子及他的诗。一禾认为：“海子是我们

祖国给世界文学贡献的一位有世界眼光的诗人，他的诗歌质量之高，是不下于许多世界性诗人的，他的价值会随着时间而得到证明。”我非常赞同他的结论和信心。海子，一个祖国难得的“点石成金”的诗人，在他的短暂的写作生涯（成熟期：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中，为祖国和人类留下了五百首抒情诗，七部长诗（诗剧），计二百多万字的诗文作品。这里，我想再提两位早逝的俄罗斯诗人。一位是谢苗·雅可夫列维奇·纳德松，一个终年与海子相同的诗人，他死后，俄罗斯为他制作了金属棺材，举行了隆重葬礼，随后出版了他的诗歌全集。另一位是我们熟知的谢尔盖·叶赛宁，在他的故乡梁赞，每逢九月二十一日（叶赛宁的诞辰日），都要举行俄罗斯文学日，他出生的康斯坦丁诺沃村，也以叶赛宁的名字命名，并与周围地区一起，被宣布为国家保护区。海子离世已经五年了，而他身后的一切，还仅限于朋友们私下的种种努力。（我感到非常惭愧的是，当时海子的后事料理、悼念活动及作品出版等，我都未能参与。）关于海子的作品，迄今我知道只出过两本。一本是沈阳出的《土地》，另一本是南京出的《海子骆一禾作品选》。这是两本在出版上困难重重的书。《土地》全赖可敬的一禾与西川的艰辛努力，他们编选，分别写序，筹措出版资金等等。从一禾致责任编辑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不厚的诗集在出版上的困难程度。《海子骆一禾作品选》，则据说是南京两位友人自费出版的结果。

关于海子，我们应该做的还很多：世上应该有一部《海子全集》，应该有一本海子传记……。歌德说：“你想了解一个作家吗？那你就应该到作家的故乡去看看。”在我没有看到

这句话之前，我就曾有过到海子的家乡（我不知是安徽怀宁的什么村）去看看的想法，看看他诞生的那片土地，看看他葬在了哪里，他的为国家贡献了一个诗人的贫穷的母亲，在她的长子离世后，又会陷入怎样的困境？我幻想，期盼，并满怀信心地相信：终有一天，海子会从他的祖国那里，得到像俄罗斯给予它的叶赛宁那样的荣誉。

一九九四年四月至五月

最后的浪漫主义者

——诗人黑大春

语言的有限性

叶赛宁是这样称自己的："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他的结论，只有熟知叶赛宁的诗歌，及工业文明在俄罗斯土地上进程的人，才会懂。在此，我想称我的朋友黑大春，一个当代中国富于传奇色彩的诗人，为"最后的浪漫主义者"。我这样称他，同样有足够的理由和特定的诗歌背景。两种称呼，都具伤感气氛。

早在上个世纪末，被泰戈尔视作"本质上不是新的，而是衰颓的"文学的现代主义蜂起之际，为爱情忧郁一生的叶芝就曾宣称："我们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选择了传统的神圣和美好的主题。"我上面的称呼，即来自我对叶芝这句话的偏爱和对一个鲜明诗人的印象与认识。这里仅是一种单纯移用，它完全是个人的、感性的、粗浅的，不带任何批评成分。

同样，我也想使本文成为一篇介绍一个诗人的散文，而

不是一篇诗学意义上的评论。我赞同里尔克下述观点：一切事物都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理解又可言传的，它们完全在一个语言从未达到过的空间；而比一切更不可言传的是艺术品，“再没有比批评的文字那样同一件艺术品隔膜的了”(《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面对一个艺术家，也是这样。

被诗歌俘获的少年

黑大春是我的同龄人，我们是六十年代最早出生的人。在我的读物匮乏，没有一本书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乡村少年时期，一天，他幸福地得到了姐姐从图书馆为他借来的两本已经发黄的诗集，它们是《拜伦抒情诗集》和《普希金爱情抒情诗选》。(几乎与此同时，他还得到一位知心同窗的珍贵馈赠：一本硬皮的、繁体字版的泰戈尔《飞鸟集》。)捧在手上，十四岁的少年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他这样向我讲述他当时的心情：“像是第一口酒和第一场恋情，不啻人类发现新大陆时的惊喜，带我进入那类似原始初开的混沌而神秘莫解的冥冥状态。是神的感召？或许不过是春天对一个酷爱幻想，禀承天赋，正处于青春骚动期的中学生必然的催萌。”

时间对于大事，向来不会忽视。适时而至的几册诗集，开启了一个少年天才的诗性心灵。在未来众多的可能面前，这个少年，从此命中注定要做一个前路“凶吉难卜”(食指有一句接近真理的诗：“诗人的命运凶吉难卜”)的诗人。

走入诗人大家庭

当第二个节日临近的时候，这个少年已是一个青春洋溢、广读诗文、豪迈挺拔的青年。一九七九年，共和国文化的春天。这一年，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出现了另一件大事。我将这件大事，称作他的第二个节日。促成这个节日到来的是周郿英，一个不幸已英年早逝、兄长般对他具有引路意义的人。这是一个与诗人一平著文纪念的赵一凡相似的人。他们不是诗人，但我觉得他们是比诗人更为宽阔的人，我愿在此称他们为“诗人的摇蓝”。在周郿英的悉心安排下，他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后来导致了一场诗歌革命的北京诗人群中的两位主要英雄：北岛和芒克。

怀着叶赛宁初见勃洛克一样的心情，他向两位诗人朗读了自己的作品。就像“今天的俄国最杰出的诗人”（布罗茨基语）埃夫吉尼·莱因，当时指导青年布罗茨基“要写好诗，必须把形容词压缩到最低限度”，他清楚地记得，北岛指出他的诗里有太多的三十年代的诗歌语言，告诉他要注意使词从繁复中解放出来，“星星就是星星，不是繁星”。他格外珍视这一瞬间，他将这次相识，视为“千载难逢”。他说：“他们的诗与生活方式在当时对我的启蒙和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自这次会面，他已经成为一个诗人大家庭中的一员。诗歌的天空和空气，师长的经验与胸襟，而他从中感受更深的还是一种亲密无间的手足之情。在这个诗歌大家庭里，恰如《太阳石》的作者帕斯所讲：“诗把一切诗人变成了兄弟。”

至爱的勃洛克

帕斯捷尔纳克认为，在所有的诗人里，给他这个诗人打上“最深烙印”的，是亚历山大·勃洛克。他的说法，同样适用于我的这篇散文中的主人公。

一九八〇年，第一次远游归来的年轻诗人，带回了“自己的声音”：《绿岛》和《青铜骑士》。他将这两首诗，视为自己的处女作。就在这一年，在爱伦堡的多卷本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他遇见了他的至爱的勃洛克。今天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回忆录的这样一个细节：当爱伦堡去看茨维塔耶娃时，她的七岁的女儿，向进来的爱伦堡背诵了一段勃洛克的诗：“多么苍白的衣裳，/多么奇异的宁静；/怀中抱着百合花，/而你却在漫无目的瞧着。”这使爱伦堡大吃一惊。也让我们的二十岁诗人，对勃洛克的诗歌，一见钟情。

当时，年轻的诗人们都很喜欢勃洛克的诗。北岛随口咏出的一句“生活我欢迎你，/我将以响铮铮的盾牌向你致敬”，使他再次受到震撼；一本手抄的《十二个》，在诗人们手上辗转流传。从此他开始寻找、阅读涉及勃洛克的一切文章和书籍：《俄国象征派与亚历山大·勃洛克》，《苏联诗坛逸话》，《苏联作家自述》，《金蔷薇》，《面向秋野》，及一些外国诗歌选本和外国文学期刊等。一九八六年，他终于得到一本朋友赠予的勃洛克诗集，即《美女诗草》，勃洛克二十四岁时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这是一个难得的，非选集性的，而是完整的原始诗集的译本。

对他来说，勃洛克不是阶段性的、时期性的；而是始终的、永恒的。而且随着他的成熟和深入，勃洛克愈来愈意味着他的完美和惟一。在他所喜爱的域外诗人中，首先是他所称的“伟大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三大诗人：被誉为太阳之子的象征主义先驱巴尔蒙特（“揭示了现代诗歌中非凡的音响和充满魔力的音乐的奥秘”）；以朴素和意象见长的田园歌手叶赛宁（“常常催人泪下地带我重返家园”）；及我们正在谈论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之交的集大成者”，亚历山大·勃洛克。

他认为，勃洛克天才地将浪漫主义延伸为一种抽象的神秘主义，使现代诗歌上升至一种神性，给俄罗斯和全世界建立了一个比宗教更令人神往的，蓝色的和深紫色的彼岸世界（但他从未忽视处在象征主义迷雾中的现实主题）。

> 我们中间许多人，那些年轻的，自由的，英俊的，
> 都在由于没有爱而死去。
> 啊，在你辽阔的大地上，给我们荫蔽吧！
> 没有你，我们将怎样生活和哭泣。
>
> （勃洛克《秋天的意愿》）

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勃洛克的诗，《秋天的意愿》最后一节。没有哪个诗人的诗，能够比勃洛克的，更令他迷醉、动情、血液激涌。（由于黑大春，及我的这篇散文，我仿佛刚刚认识了勃洛克，并开始无限地爱上了他的诗歌：“你若把偶然的因素去掉，/就会发现：世界是美好的。”）

诗人总体精神的楷模

在他喜爱的，影响了他的精神与诗歌面貌的诗人中，还应该提到祖国的两位古典诗人，他们是他的另一种审美、极致和精神。

用他的话说："首先是李白——一饮便醉的老酒，青春原初型的歌手，颓废的先驱。"最后是对他具有终极意义的，他给予倍加礼赞的王维：诗人总体精神的楷模；从青春激情过渡到皈依宗教的最完美的例证；没有谁能如此善始善终，语言能如此出神入化，从自我能如此自然地抵达大我和无（但不空）；也没有谁能如此回归少数人类所具有的神性意识，诗歌那永不能阐释的梦幻和音乐。

家园圆明园

他出生在北京西苑，不久全家即迁至中关村。由于中关村与圆明园毗邻，这座"京城惟一富有荒野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背景的非公园化场所"，便成了他从小就经常光顾和漫游的地方。就像勃洛克的涅瓦河，叶赛宁的奥卡河和梁赞；黑大春的圆明园，对他来讲，无论怎么说它重要也不会过分：在繁奥的现代诗歌背景下，它给了我们一个可贵的具有浓郁"家园"色彩的诗人。它不仅是他的童年，四季，土地荒野的意义；也是他的梦寐，彼岸，渴望重归的家园。

一九八四年秋天，他再次来到圆明园。这次他没有离去，

他在福海荒凉的三仙岛上，看中了一所被遗弃已久的空房。房子的主人不知是谁，岛上的咸水，也许是主人弃屋而去的原因。他将房子草草收拾了一下：窗子糊上报纸，墙上挂上马德升的“石头系列”油画。住在这里，没有人干涉，也没有人来过问。周围的农民只说，这里住了一个黑衣疯子。他用蜡烛照明，到附近的一个气象站借火煮面。在这座荒岛空屋里，他写诗、饮酒、沉思、体验，怀恋那些已经和正在逝去的东西。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月，完成了他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圆明园酒鬼》，及其他一些以废墟、田园为主题的诗作。

在岛上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两样富于神秘色彩的东西。一是刚上岛时他遇见的一只黄鼠狼（他称它为“拖着金袍的最后一个皇帝”）。他与这个具有“灵”、“仙”、“民间”意味的岛的主人，打过照面：扫帚般的大尾巴，三角形的小花脸。遗憾的是，随后造访的其他诗人和画家，吓跑了它。另一是岛上遍地盛开的，洋溢着东方气息的野菊。他的“菊”的感觉，即来自这里。这个长久萦怀的感觉，曾多次在他的诗中显现：如“仿佛是最后一次聆听漫山遍野的金菊的号声了/丝绸般静止的午后，米酿的乡愁”（《秋日咏叹》），及这首十年后写下的出神入化的、令我爱不释手的《菊》：

正午，当遍撒金子的声音响起
我君临北中国草木凋败的山地
没有谁能向太阳投放光芒
没有谁能让鬣毛狮子回过头去

野菊，拦劫我！灿烂的女性
无论毁灭或再生于煜煜的星系
惟有你的铜号能唤醒蓝色
惟有你的斗笠能无限接近天际

如同美国诗人费林杰梯在二十世纪看到的瓦尔登湖：“我看见瓦尔登湖被排干了水/为了修建一座游乐园”。今天，因他而与当代诗歌相连的圆明园，出于商业目的，也已令他伤感和无可奈何地发生了巨变。

现代吟游诗人

在历史上，吟游诗人属于比文字更古老、更悠久的一类事物。他们伴随人类口语的发展，而在黎明出现。他们是吟咏英雄的歌手，史事的保管者，传统的传递人。他们是史前的历史，是文字之前的书本，是一个部族精神的核心。吟游诗人是人类的、凭借“声音”的、最初的诗人。

诗歌从其本义和原初来说，是一种听觉艺术。文字的诞生和演进，使诗人背叛了诗歌的本原（文字起初与诗歌无关，最早的文字是作记帐和记事用的）。诗歌出现了由听觉艺术向视觉艺术的转折：从这一天起，便意味着它开始远离人民。这种情况，到了现代主义诗歌尤甚。

我曾问黑大春，对吟游诗人或行吟诗人（诗与人民的媒介）的看法。他说：“它的精神和血液，诗人应部分地接受它，并全部地向它致敬。”他认为，现在流行歌曲到人民中去了，

这是它的精神的表层；而它的实质——诗，却还在诗人手里。他倡导的“把诗歌从印刷品的棺材里解放出来”的全部美学原则，即是使诗回到原初：恢复诗歌原始的声音性和吟唱性。为此，他做了不懈的实践和努力。

以他为灵魂的“圆明园诗社”（存在时间：1984 年—1986 年），提出过“到民众中去”的口号，祈望诗歌与人民相互接近。他们曾同其他诗人一起，成功地将诗歌带到了礼堂和广场。

今天，世事沧海桑田的变迁，熄灭了诗人们到“人民”中去的精神。但这一恢复诗歌原始声音性和吟唱性的努力，在他的最新作品里，依然继续：

黄牛像口铜钟，嗡嗡震荡空气
偶尔发出岁月深井般沉闷的吼叫
我也淌下星星的口涎，把往事反刍
青春像堆畜栏前废弃的酒糟

这时，从盛夏，从时光隐遁的暗夜
从幽幽闪着绿光的灌木丛后面
浏亮地传来布谷鸟
近乎幻听的口哨

家园的歌者，手持七孔清泉的笛箫
你所咳血啼唤的仅是感伤的情调？
让我深入梦境，更显明地聆听

你！爱情的夜莺　你！诗歌的伯劳

（《鹃》）

艾略特曾预言，当代诗歌正处在一个寻找合适的现代口语的时代，但是到了诗的用语可以稳定下来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讲究音乐性的时代。如果这个预言应验，届时，黑大春将由于他的“最后”，而成为先驱。

西方诗歌史上，浪漫主义诗人曾崇尚诗歌的原始音乐性和韵律感。在当代中国，黑大春是身体力行倡导和实践诗歌的音乐性与吟唱性，最鲜明、最典型的一位诗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非正式地称他为“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如在二十世纪“智性”诗歌的背景下，他的诗作浓郁的抒情性和生命感，及个人生活的传奇色彩等。）这是一个并不确切的称呼，从他的诗歌全部美学特征来看，正如他自己判断的，它们体现的是一种“广义的浪漫主义中的象征主义”。

中了魔法的漂泊者

巴别尔称勃洛克，是一个“中了魔法的漂泊者”。如果我早一点看到巴别尔这个说法，也许我会用它作为这篇散文的篇名。的确，在中国当代诗人中，我觉得黑大春与这个称呼最接近。

在关于他的全部传说中，酒和女人是中心。外省的青年诗人说他腰间常年挂着一只酒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并

由两个女人养着。显然这是一种易于出现在诗人身上的渲染和夸张。对他的早期诗人生涯（这是由漂泊无定，频繁的圆明园诗歌聚会，成夜成夜地饮酒、浪诗、争论等等构成的。“浪诗”，是他对朗诵诗歌的一种简约的、鲜活的说法。）中，有关酒和爱情的一些事情，他确有感触，甚至悔悟：“酒和女人都不是浪漫和传奇的，一不小心就会给你带来灾祸。”酒精给他造成的伤害，使他刻骨铭心，他希望今后能够与酒建立一种新型关系。

他一直没有一个使他在社会定位的职业，没有一份能够为他带来固定收入的工作。在众人的眼里，他似乎是一个不明来路的人。这一切，全部缘于他的诗人的血液和天性。他说，诗使人无法安居乐业或安守本分，一个诗人很难长时间干一件与诗不相干的工作。而生活在他那里，仿佛永远是明天的事情。这必然常常使他要以非人的力量，承担由此而来的后果：“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难以忘怀的。”

我曾问他，他的“漂泊”是阶段的，还是始终的。他说，在心灵和精神的意义上，应是始终的。（如他诗中所言：“流浪已命中注定”。）他把这当作诗人诗歌品质的试金石。

诗歌啼血的杜鹃

“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多么好的话啊，谢谢叶赛宁。而一生，我们只能做好一件事情。黑大春是一个奋不顾身以全部生命，努力做好诗歌这件事情的人。做一个诗人，他清楚地知道意味着什么。他只用一句，便写明了诗人的生平：

“一块黄金把我绊倒在贫穷之中”。还有里尔克：“我歌唱的一切全变得富足，/惟有我自己遭到它们遗弃。”困厄，几乎成了诗人必然的命运。世界不声不响收下了他们的黄金，对他们的死活却从不过问。在此，我向所有因诗歌而落难的诗人致敬，并默默地祝福他们。

他写诗极慢。诗歌十五年，是他“苦吟”的十五年。在有人一年能出几本书的文坛，他的十五年，总计不过数十首作品。“诗歌是永远修订不完的。”他在谈到他对诗的修改时，引用了一句域外诗人的话。他的一首诗，通常要改七、八遍。往往最后的定稿，与初稿已完全两样。写得最苦的时候，他大量饮酒，寝食不安，甚至产生绝望感。他说：“如果这时有人问我最不喜欢什么，我会告诉他：最不喜欢写诗。”

诗人写诗的痛苦，读者阅读的幸福。他的诗歌，不仅为我们呈现了山溪般动听的音响；同时，更显著的，他对“隐喻”的个人偏爱和奇异运用，也将我们应存的想象，从死气沉沉的常规中美妙地唤醒：

> 把一颗又一颗星星的米粒啄净
> 喔！这红冠的伸长了脖子的黎明
>
> （《乡村即景》）

> 是谁？让薄嘴唇的斧子在炊烟中停止了歌唱
> 喔！霞光闪闪的土灶里正煮着大红枣似的夕阳
>
> （《夏天好像是一天》）

瞧，你的头发就像长在那儿的一束野蔷薇。

你微微张开的嘴唇就在那儿的花朵里把我陶醉。

（《给（一）》）

俄国的一位批评家有这样一个看法：近现代的俄罗斯文学，出现过一次都会文学取代以往田园文学的转折；这一转折过程中的巨星，就是亚历山大·勃洛克。还说，似乎勃洛克不能在某种田园气氛中思索，而只能在巴黎的游乐场或彼得堡的列斯特兰这类地方获得灵感。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值得商榷），那么我觉得黑大春与他至爱的勃洛克恰好相反：在他的诗里，没有任何与生命和自然隔绝的东西；他的诗歌，充满了田园或他喜欢称的家园的音响和芳香。（与讴歌家园必然相连的，是他对亲人、友谊和祖国的深情。）在因人类崇尚发展而导致的一切都背离本原的今天，在这样的诗歌里，我们的心灵倍受慰藉。

一次电话交谈时，诗人田晓青认为，大春是一个原初意义上的诗人。我赞同他的这个观点，换句话说，在当代，黑大春或许更鲜明地体现了诗人的本义。我相信，他会得到人们渐进性的认识；中国的诗歌，将会愈来愈意识到他的独特、宝贵和难得。

作为一个诗人，黑大春同样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像艾略特评论威廉·布莱克所讲的：布莱克禀承了一种相当了解人性的能力，对文字和文字的音乐有一种非凡的创新意识，而且有一种臆造幻象的天赋才能。但他的天才所需求的，所可悲地缺乏的，是一个公认的也是传统的观念所构成的底

子。神话学、神学与哲学的底子所导致的集聚，便是但丁为什么是一个古典文豪，而布莱克却仅仅是一个天才诗人的原因之一。

对于诗人的哲学要求，现在我还说不好是一个必要，还是一个分外。我知道，我的头脑需要但丁、歌德，但我的心灵更需要布莱克和叶赛宁。

一九九四年十月

一个人的道路

——我的自述

我于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出生在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据祖父讲，我们祖先是最早来这里定居的人家之一。

这座村庄，位于我所称的华北大平原开始的地方。它的西部和北部是波浪起伏的环形远山，即壮美的燕山山脉外缘。每天日落时分，我都幻想跑到山顶上，看看太阳最后降在了什么地方。我曾认定，太阳落山后，是从山外回到东方去的。而我那时的山外，就是外国。

这个大平原的开端，给了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与所有乡村的孩子一样，它们是由贫匮、欢乐、幻想、游戏、故事、冒险、恐惧、憧憬、农事等等构成的。我时常缅想它们，但我还从未将它们写进我的散文。当我看到华滋华斯“童年是男性人的父亲”的说法时，我对他的这句话感触很深。

那时村子东西都有河，我就是在河里扑腾，一只手拄底学会游泳的。村里的井也很多，一到夏天，有时只用一根扁担就能把水打上来。每年，麻雀都选择井壁的缝隙，做窝生

育。雏雀成长中，总有失足掉入井里的。此时如果挑着水桶的大人出现，这个不幸的小生灵便还有获救的可能。

我从小就非常心软，甚至有些极端。我不能看屠宰牲畜，或杀一只鸡。我的这种心地，与血缘有关。至今我仍认为，我的四姑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最善良的人。这个根本，使我后来对非暴力主义一见倾心。我的散文《四姑》和《上帝之子》，实际从血缘与信念两个方面，间接讲了我自己。

我的乡村童年和少年时代，读物是匮乏的，我现在已全然想不起那时读过什么书了。关于文化，最早给我留下印象的是电影《马兰花》和《人参娃娃》。在故事方面，先是叔祖母的民间故事，后是四姑的古典小说。在文学上，四姑是我的启蒙者。而我的祖父，一个秉性鲜明、极重尊严、与所有家庭成员都保持距离的人，给了我另一种精神：从我懂事起，直到一年前，年过八十的老人突然瘫痪，他从未间断每晚睡前的日记。

我对使用文字，很早就有兴趣。中学时，我曾尝试写过小说，一个乡村少年的故事：顽皮，但好心；为了老师午休，试图赶走树上所有的蝉……。我这篇惟一的小说，并未写完。我还模仿写了一些动物寓言，它们其实说明了我那时即开始的"文以载道"倾向。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使我稍后得以走进大学的校门。我还记得，我的数学高考成绩是三十五分。带着喜悦、骄傲和未知，我从乡村中学来到了都市的大学校园。这是一个新的天地，它对我的最大意义，不是课堂，而是视野、志同道合的友谊和图书馆的书籍。"朦胧诗"——一种新

鲜的、具有本义色彩的诗歌——在校园的传播，使我的文学热情有了定位。我开始读诗，抄诗，尝试写诗，崇敬诗人，与诗人交往。长久以来，在我的意识里，诗人与诗歌不分。即使是今天，如果我为诗人或作家做了什么，我仍认为，我不是或不单是帮助了他们，而是帮助了文学本身。

我的诗歌时期，对我的散文写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除了一种根本的诗人特有的纯粹精神，恰如布罗茨基所讲，散文作家可以向诗歌学到：借助词语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产生的特定含义和力量；集中的思路；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赘语。的确，“如果散文作家缺少诗歌创作的经验，他的作品难免累赘冗长和华而不实的弊端”。对我来说，我努力去做的，即是将散文作为诗歌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来写作。

我的第一篇散文《去看白桦林》，写于一九八八年初。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此时我已经有了一个令我满意的工作：与社会可以保持必要的距离，夜晚授课、而将上午——每日官能最清澈的时刻——献给阅读和写作。我的每年暑假的自费旅行，也已进行。到一九九〇年，我已走了黄河以北几乎全部省区。

我喜爱的、对我影响较大的、确立了我的信仰、塑造了我写作面貌的作家和诗人，主要有：梭罗、列夫·托尔斯泰、泰戈尔、惠特曼、爱默生、纪伯伦、安徒生、雅姆、布莱克、黑塞、普里什文、谢尔古年科夫等。这里我想惭愧地说，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一直未能进入我的视野。一个推崇李敖、

夸耀曾拧下过一只麻雀脑袋的朋友，曾多次向我推荐《厚黑学》，但我从未读过一页。而伟大的《红楼梦》，今天对我依然陌生。不是缺少时间，而是缺少动力和心情。在中国文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切：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惟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海子曾说：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

我的笔名“苇岸”，最初来自北岛的诗《岸》，也有另外的因素。我不仅因“我是岸/我是渔港/我伸展着手臂/等待穷孩子的小船/载回一盏盏灯光”这样的诗句，感到血液激涌；更有一种强烈的与委琐、苟且、污泥的快乐、瓦全的幸福对立的本能。我这样讲，并非意味我在我的生命衍进中，从未做过使自己愧怍的事情。对于它们，如毛姆在《七十述怀》里写的那样，我希望我说：这不是我做的，而是过去的另一个我做的。

“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虽然我是一个作家，但我更喜欢梵·高这句话。我希望我是一个眼里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每天，无论我遇见了谁，我都把他看作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我曾经想，在我之前，这个世界生活过无数的人，在我之后，这个世界还将有无数的人生活；那么在人类的绵延中，我为什么就与我同时代的这些人们相遇，并生活在一起了呢？我不用偶然来看这个问题，我把它视为一种亲缘。

当然我知道，事情远非这么理想和浪漫。但我愿意像古罗马的那位皇帝马可·奥勒留那样，每天早晨对自己说：今

天我要见到一个我主动问候他，他却视我别有企图的人；一个除了自己的利益圈子，对一切都冷漠无情的人；一个把比他人生活得优渥，看作人生最大幸福的人；一个将“无度不丈夫”，当作“无毒不丈夫”奉行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无知。

再过两个月，就是我三十五岁的生日了。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人类的增光者”。我希望在我晚年的时候，我能够借用夸齐莫多的诗歌说：“爱，以神奇的力量，/使我出类拔萃。”

一九九四年十月

第三辑

作 家 生 涯

文学是人类精神的培养基地。

——爱默生

文学，世界上最好的事业。

——列夫·托尔斯泰

语言的堕落导致人类的堕落

约瑟夫·布罗茨基，诗人，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历次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一九七二年他被政权逐出了祖国。他的国家这一做法，使他讲出了一句话："我得到了世上所有可能的万物中最好的两个：美国护照和俄罗斯文化。"失去了祖国国籍的，被驱逐前曾遭关押和流放的诗人，致信勃列日涅夫："跟国家相比，语言是一种更加源远流长的东西。我属于俄语，属于俄罗斯文化，我是它的一部分。"

爱默生有一个著名论点："人类的堕落导致语言的堕落。"而布罗茨基认为，今天应该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语言的

堕落导致人类的堕落。布罗茨基的用意，在于指责当代作家的毫无休止的退化。

超越古今

许多作家，不读当代作品。这有一个作家们自己明白的道理。比如，卡夫卡曾对一个抱着一摞新书来找他的朋友说："你干吗用这些蜉蝣动物来跟自己过不去。这些时髦书籍大多数不过是'今天'的不稳定情绪的反映而已，很快就会泯灭的。你应该多读旧书，古典作家的，歌德的。"青年黑塞曾醉心于最新的文学书籍的海洋中，但后来他发觉，一个人的思想只停留在当代，停留在新的书籍之中，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是无益的，只有和过去的事、历史、古老的以及原始的事维持经常联系才可能存在真正的精神生活。

《城市与狗》的作者略萨也宣称："我是十九世纪小说的一位热心读者。"但同是这个略萨，却对二十世纪的博尔赫斯，表示了最高的敬意："如果我只能选择一名作家，那就是博尔赫斯。因为我觉得博尔赫斯的世界，是一个极富独创性的世界。他的作品充满摄人心魄的智慧。特别是他的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是与我们的语言传统分道扬镳的。西班牙语是一种繁富的，修辞手法众多的语言。我们伟大的散文作家，从塞万提斯起，都是江海恣肆型的写手。而博尔赫斯却完全相反，他以精炼、朴素、准确独树一帜。"

作家写日记

作家写日记，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许多作家身后的全集中，日记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比如纪德，自二十岁起即写日记，他在逝世的前一年出版的《日记》（1889—1948），纵贯了半个世纪，成为一部本世纪上半叶关于法国和西方文学、艺术及纪德本人的宝贵文献。托尔斯泰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写日记。他认为这有助于进步，有助于发展思维，就像做体操可以使我们肌肉发达一样。他常随身带着一个小本，随时记些什么，再把记下的东西加以发展和修改，写进日记。当然，也有作家反对写日记，加西亚·马尔克斯即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写日记会妨害作家对作品的全神贯注。但他却一反作家暮年才写回忆录的做法，很早就开始了不停地把自己的回忆变成文字的生涯。他预言，他的回忆录将会有六卷。

为了大地的安全

一位叫内多毅的日本学者，写了一部名为《人类与文学》的著作。其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进入二十世纪后，受到严重污染和掠夺的自然，对于人类已不再是"美"的对象，而是"恐怖"的象征。古代的人类，曾把与己敌对的自然拟人化，创造了神话。今天，由于自然的蜕变，则有了创造新神话的可能。

自然承受人类欲望的极限，使人类原有的一切，正在降为第二位。

一九八七年八月，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等一批前苏联作家与来访的日本作家，曾在贝加尔湖畔的森林之城伊尔库茨克庄严宣布，发起为保卫世界湖泊免于污染的“贝加尔湖运动”。拉斯普京大声疾呼：“我们这个时代可称之为人类生存的危机点。自古以来，水、空气和土地是地球上生命的源泉，如今成了疾病的源泉和早死的原因。”

在德国，诗人们也有“自然诗歌”运动。《在直线的狂风暴雨中——自然诗歌集》、《现代德语自然诗集》、《大地要求自由与安全》等诗集接连出版。其中一首题为《现状》的短诗，被印在圣诞卡上，广为流传：“谁要是愿意/世界/保持/现状，/他就是不愿意/她继续生存下去。”

非暴力主义的可能

列夫·托尔斯泰是非暴力主义的毕生倡导者，他将非暴力主义喻为“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的全部学问的拱顶”。他认为作恶的人比遭恶的人在自己的心灵中更感到不幸，故不是仇恨，而应该怜悯他们。他认为通过暴力不可能建立一种符合道德的制度，因为任何一种暴力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另一种暴力。

托尔斯泰曾致信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谆谆恳求他赦免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凶手，希望新沙皇做一个“不以恶抗暴”的非暴力主义楷模：“宽恕吧！以德报怨吧！这样，在数百恶人

中将会有几十人离开魔鬼投向上帝。”为此，“我这个不肖的臣民宁愿做您的犬马，您的奴隶。”

一次，一个来访的名叫布赖恩的美国人问（这是一个人们经常用来反对托尔斯泰的例子）：“如果一个恶棍在您面前虐待婴儿，该怎么办？”托尔斯泰答：“我在世上活了七十五年，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恶棍。但是我亲眼看到成百万人，妇女、儿童，由于政府的暴行而走向毁灭和死亡。”

诗意人生

诗人是人类语言的实验者（当然不止）。这个世界出现过的具有实验意义的诗意人生，大多源于诗人。与瓦尔登湖密不可分的十九世纪的梭罗，本质是一个诗人。这里我想例举二十世纪的两个诗人，还是出自美国（一个最能代表现代文明的国家）。

罗宾森·杰弗斯，有“铁器时代无物存留”，“有一个陷阱专门抓捕崇高的灵魂，据说当上帝走上地球，就已经被抓住。”诗句的诗人。他认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寻求舒适感，而是为了追求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人不应做物质生活的奴隶，不应做待死的恐龙。人不是大梦初醒的童婴。一九一六年，他携妻迁居加利福尼亚滨海小市卡梅尔。这里的峻山峭崖和汹涌海浪，显示了超越时间的原始风光，使他联想到荷马时代伊萨卡的绮丽景色，奥德赛的石岸故乡。他在崖上用双手建造了一座面向大海的花岗岩塔式石屋，没有自来水和电，他与妻子在这里自耕自种。

加里·斯奈德，现代文明的抵制者，热爱东方，视中国古代诗人寒山为师的诗人。有过伐木工，海员，沙漠独居五个月，皈依佛教三载，旅居日本十年的经历。回国后，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北部荒僻的山间，他住在自己一手建筑的房子里，拒绝用任何污染戕害自然的工业品。他的散文集《大地家族》中有这样的话："最受无情剥削的阶级是：动物，树木，花草，水，空气。"

世界为什么需要作家

米格尔·托尔加，继卡蒙斯之后，我知道的第二个葡萄牙作家。托尔加的作品有诗、短篇和长篇小说，但最著名的还是他始记于三十四岁，已出版了十多卷的《日记》。《日记》内容浩大，大多以诗和散文的文体写成。

托尔加是与我们同世纪的作家。他说从年轻时候开始，"我一直认为艺术和写作是一种本体的、神圣的行为"。他认为，作家无疑要有使命感，而不应一味迎合读者，更不应看传播媒介的眼色。写一首诗歌，一篇小说，首先应考虑它是否会对读者产生影响。如果文学不能使大众产生良好变化，那这个世界就不需要作家。

托尔加是隐在文字后面的作家。他深居简出，谢绝各类邀请，十年中只会见过两次记者。他说："作家是通过作品说话的。"

蔑视诗歌的人被诗歌颂

忠于自己的哲学，认为“诗不表现真理”，只会滋长人类的低劣情欲，决意“必须把诗驱逐出理想国”的柏拉图死后，他的来自马其顿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为他写了一首悼亡诗：

在众人之中他是惟一也是最初，
在生活中与作品里，
他都清楚而又明白指出，
惟有善良才是幸福，
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处寻觅。

这首诗，胜过全部评价柏拉图的著作。

农村永恒

阿勃拉莫夫，前苏联作家，农村的赞美者和护卫者。他的作品，都写农村。他为自己属于“农村派作家”而感到骄傲。在这个行列中，还有别洛夫、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索洛乌欣等他喜爱和尊敬的作家。对于农村的未来，他反对美国式的农村城市化做法，而主张保留农村（适当引进城市文明的物质生活水准）。农村应该永存，“因为人性的主要贮存器之一，就是土地，动物和人同它们的交往”。

在《悲惨世界》中，雨果也曾告诉他的读者：“城市会使

人变得凶残，因为它使人腐化堕落。山、海和森林，使人变得粗野，它们只发展这种野性，却不毁灭人性。”

文学是词语

一九八九年，瑞典文学院出乎我们意料地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西班牙作家塞拉（这引起了世界作家广泛的异议）。至今我还没有读过塞拉的一部作品，但我看到过他的一句关于文学的话：“语言是作家的表达工具。（因此）文学是词语，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塞拉被认为是西班牙战后第一个具有实验色彩的先锋小说作家，他创造了一种叫做“恐怖主义”的小说风格。（所以这样讲，是由于他的小说创作应以暴力和恐怖事件为题材的主张。）批评家介绍说，他的小说，不重情节或人物塑造，而以细节描写，语言创新为特色。塞拉推崇的拉丁美洲作家是：帕斯、略萨和胡安·鲁尔福。与略萨相反，塞拉认为博尔赫斯只是个“为拉丁美洲西语国家的小布尔乔亚服务的作家”，是不能与上述三位作家相提并论的。

比喻的魔力

文字的魅力或魔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比喻。一个前所未见的、出其不意的、奇迹般的比喻，会令我们长时间激动不已。在一个比喻的力量下，我们往往便记住了一首诗、一本书或一个作家。数年前，我曾读过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

亚斯的小说《总统先生》，但今天无论是小说的情节，还是它的人物，我都已忘得一干二净。惟一让我记住这部小说的，是阿斯图里亚斯的一个比喻：无数条河流注入大海，像一只猫把胡须伸进牛奶碗。而一提到英国诗人奥登，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把空空的头脑，比喻成八月的学校。我还记得他那句原诗："那些头脑空旷得像八月的学校"。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说："比喻是天才的标志。"当代希腊的诗人埃利蒂斯在受奖演说时也说："一切艺术都凭借类比发言。"

世上最善良的人

爱伦堡的六卷本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新时期"之初，曾被我们年轻的诗人、作家广泛阅读。长期旅居国外的爱伦堡，在这部回忆录中讲述了许多他结识的西方诗人、作家及其他艺术家的事情。

爱伦堡说，他平生遇见过的最谦逊的诗人是马查多（西班牙诗人），而画家则是马尔克（德国画家）。这里先说说马尔克。爱伦堡说，马尔克一生从未打算在画布上表现自己的忿怒和不平。他喜欢画水，而他的性格，照俄罗斯古老的说法，比水还温和。他与人交谈首先要说："你要原谅我，我只会用画笔说话。"马蒂斯说他："他的心是古代抒情诗中的少女的心灵，不仅不伤害任何人，而且还会为某人没有狠狠得罪自己便走开而感到伤心难过。"

马尔克的性情让我想到另一本书中讲述的另一位作家。

这位作家就是大名鼎鼎的《追忆逝水年华》著者，体弱多病的普鲁斯特；这本书是莫洛亚的《从普鲁斯特到萨特》。“害怕使别人难过始终是他主要的一种本能。”莫洛亚用这句话概括了普鲁斯特善良的一生。

托尔斯泰与萧伯纳

萧伯纳（沿用旧译），莎士比亚以来，英国最重要的剧作家。在列夫·托尔斯泰逝世前一年，他曾将自己的剧本《人与超人》转送给这位老人，并导致了他们之间几次不愉快的通信。

托尔斯泰读了剧本后，礼貌地给萧写了一封长信。认为在对待文明和进步的态度上（即不论文明和进步将继续多久，它们不能改善人类的状况，除非人们自身改变。），他们的观点相同，并为此感到特别高兴。但在人类的状况如何得以改善的问题上，两者的观点存在差异。萧认为当普通人成为超人，或当新的超人产生时，人类的改进即可完成。托尔斯泰则认为，当所有的人因对建立在全部宗教（真正的宗教）基础上的人生理解而团结一致，认识到他们与世界的永恒起源的合理关系，并从中接受对生命的指导，这时人类的改进才能发生。在信的后面，托尔斯泰坦率地指出了萧剧本中的缺点：第一是不够严肃，“对于像人生的目的，它堕落的原因和今天人类生活中充满着罪恶这样一个主题，是不应该开玩笑的”；第二应受责备之处是，把所论述的具有如此巨大重要性的问题，作为讽刺的主题，很可能妨碍而不会有助于这些重大问

题的解决。另外，托尔斯泰对萧在剧中有意用自己的博学、才华和机敏，独出心裁，以使读者感到意外和惊讶的倾向，也不赞同。因为这会“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揭露的出色，而分散了他们对问题实质的注意”。

显然，五十三岁的萧对八十一岁的老人的善意批评，不够谦逊。他回信说：“我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人，如果我认为一件艺术作品只有这一点的话，我是不会动一根手指头去创作那样的作品的。”还说他一直很清楚，用普通方法说教，不仅会失败，而且更糟糕。

这使托尔斯泰给萧写了第二封信：“你说正直的说教一般说来对人们没有什么影响，年轻人把与正义相反的东西当作值得称赞的，你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不能因此说这样的说教是不需要的。失败的原因是由于那些说教的人并不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这就是说，伪善。”针对萧信结尾说的“假定这个世界只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为了使它不是一个坏的玩笑而是一个好的玩笑，难道你会工作得更少一些吗”？托尔斯泰再次重复了这样的话：关于上帝和罪恶的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不能拿来开玩笑。最后，托尔斯泰说，他从萧信上结尾的那几句话，得到了一个使他很痛苦的印象。

在逝世前几个月，托尔斯泰同来看望他的客人谈到各处都缺乏好的作家，他说：“现在没有了，”然后又迟疑地接着说，“除非，或许，萧伯纳。”

只有在俄罗斯乡村中才能写得好

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都出身贵族。作为遗产，他们各自继承了一座庄园。一个在图拉省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个在奥廖尔省的斯帕斯克。

从来不走平坦大道，专捡田野小路或收割过的庄稼地走的托尔斯泰，最终没有搬到莫斯科定居。被森林、田野、河流、土地环绕的庄园，是他天然的栖身之地。他把自然看作真善美的最直接体现，“在这个可爱的自然界中，人的内心里能够容纳仇恨、报复和消灭自己同类的那种感情吗？”他相信，跟自然界的接触，是消除人们心头恶念的良好途径。在波利亚纳庄园，有托尔斯泰的一生和他那座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被茨威格称为“世间最美的坟墓”。

屠格涅夫走的是另一条路。他的一生，近乎漂泊不定。但无论是在彼得堡和柏林求学期间，还是日后长期的域外侨居，每年短暂的夏秋两季，他都要回到自己的庄园写作，直至他的晚年。屠格涅夫病逝于巴黎，他在庄园的大门上留下了一句话：“只有在俄罗斯乡村中才能写得好。”

被意识形态牺牲的诗人

帕斯捷尔纳克在谈到叶赛宁时说：“他平时总是满脸微笑，是个鬈毛王子，可是当他朗诵的时候，人们就会明白——这个家伙会杀人的。”其实这是一句夸饰的说法，叶赛宁平生

是呼吁仁慈的，认为这是人比其他任何事物都应有的。把马雅可夫斯基看成“大力士和幻想家的混合物”的爱伦堡说，马雅可夫斯基尽管写“我喜欢看孩子们怎样死亡”，但他连一匹马挨打都不忍心看。马雅可夫斯基，一个传闻口袋里总装着肥皂盒的诗人，如果他不得已和一个使他讨厌的人握了手，他就立刻走开，去把手洗净。

在《人·生活·岁月》里，爱伦堡告诉我们，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是两个一见面就对骂的诗人。叶赛宁说：“他是个为了什么而写诗的诗人，我是个由于什么而写诗的诗人。”针对马雅可夫斯基大量的宣传诗，叶赛宁说他是个乏味的诗人。（叶赛宁写一首诗是很慢的，一改再改，有时干脆就撕掉了。）在叶赛宁的祖国，人们这样说：“如果没有叶赛宁，俄罗斯人会不理解自己的心灵。”

马雅可夫斯基或许是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但叶赛宁一九二四年回故乡时，看到连村里的老百姓都能引用几句苏维埃的口号，而他自己对马克思的著作却连五页也没有读过，也倍感内疚。

把悔过和自我克制作为国家生活的准则

索尔仁尼琴，我称他为最有骨头的作家之一。我曾译过英文版的索尔仁尼琴小传，他的苦难始自一九四五年（这一年他二十七岁）。这一年的二月，他在卫国战争的前线被捕。而罹祸的原因，他在小传中叙述说：“是检查机关发现了我与一个同学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间的通信，主要由于

信中涉及一些对斯大林不够恭敬的话，尽管我们谈到他时用语比较隐晦。”此后，八年的劳改营监禁，刑满后三年流放，为作品出版而斗争，一九七四年因《古拉格群岛》再次被捕，翌日即被驱逐出境。

索尔仁尼琴一九七六年由瑞士来到美国，定居佛蒙特。他终日幽居在防备森严的约五十英亩范围的住宅里。他的住宅有图书馆和小教堂，他每天清晨起床，著书不止。基于他的经历，他的作品始终以人在苦役营、医院（流放中他曾患过癌症）和流放地被囚禁的悲惨状况为主题。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即“由于他作品中的道德力量——借着它，他承续了苏联文学之不可或缺的传统。”

与布罗茨基不同，索尔仁尼琴并不把美国护照看成世上最好的两样东西之一。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刚刚定居美国两年的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接受学位演讲时，就曾严厉抨击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索尔仁尼琴反对“贪婪的文明”和“无限的进步”。他认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平比发展经济和健全体制更重要，因为纯洁的社会气氛要靠道德的自我完善来产生，稳定的社会只能在人人自觉地进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建立。因此，他提出应把“悔过和自我克制”作为国家生活的准则。（索尔仁尼琴的观点与列夫·托尔斯泰相近。托尔斯泰认为，人类不容置疑的进步只有一个，这就是精神上的进步，就是每个人的自我完善。人只能使自己一个人得到完善，而不能用国家的改革来使其它人得到完善。“人类如果没有内心精神上的提高，那么徒有外部形式上的自由制度，那也是枉然的。”）

黎明或奠基人

在文学史上，也许可以说，有些作家存在的最高意义，是影响和启示了一个更为卓越、更为伟大、千载难逢的作家。他们是黎明，是序曲，是先行者和奠基人。比如，马洛之于莎士比亚，赫尔德之于歌德。

获得了一九八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迷惘》的作者卡内蒂说："瓦尔泽的同时代人之中，对我来说，瓦尔泽最为重要——除了卡夫卡。但是如果没有瓦尔泽，卡夫卡也许并不存在。"瓦尔泽是谁？卡夫卡被西方列为有史以来的十大作家之一，《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他是"最有影响的现代德语散文大师"（"他的作品象征着二十世纪的忧虑和渗透于西方社会的异化"）。但我遍查这部"素以学术性强、权威性高著称"的百科全书，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都没有找到对瓦尔泽的介绍。在一份小资料里，我看到了有关瓦尔泽生平的几句话：罗伯特·瓦尔泽，一八七八年四月十五日生于瑞士小城比尔，一九二八年进入精神病院，一九五六年在散步中悄然去世。他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助手》、自传体小说《塔纳兄妹》及精美的散文小品和诗。

卡夫卡与瓦尔泽同为德语世界的"外省"人，两人都有精神病患，都终生未婚。卡夫卡比瓦尔泽小五岁，瓦尔泽一直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文坛曾一度认为卡夫卡不过是瓦尔泽的笔名。然而他们在世时，并不相识。

笔比宝剑更有力量

沃莱·索因卡，一个讲出“笔比宝剑更有力量”的话的作家。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测他的国家：专制的传统，一切都在政治之下，随时会爆发的政变或革命。在这样的国家中，索因卡说：“当一个人在暴君面前保持沉默的时候，他就死亡了。”

索因卡集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于一身。他认为，作家不仅仅是描写社会风俗和经验的编年史作者，他还必须起到非洲作家的作用：历史的中间人，过去的解释者，警告者，预言家和未来的设计者。

索因卡的出类拔萃，使他成为非洲第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年龄与创造力

美国心理学家哈维·莱曼，平生致力于确定人类活动各个领域中“能出最好成绩的年龄”的研究，目的是创立一种总的理论来论述年龄与创造力的关系。

在“旨在生产惟一的、不可替代的物品”的文学领域，莱曼是这样做的，他首先列出一个“最好的书”的书单，这个书单包括已故的和在世的四百八十八位作家的七百三十三本书。然后对每一名作家按年龄组将其作品进行分类：寻找每部作品的作者在写作或发表该作品时的年龄。通过编制图

表，他发现，一部在四十岁以后写的作品，其寿命比一部在这个年龄之前写的作品来得短。为此他得出结论："一般地说，四十岁是最好的书质量最高的生产年龄。"

正义第一

列夫·托尔斯泰评价过歌德和莎士比亚。他在读完歌德的四十二卷全集后说："我读了歌德的作品，看到了这个有才华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小人对我们这一代人所产生的全部有害的影响。"对于莎士比亚，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世界观是最低下的，庸俗透顶的；莎士比亚"不仅不是个作家，而且是个极其虚伪和卑鄙的人"。他喜欢卢梭，他说："在我的一生中，给我以巨大而良好的影响的是卢梭和福音书。"他强调说："卢梭是不朽的。"

托尔斯泰对歌德和莎士比亚的态度，与他的信仰有关。他曾拒绝结识一个名叫维列夏金的画家，因为这位画家曾劝斯特鲁可夫将军尽快绞死两个土耳其人，好让他在行刑的时候画素描。

毛姆在《七五述怀》中讲过这么几句话："有些人赋予艺术一种它本身应有的价值，使自己相信，大众的悲苦命运作为产生画家和诗人的光辉作品所需偿付的代价，不算太昂贵。我对这种态度不屑一顾。在我看来，有些哲学家声称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作用，从而得出它的价值不在于美而在于正义行为的结论，这是对的。"如果托尔斯泰与毛姆是同时代的作家，他会赞美这几句话。

写作方式

菲力普·罗思，一个以写作方式使我记住的美国作家（在美国以短篇小说《再见吧，哥伦布》知名）。他与妻子定居在坎贝尔斯维尔乡下。他的工作室是森林中的一座小木屋，每天他在家中用过早餐，便步入森林。在小木屋，他从上午十时左右一直写到晚餐时间，然后从原路步行返回住处。

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也有一个名叫罗·霍尔的诗人（已出版十一卷诗歌，五部长篇小说）。他与妻子居住在远离悉尼数百公里的海滨，周围数里之内只有野生动物，别无人烟。每天他在大海的涛声伴随下，就着摇曳的烛光站着写作（他喜欢站着写），直至深夜。

文学与生理

在西方，有“瘦诗人，胖小说家”的说法。西方的学者研究过文体与写作者生理的关系，被称作文学社会学家的法国学者埃斯卡皮，在他的著作中就公布过有关的研究结论：戏剧损害健康，哲学和历史有保健作用，小说对老人来说是致命伤，诗歌会在各种年龄击垮命中注定的体格（《文学性和社会性》）。当然他也提醒人们不要忽略下列因素：一个人被公认为剧作家比较早，被公认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则比较晚，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年龄成为诗人，而一个人的年纪越老，被公认为小说家的机会就越少。

与大地相同的心灵

写作方式的非凡，会让我记住一个诗人或作家；而让我记住并热爱一个诗人或作家的，是他们的作品中非凡的话。在此请恕我较长地引述两位作家的作品，因为我是这样地喜爱它们：

“我们常常忘掉，太阳照在我们耕作过的田地和照在草原和森林上一样，是不分轩轾的。它们都反射并吸收了它的光线，前者只是它每天眺望的图画中的一小部分。在它看来，大地都给耕作得像花园一样。因此，我们接受它的光与热，同时也接受了它的信任与大度。我看重豆子的种子，到秋天有了收获，又怎么样呢？我望了这么久广阔田地，广阔田地却并不当我是主要的耕种者，它撇开我，去看那些给它洒水，使它发绿的更友好的影响。豆子的成果并不由我来收获。它们不是有一部分为土拨鼠生长的吗？麦穗，不仅是农夫的希望；它的核仁，或者说，谷物，也不是它的生产之全部。那末，我们怎会歉收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败草的丰收而欢喜，因为它们的种子是鸟雀的粮食？大地的生产是否堆满了农夫的仓库，相对来说，这是小事。真正的农夫不必焦形于色，就像那些松鼠，根本是不关心今年的树林会不会生产栗子的，真正的农夫整天劳动，并不要求土地的生产品属于他所占有，在他的心里，他不仅应该贡献第一个果实，还应该献出他的最后一个果实。”（［美］梭罗《瓦尔登湖》）。

“如果我的早晨不太使我喜欢，它在某个方面有缺陷；或

者是露水太冷，或者是太阳来得迟了，或者是由于风大，吹来了过多的乌云，因而使森林里阴沉沉的令人不舒服，但一想到在某个地方有另外的早晨——明媚的，灿烂的，有宜人的露水和准时升起的太阳——我就高兴起来，以至于觉得，我的灰色的、倒霉的早晨一下子变得好了。所以无论是寒冷的露水也好，太阳也好，呼啸的风也好，乌云也好，我现在都不把它们当作是对我的惩罚，而是当作珍贵的礼物来接受。”（［前苏联］谢尔古年科夫《秋与春》）

文字的母亲

作家应该是文字的母亲，她熟悉她所有的儿女，他们每个人的技能和特长，当她坐在案前感到孤单，她只要轻轻呼唤，孩子们便从四方欢叫着跑来，簇拥在她的身边。

散文与诗歌

惠特曼是诗人，但他写他同大自然的接触时便使用散文。他说：“我不知不觉地按这同样的标准对待其他的自然力量——避免追求用诗去写它们；太伟大，不宜按一定的格式去处理。”

诗人布罗茨基写过一篇题为《诗人与散文》的文章。他说从理论上看，一个诗人可以完全不作散文（也仅仅是从理论上看）。那么为什么有许多诗人写作散文呢？他认为大概有这样两个原因：首先，诗人可能在一个晴朗明媚的日子里产

生用散文创作的冲动；其次，有些题材只能用散文处理。另外，“散文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比诗歌更长于连贯地发挥思想，它可以牵着读者的手，把他领进这个境界，诗歌则需要连推带拉才能做到这一点。”关于散文与诗歌的地位，布罗茨基说，平等这一概念不属于艺术固有的本质，作家的思想存在着等级观念，在这一观念中，诗歌的地位高于散文，从原则上说，诗人的地位也优于散文作家。但他认为，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不在于诗歌的历史较之散文更为悠久，却在于诗人能在贫寒的境地坐下来写诗，而处于类似窘迫环境中的散文作家几乎不会产生写诗的念头。因此，“散文作家面对诗人自觉到谦卑感，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说，诗人面对散文作家一定产生优越感。”

布罗茨基认为，一般说来，如果散文作家缺少诗歌创作的经验，这将是致命的，他的作品难免累赘冗长和华而不实的弊端。那么散文作家可以向诗歌学到什么呢？借助词语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产生的特定含义和力量；集中的思路；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赘语；警觉高涨的情绪中潜伏的危险。同样，诗人也可以向散文学到东西，尽管不多：对细节的重视；对土语和书面语的采用；结构技巧。总之，散文与诗歌有着天然的亲缘，正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作者）所言：“散文不过是诗歌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已。”

古希腊的星空

《古希腊文学史》，是我读过的最引人、最富文采的一部

文学史书。作者，英国现代学者吉尔伯特·默雷。它有古代作家的朴素与智慧和现代作家的精确与机智。比如，对于希腊雄辩家，它认为，如果借口“美”的因素，否认希腊雄辩术的永恒价值，那是站不住脚的。它充分肯定这一学派对古代散文发展的贡献，同时也准确指出每个雄辩家的缺陷：“伊索克拉特真正缺乏一种较崇高的灵感。他不懂诗歌，也不爱好音乐。这种罪愆，人类始终不能恕宥，因为它们违反了人生永恒的要素。”它懂得如何使用恰如其分的语汇，最大限度地颂扬一个当之无愧的诗人：“在希腊所有的诗人中，忒俄喀里图斯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人，人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世界上在田园诗里任何优美的章篇，无不出自忒俄喀里图斯之手。”《死者对话集》与《神的对话集》的作者琉善和苏格拉底一样，也是屹立于历史上的人类的道德楷模：“他过于渴求诚实，过于吹毛求疵，过于矜持；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来说，他不能随波逐流。他所代表的那种人生观，无论古今都有永恒的价值。”在文本里，希罗多德的后继者修昔底德的文体是个异常突出的现象。他从来没有把一部历史写到底，他的性格和希腊文化在某一方面的特性，使他放弃了叙事的主要工作，从而把他的创作风格如同纯文学一样加以发展：“他的文体简洁、扼要、生动，是一种了不起的出色的文体。”在全部古代希腊作家中，它对柏拉图给予了最高评价：“就散文风格而论，他是希腊空前的最伟大的散文大师。”“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可以他所想和他的生活目的来衡量，那么柏拉图当之无愧地可列于人类历史的圣贤之中。”一位明显不该忽略的作家，不知何故被此书遗落了，这就是智慧的盲寓言家伊索

（也许由于伊索是传说人物，但它讲了荷马）。

美国的莎士比亚

毕生只写“家乡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的福克纳，被外界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他的被总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作品（几乎包括他一生的全部作品：十九部长篇小说和七十余篇短篇小说），都以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约克纳帕塔法县及其中心杰弗生镇（他的家乡的虚构名称）为背景。一个以一滴水写大海的作家。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美拯救世界”不同，福克纳专写南方的罪恶。他认为世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可怜的罪人，写美德和善，无助于改造他们。必须使人们感到无比愤怒或羞愧难忍，他们才能下决心与罪恶疏远。

晚年的福克纳为了隐居，悄悄买了一座农庄。当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宴请著名艺术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时，遭到了他的回绝：“为了吃饭去白宫实在太远了。我年迈体衰，不能长途跋涉去和陌生人一起吃饭。”

福克纳死后，继起的南美洲作家这样赞美他：如果没有福克纳，当代拉丁美洲文学的叙述手法就不可能产生。

希望的限度

阿贝尔·科恩，法国当代引人瞩目的作家。他的代表作品《天主的美人》，一九八六年被收入“七星丛书”出版，这

意味着法国已将他视为不朽作家。

在这部小说中，科恩倾注了他这样的情感：人生在世，恍如过客，注定都是要死的，人应该珍惜短暂的有生之年，摈弃弱肉强食、同类相残的所谓自然法则，和睦共处，相近相爱（“同类之间的相残究竟能使人得到什么快乐？”）。

在阿贝尔·科恩之前，晚年的马克·吐温已经对人类彻底丧失了信心：“在一切生物中，人是最丑恶的。在世间的一切生物中，只有他最凶残——这是一切本能、情欲和恶习中最下流、最卑鄙的品质。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制造痛苦的生物，他并非出于什么目的，而只是意识到他能够制造它而已。在世界上的一切生物中，只有他才具有卑鄙下流的才智。”

到达事物核心最短的路程

晚星带回了
　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
带回了绵羊，带回了山羊，
　带回了牧童到母亲身边。

这是《古希腊抒情诗选》中萨福（可视为人类第一位女诗人）的一首名为《暮色》的短诗。而赫西奥德的《蝉鸣时节》里，“山羊最肥，酒最美，/妇女最动情，男子最虚弱”的诗句，同样使我无法忘记。

读了这册诗集后，我在当天片段性地写了几句：

“远古传来的清晰而亲切的声音。朴素之源。表饰未生的

原质。到达事物核心最短的路程。舒畅的思想。每个时代都饮用的空气。现代面貌的根据。人类灵魂的保存。”

木头俄罗斯

俄罗斯，神的栖居之地和最后的秘密。我们如何才能懂得它呢？叶赛宁用他的天赋心灵为它定性：木头俄罗斯。而斯宾格勒，是它的忧郁与悲戚最好的旁观者。

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将一种比较古老的外来文化在某个地区是如此强而有力，以致土生土长的年轻文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现象，称作“历史的假晶现象”。

历史上第二次假晶现象，即发生在俄罗斯。始作俑者是为了强迫实行欧化，曾亲自将一些贵族的胡子剪掉的彼得大帝（一世）。俄罗斯假晶现象的一个标志，是一七0三年以彼得大帝名字命名的圣彼得堡的建立。斯宾格勒说：“莫斯科的原始沙皇制度在今天也还是适合于俄罗斯世界的惟一形式，但在彼得堡，它被歪曲成了西欧的朝代形式。”“一个曾是命定在没有历史的状态中生活几个世代的民族，就这样重又被迫生活在一种虚妄的、人为的历史中，而古老的俄罗斯心灵对于这种历史简直就是无法理解。”这一点在十九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先于斯宾格勒感受到了：“彼得堡是世界上最空虚，最人为的城市。”

在无城镇的原始农民居住的土地上，外来形式的城市就像溃疡一样粘附在上面。永远怀恋着广阔的土地的俄罗斯心灵，激烈地憎恨基督之敌引诱他们走入的无情的灰色世界。

《家庭纪事》的作者，以将一种介乎回忆录和小说之间的新文体引进俄国文学而闻名的阿克萨科夫，一八六三年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俄罗斯人民精神解放的第一个条件是，它应当用尽全力，竭殚心智地恨彼得堡。"莫斯科是神圣的，彼得堡是撒旦的。一个流传很广的民间故事把彼得大帝描写成基督之敌。

斯宾格勒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视作这一假晶现象的两个代言人和牺牲者。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本土农民，托尔斯泰是西方社会的人。在这里，开始和结局碰在一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圣者，托尔斯泰只是一个革命家。"他们一个是心灵上绝对离不开土地；另一个是，尽管拼命努力，却永远不能接近它。"

托尔斯泰是属于西方文明的，他是一个"开明的"、"关心社会"的人，他在身边看到的一切都是一个晚期的、大城市市民的，西方形式的问题。他站在彼得大帝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中途，他和他们都不想接近俄罗斯的土地。他对财产的恨是一种经济学者的恨，他对社会的恨是一个社会改良家的恨，他对国家的恨是一位政治理论家的恨。

相反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属于任何一派，除非是原始基督教中使徒一派。像他这样的心灵是可以看到一切所谓社会的事情以外的，因为对它说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极不重要的，值不得加以改良。没有一种真正的宗教是以改良事实的世界为目标的，他和每一个原始的俄罗斯人一样，基本上不觉得有这样一个世界，他生活在一个第二的、形而上学的彼岸世界中。一个心灵的烦恼跟一种主义有什么相干呢？

一种宗教竟去干与社会问题，它就不成其为宗教了。

斯宾格勒认为，每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都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徒，尽管他们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因为这一无城镇的人民所怀慕的是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它自己的宗教，它自己的历史。

天堂的声音

我如此喜爱威廉·布莱克的诗集《天真与经验之歌》，以致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拿人类的全部诗歌来换，我也不给。

它的每一首诗都使我震动，都能把我体内那个有限的人击倒：

> 甜蜜的睡眠，像温柔的天使一样，
> 在我幸福的孩子头顶上翱翔。
>
> （《摇篮之歌》）

> 你寻找那美好的宝贵的地方，
> 在那里旅人结束了他的征途。
>
> （《啊！向日葵》）

这金质诗句，是神那里传出的话语。布莱克，未被教育驯化的独特与纯粹，天定的诗人。他的诗是我们的福音。对布莱克的忽视，便是对往昔人类高贵精神的漠视。布莱克，让

我想到辉煌的西班牙诗人，想到后来的洛尔伽。但同布莱克比，洛尔伽是孩子、兄弟、天使、早晨、心；而布莱克还是父亲、信仰、灵魂、泽世的慈祥、天堂的声音。

两类诗歌

这里，我想通过两个诗人，谈谈我对两类诗歌的感受和看法，他们具有代表性。一个是雅姆，一个是米修，两个法兰西诗人。

雅姆的诗是温善的、乡村的、木质的、心灵的、宗教的、古往的；米修的诗则是冷冽的、都市的、铁屑的、头脑的、哲学的、潮流的。在此对他们的诗，我不能多引：

在这灵魂的住所，让我俯身在你的
神圣的水上，我将如同那些驴子
厮守着卑贱而甜美的贫困
向着那永恒的爱——它清澈而晶莹。

（雅姆《和驴子一起去乐园的祈祷》）

大声音，他饮，饮我们声音。
大父，大大父
因事件而致富之父。

（米修《大声音》）

雅姆的诗激涌我们的血液，直抵我们的心灵，尽管我前面赞

美了布莱克，我还是想说，雅姆是我最喜爱的诗人。米修的诗，机智、奇异，活跃了我们的想象，但对这类诗歌，我想用四个字评价它们：止于欣赏。

雅姆的一生，简单平静。他生于上比利牛斯省山区一个小镇，与梭罗一样，他一生从未远离过他的故乡。里尔克在他的《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记事》中，赞颂过这位被他称作“外省的诗人”、“知道歌唱自然及少女的诗人”：“一个诗人，他在山里有一所寂静的房子，他发出的声音像是净洁的晴空里的一口钟。一个幸福的诗人，他述说他的窗子和他书橱上的玻璃门，它们沉思地照映着可爱的、寂寞的旷远。正是这个诗人，应该是我所要向往的；因为他关于少女知道得这么多，我也知道这样多才好。”年轻时经过几次失意的恋爱之后，雅姆终生未婚。在他的晚年，当地居民常常可以看见一个白发银须的老人，一手拿着拐杖，一手牵着只大狗，在森林中独自漫步。莫里亚克说：“雅姆是不朽的，人们将不断地发现他。”

米修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一生，是体验生命和实验诗歌的一生。他漫游全球，沉湎想象，潜入内心，吸食毒品（想从“失常的角度了解正常”）。“每周中，我定一天完全静默，不接电话，不见人，一句话也不说。”他的诗，启发了超现实主义。晚年，他住在巴黎华贵的住宅区，对街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为自己度过了八十五个春秋感到吃惊：“由于心脏不健，人们都预言我会早死。我如今还活着许是基于本能的缓慢性。”米修相信，文学助人生活，在没有文学的国度里，人很快会落入动物的愚蠢，或是发疯。

人类不幸的由来

《我弥留之际》，一个在十天之内发生和完成的历险故事，一部《堂吉诃德》式的深含寓义的现代小说。在这部小说里，福克纳借主人公安斯·本德仑的奇想，讲了一个古朴的道理，这涉及人类不幸的缘起。

一天，安斯·本德仑看着从自家门口通过的路，仿佛一下子明白了他家厄运不断的起因："住在路边紧挨在路跟前是一点好运也交不着的。"因为上帝造路就是让人走动的，不然干吗他让路平躺在地上呢。当他造一直在动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把它们造成平躺的，就像路啦，马啦，大车啦，都是这样。可是当他造呆着不动的东西时，他就让它们成为竖直的，树啦，人啦，就是这样的。因此他是从来也没打算让人住在路边的，到底是哪样东西先来这里呢，是路呢还是房子呢？一般的情况总是人非要把房子盖在人人驾车经过都能把痰吐到自己的门口的地方，才觉得安生。人老是不得安宁，老是颠颠儿的要上什么地方去，其实上帝的本意是让人像一棵树或是一株玉米那样呆着。因为倘若他打算让人老是走来走去上别的地方去，他不会让他们肚子贴在地上像条蛇那样躺平吗？按理说他是可以那样做的。

美国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说："要考察福克纳如何利用有限的、乡土的材料来刻划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更有用的方法也许是把《我弥留之际》当作一首牧歌（用一个简单得多的世界来映照一个远为复杂的世界）来读。"

世上有了诗人

公元前四八〇年，波斯人第二次入侵希腊，斯巴达王勒翁尼达斯亲率三百勇士，死守希腊北部通往雅典的要隘温泉关，最后全体壮烈牺牲。它的诗人，晚年的西摩尼得斯，到温泉关凭吊，写下了这首《温泉关凭吊》，千古传诵：

过客，请转告斯巴达人，
在这里我们长眠，遵守着他们的指示。

西摩尼得斯，被文学史称为古代希腊“第二个国际性的伟大抒情诗人”，生于爱琴海(古今诗人的摇篮)的凯奥斯岛，一生大部分住在雅典。在古希腊竟技的空气中，他数十次以诗取胜。一次献给马拉松之役牺牲将士的碑铭比赛，他战胜了埃斯库罗斯。

西摩尼得斯的诗具有泛希腊的意义，曾使全希腊激动的那些事件，在他的诗篇中几乎都得到了鲜明表现。他叙述简明，用语平易，字句凝炼。这些诗篇充分反映了希腊精神：坦直无邪，克已自制，清明在躬，意气如神。他的言论被视为至宝，希腊人对于英勇为国捐躯者的记载，大多求助于西摩尼得斯，而不去找品达。

路接天际之地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日，这是“白露”后的第二天。这一天秋高气爽，就在这近乎一年中最好的一天，我的朋友、诗人黑大春来访。长时间交谈后，我们来到了西向的阳台上。面对明澈的天空、蓝色远山、成群涌起的云团，他情不自禁地咏出了勃洛克“麦穗垂头，路接天际”的诗句。在谈到俄罗斯这个天然的文学家园时，他说劳伦斯就有一个说法，即一个作家的居所应该在北方。我提到了里尔克。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岁的里尔克结识了一个俄罗斯将军的女儿，鲁·安德烈亚斯·萨洛美。正是她，神遣般将俄罗斯适时地介绍给了里尔克。这是里尔克生命中的里程碑。在世纪交替时期，他随萨洛美两度去俄罗斯旅行。广袤壮阔的俄罗斯景色震撼了他。他将它视作他的神话。他这样赞美它：“我赖以生活的那些伟大和神秘的保证之一就是：俄国是我的故乡。”在他的《彼得堡记事》中，他描述了那里的景色：

“在伏尔加河上，在这平静地翻滚着的大海上，有白昼，有黑夜，许多白昼，许多黑夜。这浩荡宽阔的大川，一边岸上耸立着高入云霄的森林，另一边岸上平躺着荒原，在这片深凹的荒原中连通都大邑也不过像茅屋和帐篷一样。原有的一切度量单位都必须重新制定。我迄今所见只不过是土地、河流和世界的图像罢了。而我在这里看到的则是这一切本身。我觉得我好像目击了创造。”

一个素食主义者

萧伯纳也许是世上最长寿的作家，他一生在世九十四年。他将他的长寿归于素食和布衣。

一九三三年，萧伯纳访问中国，在上海，有人问他素食的原因，他答："是我的健康所需要的，而且素食本是英雄和圣人的食物。"他的食物，一般为可可茶、通心粉、黑面包、鸡蛋和一定数量的生菜。他欣赏语言学家福勒的名言"溺死在酒杯中的人多于溺死于大海中的人"，因为他自己滴酒不沾。他的一生，也与香烟无关。在衣着上，他喜欢朴素的棉毛织物，全身装束显示出对华贵衣饰的鄙视态度。他忙于写作，"来不及享受花钱的乐趣"。他说，"对我来说，有钱和没钱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为此他将颁发给他的一九二五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全部转赠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用来加强瑞典和大不列颠之间的文化交往。他极少生病，一生见的最少的就是医生。老年的萧伯纳身高两米，面庞清癯，瘦骨嶙峋，一副不加修饰的红胡须，他自豪地宣称："我的肤色和体型成为全欧洲羡慕的对象。"

萧伯纳是一生写了五十二部剧作的戏剧家，他这样概括戏剧："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出者，社会品德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

文明人从摘果人手里买果实吃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讲："那些扰乱了我们，使我们疑难、困惑的问题也曾经发生在所有聪明人心上。一个问题都没有漏掉，而且每一个聪明人都回答过它们，按照各自的能力，用各自的话和各自的生活。"一个名叫贝恩的当代德国诗人，由于偏爱尼采，也夸张地讲过同一性质的话："我们这一代人所讨论的企图领悟的所有事情，实际上尼采早就详论过这一切。他发现的是最后的准则，其余不过是对这些准则作解释而已。"

一九八七年我曾写过一篇很短的题为《你们的悲剧》的随笔，副标题为"致诗人们"，作为对在此谈论的这个话题的补充，我再次把全文放在这里：

"人类的第一代诗人没有诗读，他们读世界。他们用心把世界描摹在竹帛上，于是，人类有了诗。

"你们是幸福的，你们一出生就有诗尽你们去读，有诗人任你们去崇拜。你们也要读世界，当你们尝试用心把世界描摹在纸片上的时候，你们发现，你们无法像自己的先驱那样，直接面对世界。因为在你们与世界之间已经有许多先于你们而出现的人，你们的眼前总有这些携着诗与思想的人在晃来晃去，你们看不清楚世界本身。你们试图赶开他们，又无法完全赶开他们。你们当中的一个人（纪伯伦）这样说，野蛮人从树上摘果实吃，文明人从摘果人手里买果实吃。这是你们的悲剧，无法逾越和摆脱，因为你们是文明人。

"茎里有的，种子里早已有了。"

帕斯卡尔也意识到过这个问题，但他鼓励我们："但愿人们不要说，我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题材的处理就是新的。在我们打网球的时候，双方打的只是同一个球，但总有一个人打得更好些。"

白昼与黄昏

与追求到处扬名，风风火火的卡波特（《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作者）相反，塞林格体现了作家的另一个极端。

一九五一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三十二岁的塞林格由此声誉鹊起。为了躲避随之而至的那些妨害写作的东西，他毅然退隐到新罕布什尔州乡间。他在一条河旁的小山上，盖了一所房子，四周种上树木，外围圈起装有警报器的铁丝网。他在这片被他买下的土地上，离群索居。除去偶尔驾驶吉普车到附近镇上购物外，他极少与外界来往。他写的很慢，《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十年间他只发表了三个中篇和一个短篇。他的作品发表或出版，在美国文学界被当作一件大事，而在他的读者眼里，甚至视为神的出现。（他不喜欢海明威，主要由于他曾目睹这位硬汉残忍地枪击一只鸡的脑袋。他借助他小说中的人物说："人不仅要爱这个世界，宽恕这个世界，而且要在这个世界上努力尽自己的责任。"）

与我们的批评家刻薄地曲解张承志的决绝与不群相似，美国的批评家也曾非议过塞林格："塞林格的声誉，有一部分是基于他故弄玄虚，不让人们接近。"

一个旗帜性的诗人

在二十世纪的诗人里，我称庞德是一个旗帜性的诗人。至少，以他为核心，现代文学中出现过一次新鲜的诗歌运动（“意象派”，即庞德给予这个运动的名称）。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三岁的青年庞德，带着他的手稿和诗歌信念，来到欧洲。他要用“精炼的字句”，取代旧大陆诗歌创作中的“美丽的空话”。他为欧洲文学带来的不仅是波澜（连长他二十岁的叶芝也因他改变了诗风），也带来了他深厚的友善。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尽心为其他诗人和作家争取经济资助，全力帮助他们发表或出版作品（尽管当时他自己也很贫困，作品也难以出版）。由于他，乔伊斯出版了《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与《尤利西斯》，艾略特发表了《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和经他修改的《荒原》。他们尊敬他，爱戴他，钦佩他对文学的无私奉献。

一九二四年，由伦敦到巴黎，后又对巴黎产生了厌倦情绪的庞德，迁居到意大利。正是这个国家，使他后来受到了他的祖国的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庞德认定墨索里尼的国家社会主义，与他信奉的英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的社会信用学说相同，导致他成了意大利法西斯的同盟。他的主要表现，是应罗马电台之邀，在电台定期发表广播漫谈。他的数百次广播讲话，涉及广泛：欧洲文学、造型艺术、他的《诗章》、儒家学说、日本戏剧等；也涉及政治和战争，如为墨索里尼的政权宣传，大胆抨击美国的战争行动等。他的讲

话，激怒了他自己的国家。战争结束时，庞德被意大利游击队逮捕，后移交美军。一九四五年他因叛国罪（罪状多达十九条），被押回华盛顿受审。

在美国诗歌界营救庞德过程中，出现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即争取诗人弗罗斯特的响应。美国当代诗人唐·霍尔在回忆录《虚荣心、名誉、爱与罗伯特·弗罗斯特》内，讲了这件事的详情。尽管庞德当年一读到弗罗斯特的诗，就以极大的庞德式的热情去宣传、评论和推荐，逼使美国公众重视这位受到忽视的诗人，但弗罗斯特从来就不喜欢庞德（“他欠了庞德的情，这大概是不喜欢他的起因。”）。怎么办？救援活动发起人、诗人麦克利什策略地去告诉虚荣心很重的弗罗斯特：埃兹拉还关在那里，太引人注目了；要是我们能使他获释，人们就不会再这样注意他了。于是，弗罗斯特专程去华盛顿，利用他的名声去影响那些有影响的人：找司法部长，拜访议员，与总统首席行政助理交涉。事情果然有了改观，一九五八年，被囚禁（比萨集中营的铁笼，美国的监狱和精神病院）十三年的庞德终于走出了伊丽莎白精神病院。

获释后的庞德，再次返回意大利定居。晚年，他对自己的过去追悔末及，他说：“我只希望，我为艺术尽了绵薄之力。”

凭鲜花取胜

智慧的所罗门王说：以剑取天下者必亡于剑。在另一个领域，希腊当代诗人埃利蒂斯，也有一行感动心灵的诗句：

“凭鲜花取胜”。

埃利蒂斯，一个在艾吕雅和超现实主义启示下上路的诗人，在写出包括《天蓝色记忆的时代》、《疯狂的石榴树》等名篇在内的两本诗集后，应征入伍，以一名陆军中尉身份参加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争期间完成《英雄挽歌》；战后沉寂十四年，直至伟大的《理所当然》诞生。

《理所当然》的篇名，取“理所当然应该赞美你”（希腊正教对圣母玛丽亚的赞美歌首句）之意。埃利蒂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演讲，第一句话就说“请诸位允许我为光明和清澈发言”，这非常恰当地表达了他的诗歌信念。他走的是一条“从现实向可能”伸展的道路。“凭鲜花取胜”是它的终点。他说：“美和光明有时会被看作不合时宜或微不足道的东西，不过我觉得想要接近天使形状的内心追求比起制造各种魔鬼的作用来要困难多了。”他认为，希腊语作为一种语言不适于对生活进行悲观主义的描写，而且它没有可能用来写诅咒性诗歌的措辞。《古希腊文学史》的作者就曾对柏拉图这样概括：“他总留心从事物中发现美，而不是专事揭丑攻讦。”

埃利蒂斯，“几千年来将珍宝冲上陆地，让西方得以收集起来引以自豪”的爱琴海的歌手，将美与善同太阳看成是一回事的“饮日诗人”，在受奖演说的最后告诉听众：“双手将太阳捧着而不为它所灼伤，并把它像火炬般传递给后来者，这是一项艰巨而我认为也很幸福的任务，我们正须这样做。”

一九九四年八月至九月

后　　记

最后借此机会，我想就本书的出版准备过程，作几句必要的、事务性的说明。

还是一年前，我曾应出色地编辑过数种散文书籍、供职于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之约，编就一本同名但篇幅不多的个人散文随笔集，并请我的朋友，上海的青年画家丁乙，画了作者肖像及数幅插图。后出版工作因故一直搁置。

今年八月中旬，我忽然收到楼肇明老师的一封急信。信说应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之约，正编一套散文随笔丛书，在人选上已将我列入，十月十五日为交稿日期。我写作一向很慢，对我来说，达到要求的字数是个大的问题。正是由于肇明师的鼓励，使我敢于应允下来，并借助我过去的笔记，在短短的一两个月里，赶写出了四万余字的作品。因此对于本书，我首先要感谢肇明师的指导与鼓励。同时，对于方晴兄的厚爱，以及在我的写作上给予过我帮助的师长和朋友，在此一并谨表谢意。为了丛书的统一，原有的插图最终不得不放弃，特向丁乙表示深深的歉意。

为了《游心者笔丛》完美地出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贾辉丰先生和林燕女士，付出了很多心血。特别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林燕女士，不仅认真通读了全稿，而且悉心修订了作者在行文和修辞上的一些疏漏与谬处。这里，作者谨向他们表示应有的敬意和谢意。

最后我要说，这本书虽然署了我的名，里面实际也包含着我的妻子李松的大量工作。她不仅打印了全部书稿，数年来也是我的写作的尽心支持者和中肯批评者。一个作家，命定是一个文学的献身者。对此我为我的家庭和妻子，因我而为文学付出的牺牲，一生感激不尽。

作者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小 传

苇岸，原名马建国，汉族，北京人。一九六〇年生。一九八四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现在天明地静的昌平执教、定居。

大学期间开始写诗。一九八二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八年起主要进行散文写作。《大地上的事情》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大地上的事情
SSID=11461277
起止页=1-207
作者=
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1995
独秀链接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482868&d=31C865086E008F60E78D5E01B900D9BC&fenlei=09031103&sw=%D3%CE%D0%C4%D5%DF%B1%CA%B4%D4
试读链接=http://image4.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b6&pid=2A853E871E60EFA16240B9450979506 33D4B8B78C0618D26E83E305BE32BECA69FE752595B8D0714283E6B6262C99236140DE5ADA649E0C530B7A0ED52B5DE650849F502FD782403EFBA81511AA98D525C5F775309DCFD9B3A52FC070ED4E670F1614417262086389A473FB6AFE998E5DA86&jid=/
目录地址=http://Jnf.5read.com/b300-3/disktbc/tbc12/01/BookContents.dat